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4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
Saturday, 10 July 2004

上午 9 時正會議繼續
The Council continued to meet at Nine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S.B.S., J.P.

朱幼麟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國強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J.P.

陳婉嫻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宏發議員，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J.P.

劉千石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羅致光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勞永樂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J.P.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葉國謙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G.B.S., J.P.

劉炳章議員，S.B.S.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S.B.S.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S.B.S., J.P.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許長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S.B.S.,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議員議案**MEMBERS' MOTIONS**

主席：第三項議案：大市場、小政府。

大市場、小政府**BIG MARKET AND SMALL GOVERNMENT**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幸好市場還在這兒。各位同事在即將準備告別之前，本人有幸提出最後一項議案，就是關乎各行各業、各位市民及政府都值得非常關注的“大市場、小政府”議案。香港一直被視為全球其中一個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透過長期的自由市場運作創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商業都市，其特點是各行各業百花齊放，尤其是在不同行業中，中小型企業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它們佔了本地企業總數 90%，僱用 60%的私營機構僱員。不但各行各業在本港經濟中的地位重要，而且各行各業在基層依法選出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也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發揮了作用。

本人在今天的議案中，要順帶一提的，就是由選委會所選出的立法會議員，為今屆立法會工作，選委會是由 4 個組別 38 個界別分組的委員所組成，廣泛代表着經濟體系內的各行各業。可以說，選委會的組成正正反映了香港大市場經濟運作的特點，選委會的委員是代表各行各業各界，利用各自的專業和經驗，在公共事務中亦作出了很多的參與和貢獻。對於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相信他們亦希望看到香港能夠在打下良好基礎之後，繼續維持各行業各界別均衡參與及各盡所長的優勢，以龐大自由市場的動力繼續促進各行業，使整體經濟持續發展。因此，本人借第二屆立法會結束前最後一次會議的機會，提出此議案，促請政府更切實地履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從而為各行各業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首先要談的是精簡架構和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本人認為，落實“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首先要着眼於精簡架構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本人注意到，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在精簡架構和程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包括把公務員編制由 2000 年年初的 198 000 人，縮減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的 170 600 人；一些政府部門作出不少合併，以及將部分服務外判。此外，政府亦推行了方便營商的計劃，迄今已經落實了四百多項措施，加快了一些行業的發牌和審批程序。這些成果是應該得到肯定的。本人認為，政府須繼續推動精簡架構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的工作。此外，在各類涉及市場運作的立法工作中，無論是提出新的還是檢討現有的主體法例或附屬法例，政府除

了要關注企業管治質素、消費者和社會的安全及保障等政策目標之外，還須重視相關立法會否對營商者帶來不必要的妨礙，不利簡化程序，影響營商環境。涉及市場運作的規章制度除非是必要之外，否則都應該盡力減省，這樣既有利市場，同時也有利政府架構和程序的精簡。

其次，就是避免公共服務與相關業界提供的服務重疊。當中第一部分是新增公共服務必須小心謹慎。落實“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方面，着眼點是必須避免公共服務與相關業界提供的服務在功能上重疊，逐步有計劃地縮減公共服務的種類和規模。香港社會應該提倡個人與企業獨立自強和靈活應變的精神，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幫助。政府不應因為壓力團體的影響而變成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的大家長。政府的規模和耗用的公共資源不宜無限擴大，否則只會令自由市場的空間縮小，個人與企業的活力與創造性會受到損害。公共服務及資源的投入永遠都是易放難收的，甚至會助長政治上的誘惑力，故此，本人期望在未來政府要堅守原則，提供新的公共服務時必須謹慎，權衡利弊，以市場為依據，真正落實“大市場、小政府”。

第二部分是檢視公共服務。政府必須切實檢討那些與私人市場在功能上出現重疊的部分。金融風暴和樓市的泡沫爆破，促成了政府房屋政策要重新定位，退出發展商的角色，減少了對市場的干預，同時，房屋委員會也將商業物業的經營運作交回市場，將維修管理等營運外判。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方向，但在其他範疇，政府仍然有需要從速檢討，釋放更多私人市場，讓私人市場參與者參與，讓發展空間增加。

例如經過多年擴張的公共醫療體系，現在仍在討論中，是以廉價高質的全面服務不斷蠶食私人醫療市場的空間，造成能夠負擔私人醫療服務的人士一起爭用公共醫療。本人認為政府應該調整公共醫療的策略，配合醫療融資的改革，將資源集中於提供基本必要的服務，根據市民經濟負擔能力設立一套分級的收費制度，鼓勵有能力者選擇私人醫療，最終推動私人醫療市場的更新和發展。

在教育服務方面，政府的政策也有需要鼓勵私營教育機構拓展各種類型和各有重點的大中小學教育，例如認真研究採用學券制度，讓學生選擇學校，而不應單靠政府不斷投入，包攬教育服務。當然，我知道教育是重要的，但面對社會經濟轉型，政府當然有責任不斷投資於教育，但要善用資源，創造有利條件，鼓勵私人辦學市場可以配合發展，從而促成公私營教育服務的良性互動。

事實上，不少公共服務即使有整體上存在的必要，但具體的服務項目或形式，也要政府小心檢視是否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例如從一些批評中，我

們發覺到近年貿發局的展覽業務擴張進取，對私人展覽業者構成不公平競爭。本人認為在確保本港各行各業貿易推廣便利的前提下，貿發局應同時以促進私人展覽行業發展為政策目標，界定運作的優先次序，盡量將私人展覽業者可承擔的業務交回市場。此外，也有人一直反映，包括本人在內，公營電台所提供的廣播服務值得檢討，應該避免在節目形式及內容上，與私人廣播業構成競爭，如果處理得好的話，此舉既可減少公帑支出，又可擴大私營廣播業的長遠發展空間。

第三，是節省公共開支，消滅財政赤字。在落實“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目標是有效節省公共開支，為最終消滅財赤提供必要的條件。現時公共開支在 2004-05 年度的預算仍然處於佔本地生產總值 22.5% 的高水平，政府的財政赤字也持續多年。只有致力縮減公共開支的規模，維持政府財政健全，才能有利整體市場得到更好的信貸環境，有利於各行各業長遠的經營。否則，政府最終可能被迫要向公眾和市場抽取更多的稅款和開拓更多稅種，造成政府越來越大、市場越來越小的惡性循環。

主席女士，作為全球其中一個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香港一直依循市場主導的路向發展，通過個人和企業的獨立自強和靈活應變，取得長期驕人的成就。本人深信，無論未來香港社會政治的環境如何改變，“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和精神不能變，惟其如此，繁榮穩定才能有保障。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切實履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從而達致以下目標：

- (一) 精簡運作架構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為各行各業創造更佳營商環境；
- (二) 避免公共服務與相關業界提供的服務在功能上重疊，從而增加市場投資機會；及
- (三) 節省公共開支，消滅財政赤字。”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亮星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及陳婉嫻議員會分別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先行發言。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民主黨原則上支持原議案的精神，不過，對於節省公共開支，有一些意見。

首先，民主黨一向反對政府“大花筒”式的浪費，但目前的公共服務水平已備受各方批評，服務水平未如理想，一旦再削減公共開支，會進一步影響基本的民生服務。民主黨不願看見基層市民在削減公共服務後所面對的生活壓力，從而引發社會矛盾。所以，民主黨將“節省公共開支”改為“確保政府部門善用資源，減少浪費公帑”。

事實上，我們看看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案，他的計劃是把現時，即 2004 年的 2,180 億元營運開支，減至 2008-09 年度的 2,000 億元，減幅達 180 億元，接近 10%。這個減幅已不是小數目，皆因工資等減幅較小，最多是 6%。所以，實際上政府可能要被迫裁員以減少公共服務。在這基礎上，如果再進一步節省公共開支，將會造成社會矛盾，相信這不是吳亮星議員所希望看到的。

原議案提及“大市場、小政府”，所以今天辯論的主題應是“小”字，便是“小政府”的“小”字。我相信“大市場”的討論價值不大。在香港，可能有一些反全球化人士對“大市場”這個“大”字有所保留，但民主黨一向對這方面是無異議的。香港經濟從來十分依賴市場，擴大市場是民主黨的願望，也是政府的工作。

但是，對於“小政府”這幾個字，我們其實也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來辯論。小政府，英文就是 **small government**。在歐美的政圈中，支持“小政府”—— **small government** 的，一般都是右翼政黨，例如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至於左翼政黨，特別是在克林頓執政之前，美國的民主黨、英國的工黨或歐洲大陸的社會黨，一般也不贊成“小政府”，而事實上，在歐洲大陸或歐美的選舉中，很多時候是否選一個屬意“大政府”或“小政府”的政黨，是選舉中的一個很核心的議題之一。

稍後黃宏發議員在聽罷我就議案辯論的發言後，他必定會站起來回應，給大家上一課 **lecture**，我是很歡迎黃宏發老師這樣做的。

但是，今天我們民主黨也會支持這項議案。若把民主黨放在歐洲的政治光譜內，我們會變成一個右翼政黨，是一個相對的右翼政黨，因為支持一個所謂“小政府”。我希望今天較少人在座的工商界朋友瞭解，香港相對地是一個較右翼的社會，這是以整個社會計算。所以，如果香港所有的政黨要生存，就某種形式而言，在地球的政治光譜內，我們也是會變成中間偏右的，但民主黨在香港，則是一個中間偏左的政黨。然而，當我們與歐洲社會的一些政治人物傾談時，對於我們民主黨反對最低工資、支持“小政府”等言論，他們卻把我們視作右翼的政黨。司長正“牛咁眼”地看着我，希望你也瞭解一下。

當然，自九十年代開始發生了一些轉變，克林頓政府也將一個 **small government budget** 送交美國國會，在送交國會後，可以這樣說，它已改變了美國民主黨過去的歷史形象。貝理雅也開始談“**the Third Way**”，談責任福利。民主黨今天不是說要親西方，不過，我們覺得香港社會應走較中間的路線，我們既支持“小政府”的原則，也支持實行低稅制的小政府。民主黨同意要以“大市場、小政府”為原則，盡量精簡架構，減省不必要的行政程序，以免政府整體運作成本高而效率低。

至於消滅財政赤字，吳亮星議員提議主要依靠“節省公共開支”來達致目標，我個人覺得較為困難。如果要靠節省公共開支來平衡預算，我相信莫說減省 180 億元（財政司司長也在搖頭），即使減“一個開”也做不到。試想想這樣怎能節省開支、平衡預算呢？事實上，這是不切實際的做法。不過，我也不認同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提及的銷售稅。政府雖然支持，但事實上，在議事堂內大部分政黨，包括自由黨、民建聯、民主黨，最低限度這三大黨也反對銷售稅，當然反對的原因各異。

我在此回應一下，當標普或穆迪表示擔心於 9 月立法會選舉後，立法會會阻礙政府減赤的決心，但如果我們看實際的情況，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要增加的稅項已加了，無論是薪俸稅還是利得稅，而現時最主要的選擇，如要透過加稅或增加稅收來減赤，便只有銷售稅一項。所以與 9 月立法會選舉或選舉前後並無關係，除非自由黨在選舉後支持開徵銷售稅，否則選前選後，立法會也不會支持開徵銷售稅，所以說這跟選舉無關。下星期，我要向有關的評級機構說清楚，要他們公道地看待這個問題。

至於香港是否有需要開徵銷售稅呢？這是值得辯論的。我從來不排除將來開徵銷售稅的可能性，但民主黨在現階段是不支持開徵此稅的。不支持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左角度，一個是右角度。在左角度中，銷售稅是一種累

退稅制，正如楊森議員很喜歡說的話：對中下層市民不公平；右角度是一些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人士所持的看法，他們覺得有部分人士不支持銷售稅，因為銷售稅會令政府增加新稅種。簡單來說，若家裏多了一個“水喉”，家人不夠錢用便打開它，“小政府”便會變成“大政府”了。這與吳亮星議員說要支持的“小政府”有衝突。芝加哥學派人士認為最重要是關上“水喉”，政府沒錢便沒甚麼可令它變“大”，所以，左右角度也是可以用來反對開徵銷售稅的。當然，民主黨本身是有共識的，雖然大家是基於不同的理由，但也會反對開徵銷售稅。

可惜今天劉慧卿議員不在席，如果她在席便好了。因為就“小政府”方面，民主黨也有個小故事。我在 1999 年為民主黨內部編寫預算案時（其實我正在披露黨內機密），前民主黨中委陶君行反對預算案內有“小政府”字眼，他認為說真的，傳統的左翼政治人物是反對“小政府”的。後來，在民主黨內的我妥協了，將“小政府”改為“有效率政府”，因為“有效率政府”是左、中、右派也支持的，是嗎？所以是更改了這些字眼。現在陶君行——我們的少壯派黨員已退黨，並加入了前綫。現在前綫可能不反對小政府了，不知是劉慧卿議員教導陶君行有方，還是陶君行改變了，但今天我們支持這項議案，可能是基於不同的理由。

最後，我想說關於減赤方面，也希望趁着司長在座時談一談，如果我們不能開徵銷售稅，或現實上，立法會各大政黨不支持開徵此稅，民主黨便要提出一點，自由黨的田北俊議員其實以前也曾提出過，便是我們的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分帳問題。我希望這是財政司司長再認真檢討此事的時候。民主黨已提交了一份詳細報告，簡單而言，自 1998 年至去年，多年來計算，我們看到平均每年其投資回報收益大概為 410 億元，這是過去多年的平均數。就這 410 億元的收益，在扣除了開支後，我們覺得現時它是會不斷累積下去的，政府其實是否有需要保留如此龐大數目的外匯基金呢？民主黨覺得可將這部分，例如把它“cap”在 300 億元水平，撥入政府收入內，便會大大地改善財赤，而對外匯基金的本金也不會有任何損害，希望司長會研究我們的看法。我們的原建議是 100 億元，但我們覺得按現時的形勢看，希望政府能放膽看看能否把該部分“cap”在 300 億元的水平。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聽了單仲偕一番很坦白、可愛的發言，真好。如果按照單仲偕所界定的，他屬右角度的話，那我稍後的修正案便是屬左角度了。我們的黃師傅在早前也說我屬左角度的，我認為說得好。

近年政府有一種習慣，總叫人“等運到”。以失業問題為例，政府表示失業問題會隨經濟增長改善；面對經濟轉型，政府也表示沒有甚麼可以做。這一種狹窄的市場主義，令人甘於只對市場信號作出回應；可以做的，就是等，等待市場打救，解決問題。

政府、大財團也教人相信“大市場”，我非常懷疑市場真的是否萬能？以我近年觀察所得，政府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勢，有意將部門公司化、私營化，又先後將政府服務外判給市場提供，結果在政府完全撤離之下，相繼出現了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房屋署將清潔及管理服務外判，它將合約以低價批予承辦商，結果清潔工和保安員工資十分低，房屋署甚至出現了二千多元一份聘用合約，普遍工時長達 12 小時。房屋署署長表示該署未來工作方向，是朝着“小政府、大市場”的方向發展，因此，該署將會透過外判服務來達到目的，他認為為外判合約制訂最低工資及限制最高工時等是沒必要的，這是政府官員所說的話。

最近，房屋署更有意分拆商場及停車場，引來商戶的強烈反對。有關的團體曾前來我們立法會投訴。有醫療組織表示，醫療服務不是純商品，而是社會對居民的承擔。特別是一些在公共屋邨開業的醫生，很多時候是與居民息息相關的。如果政府的商場被某一個財團投得，對我們現有的每一個獨立的醫生來說，我估計在租金上的操控方面便更大了，對市民來說，這不是一件好事。倘若房屋署將商場鋪位（包括診所）交由市場競投，我相信所有營業者，除了醫生外，那些小本經營者根本不能與大集團競爭。在一些很有特色的公屋小商場，我們不否定現在房屋署經營得很差，但這不等於要把它開放給大集團來壟斷經營，如果連一些僅有的小本經營者的生存空間也這樣逐步扼殺，我便覺得絕不能接受這種就是稱為“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

最近，我接到數十位新界區為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合約清潔工的投訴，他們已服務食環署六七年了，而食環署實際上有一些工作須由他們繼續提供服務，不過，署方認為合約工人的成本高，如果透過外判便可以更便宜，因此不與他們續約。數十個工人便與我一起約見助理署長，說出他們的困難。

主席女士，面對當前市場，我們是說在勞力市場失調的時候，如果政府繼續“大市場，小政府”，“唔理三七二十一”，在現時的市場環境下，基層勞工職位可說是僧多粥少，工人議價能力偏低，政府卻把服務外判，猶如把現在已失調的基層勞力市場，進一步推至困境。

最近類似這些的個案有很多，為政府提供服務的如地政總署的非公務員合約員工，正面對同一的命運。我每隔一個星期便與他們一起會見董先生，申訴即使他們是擁有技術的人員，他們至今仍找不到工作。以上例子亦反映出政府倡議“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哲學，逐步減少政府對社會上各項開支的承擔，令我們的基層勞工、技術工人的就業環境變得更惡劣。雖然從去年 10 月開始，在落實自由行或 CEPA 後帶來了一些好的氣氛，但我們的基層市民卻感受不到他們能夠受惠於經濟復甦。這說明了甚麼呢？說明了政府在某個方面的政策上出了問題。

主席女士，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大市場”的觀點，完全建基於“大市場”是一完全競爭的市場（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有不少學者已經指出，雖然市場化的確帶來競爭，但這個大市場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參與和在其中生存的。特別是現時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市場資訊瞬息萬變，資本壟斷，汰弱留強的環境下，小本經濟及非正規經濟實難於競爭，市場失效的例子更經常可見。

即使以美國紐約作為“大市場”的典範，很多人也說，市場失衡的經驗值得香港借鏡。紐約作為美國最大的都會，它提供了不少的經濟利益，可是它的貧富懸殊卻高踞美國第一。

很多人都信奉自由市場經濟。過去的經驗似乎告訴大家，一個政府做錯的機會遠大於市場做錯的機會，所以，有人認為寧可忍受自我調節機制失效的痛楚，也不願因政府干預而將問題雪上加霜，更不願政府影響民間的自主行動。特別是現時市民對特區政府既無信心亦不信任，聞政府大動作，便已嚇得像很多人所說：政府最好不要有所動作。所以，說“大市場，小政府”，我相信自然有一些支持度存在。

不過，我認為扭轉這類近乎“市場原教主義”的意識形態，大小事項，一定是市場為先，各種略有政府角色的建議，總會引來很大的反應。當然，很多提到政府角色的建議，並不一定表示要違反市場邏輯和規律行事，而是要考慮如何產生某種啟動轉變的可能。特別是我們在面對與香港競爭的鄰近地區，大家都用一些政府的行為來確保在競爭中取得優先位置的時候，如果整個政府還是持“大市場，小政府”這種僵化的原教主義想法，我是絕對不同意的。

我今天提出修正案，有人說我是倡議計劃經濟，鼓勵“大政府”。其實並不是這樣。首先，我認同吳亮星議員提議要簡化政府的行政程序，也支持單仲偕議員提議要確保政府部門善用資源，減少浪費公帑。不過，我認為在

“小政府”下，政府也須確保公務員的人手編制，地政總署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香港這麼多蚊子，也是由於地政總署沒有人手進行收地而致，政府便說暫時先不收地罷了。由於政府說有需要壓縮人手，為了這種盲目的、近乎原教主義的態度，“唔理三七二十一”，政府有很多服務也可以不提供了。主席女士，此舉除了影響公務員的人手編制，亦影響了公務員的士氣，令他們的職業嚴重受損。同時，我要再三提出警告，政府這種做法，已令基層的勞力市場一再失調。同時，在制訂就業及勞工保障政策，讓基層勞工可以自食其力，過着有尊嚴的生活方面，政府是應該做好這角色的。我覺得這並不等於在“大市場，小政府”下便甚麼也不管。

政府其實有一定角色，但我不想困於政府或市場的簡單二分框框裏轉，而結果是兜兜轉轉之後，只是繼續原地踏步，繼續肯定相信市場將會得救。

因為除了政府及市場之外，我認為第三部門可以是其中一項補救市場失調，代替政府干預的可取之道（**alternative**）。行政長官在 2000 年施政報告中認為第三部門是“處於市場與政府之外的非牟利或志願工作環節”，“並往往能為一些市場和政府都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找到出路。”。原文讀完了。這是當年，即 2000 年行政長官說的。可惜 4 年以來，政府沒有在這方面進行過任何工作。

當時，我空歡喜了一場，我更找來了現在已辭職的局長——我們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他說要鼓勵一些商界來幫助我們現在已失衡的勞力市場，來共同度過難關。政府沒有做甚麼，只做了一件事，便是設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這個基金的款項非常少，明顯地未能觸動我們香港商界，不像美國般能利用稅制鼓勵商界，從而協助弱勢社羣。

全球經濟一體化，第三部門在歐美相繼發展，全美國有 76 所大學與學院有開設以非牟利組織管理為核心的碩士班。美國有些基金是由政府或政府透過政策鼓勵的商界支持基金，讓非政府機構申請提供服務，讓市民重建社區經濟，創造工作機會等。

主席女士，我在 2001 年左右曾前往美國訪問近 1 個月。我看到很多這類基金及這些第三部門協助弱勢社羣、少數族裔衝出困境。由於香港現在仍未有第三部門，如果貿然說這些話，而不理會基層所面對的困難，這個“大市場，小政府”又應否獲得支持呢？

跳出“大市場，小政府”的二元討論，我認為政府及私營企業不應只作壁上觀，而應在政策、資源及具體運作上協助第三部門發展社會服務及創造就業機會。多謝主席女士。

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大市場，小政府”，一向以來是自由黨的主張，我們認為以精簡政府架構來體現“小政府”有兩個效果。首先是可以增加政府的工作效率，減少官僚習氣；其次，令政府公共開支運用得更有節制，而無須推行加稅或加費等擾民措施。

所以，我們希望當局能夠堅守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所作出的承諾，在 2005-06 年度將政府編制降至 16 萬人。因為特區政府的編制與其他國家相比，是相當高的，例如“香港 2030”的專家顧問郭國全在去年透露，英國每名公務員要服務 120 名市民，但本港在這方面的比例只是英國的三分之一，即每名公務員服務 40 名市民。況且，香港公務員更無須負責國防及外交等職能，比率之低實在令人詫異。

自由黨希望政府精簡架構後，如期將公共開支降至合理水平，如由目前佔 GDP 的 23% 降至兩成以下，才符合小政府的構想。當然，我們是不主張“一刀切”削減人手編制，而是要各部門認真檢討需要，以決定增減編制，我們不希望因此而影響公務員的士氣。

主席女士，要營造“大市場”的良好環境，政府也應推出鼓勵投資及創業的政策，加強吸引外商來港投資，製造就業機會。在政府即將推行的法例中，仍然對營商環境有很大的限制，等於是加重營商成本，令他們經營困難。

例如，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打算大幅增加工商業污水附加費達三成，這勢將大大加重營商成本。尤其是目前有關的上訴機制仍未完善，令業界在上訴過程中，最低限度要花大量金錢做抽取水辦的化驗，而測試的要求又高又繁，令業界難於上訴，甚至被迫啞忍，這對用水量大的業界，包括工業界及飲食界而言，都是極不公平。

本人曾經在 2001 年 11 月動議“改進營商環境”的議案，要求政府在推行新法例前，先審議會否影響市場。隨後在自由黨的不停的影響下，當局終於在今年，成立高層次的經濟及就業委員會，並設立改善營商的小組，為市場拆牆鬆綁。我期望有關的小組能檢視現行及將來會推行的措施及法例，全面評估受影響的範圍及程度，從而作出改善。還有，針對目前繁瑣的發牌制度，我們再一次促請當局設立統一發牌機制，這樣才會更有利營商。

此外，我們也同意引入私營界別的力量，進行更多的基建工程項目，例如當局可以考慮用 BOT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及 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甚至是 DBFO (design, build,

finance, operate)，即設計、施工、融資、營運等模式，加強基建及公營服務的效率，增加市場參與公共服務的機會。

其實，無論是善用公帑，還是節省公共開支，皆是自由黨一向的訴求，因此，我們是支持原議案及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的。

至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由於她要求政府確保不影響公務員人手編制，按此推論，根本不可能做到精簡政府架構，更遑論要如期減赤，這與原議案的理念根本就是南轅北轍，因此，我們只能反對這項修正案。

其次，對於制訂勞工保障政策方面，其實香港的勞工權益保障已做得很好，包括保障婦女的分娩假期、超時工作限制、禁止聘用童工的規定、最近的《職業安全及健康（顯示屏幕設備）規例》都進一步保障了僱員的安全。

最後，我們都希望大眾能活得有尊嚴，要達此目標，一定要待勞工界自食其力，那當然是給他們有工作的機會，而改善營商環境，促進投資，相信是達致這個目標的必經之路。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基於自由市場的理念，經濟活動由市場主導，政府扮演推動及支援角色，是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元素。然而，面對市場不景氣及經濟轉型，政府近年在市場活動的參與，稍為偏離了原先的定位。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同年的財政預算案亦訂下落實原則的 3 項政策，正好重新確定香港經濟以市場主導的發展方向。

經濟發展須有有利於營商環境支持，而一個好的營商環境首要條件便是方便營商。削減繁瑣及過時規則、精簡工作流程，正是落實“大市場、小政府”原則的政策之一。方便營商計劃自 1996 年推行，8 年以來落實了 370 項改善營商環境的措施，可惜的是，政府部門架構冗重、工作程序繁瑣的情況，仍然為人詬病。

問題至今仍然存在，歸根究柢，是各政府部門之間欠缺溝通，導致未能將重複、不必要的工序精簡，拖低了行政效率。要創造更佳的營商環境，就先要加強各政府部門的協調，這樣才可切合實際需要，將各項商業法例完善，以及有效地簡化各項營商牌照的審批程序，將各種不必要的營商障礙清除。

政府不與民爭利，只在政策上配合而不直接參與市場活動，是香港營商環境吸引之處，在去年的預算案亦再三被肯定。政府有計劃逐步將公營機構走向私營化，亦是基於這種想法。

公私營機構夥伴合作，既可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增加投資機會，亦可透過簡化決策程序而提高業務效益，可以說是政府與商界雙贏的方案。其表表者有郵政服務及機電工程。以教育事業為例，香港不乏高質素及具經驗的教學機構，加上有內地龐大市場需求的支持，已具備條件將教育事業發展成為產業，目前欠缺的是管理者。政府須做的，不單止是直接撥款興建學校，而是向辦學機構提供貸款，鼓勵它們開設寄宿國際學校，從內地自費學生市場作起點，拓展香港的教育產業。

公私營機構合作亦可應用到旅遊事業上，例如不同類型博物館的營運及管理方面。當然一些以教育為目的或具歷史性的博物館，雖沒有商業誘因但具保留價值的，便應該繼續由政府資助以非牟利模式運作。至於具趣味性的博物館，則應視作文化旅遊項目來發展，吸引私人機構及商業機構合作，將商業及私人資源納入文化發展事業內，引入商業原則運作。基於“大市場、小政府”原則，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須擔當支援及從促進旅遊事業出發的宣傳工作。

正如議題所指，切實履行“大市場、小政府”的其中一個目標，是避免政府與私營機構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在功能上重疊。我們明白部分行業的而且確有需要政府提供服務以推動發展，但切忌與民爭利，近日有部分展覽業人士對貿易發展局舉辦的展覽工作的批評，便是很好的例子。我們希望政府汲取經驗，在推動行業發展的同時，避免與民爭利，更要小心衡量以取得平衡，亦須加強與各相關業界的溝通，促進彼此之間的瞭解，令香港的營商環境更和諧。

主席女士，其實，我們亦擔心政府很多時候以簡單的“大市場、小政府”原則來推行政策。最近，我們知悉政府已決定引入私營機構的計劃以興建和管理康樂文化設施，雖然我們覺得這種做法更靈活，令文康活動更為多姿多采，但我們亦擔心政府為了實行這個簡單的理念，而大幅削減應要承擔的社會服務，導致市民的生活和基本文化需求不能健康發展。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香港的一些康體服務或活動基本上處於非常困難的處境，政府既不給予任何支援，而商界亦覺得資助沒有賺得任何盈利，所以不予贊助，因此，政府在這方面應該作出承擔和支援，這是責無旁貸的。

多謝主席女士。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們很多謝吳亮星議員提出有關“大市場、小政府”的議案，亦給民主黨一個機會說一下我們對這個社會政策及經濟政策的看法。

首先，民主黨是在逐漸蛻變，而社會亦開始蛻變。以往，香港是一個流動性非常高的社會，很多草根階層藉着自己努力進入大學，拿取專業知識，接着成為中產階層。所以，在香港，中產家庭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憑着自己努力、透過市場競爭、社會晉陞機會，改進自己的生活條件，對香港充滿信心，對自己的生活表示自豪。然而，改變已出現了。隨着全球一體化，基本上，資本是哪裏成本低，便轉移到哪裏的。

香港亦受全球一體化影響。面對經濟轉型，很多中產家庭已出現工作不穩、入息不穩的情況，社會流動性亦開始出現根本變化。民主黨體會到這個結構性的社會改變，所以，我們的政治定位要逐漸開始適應這個社會改變，好好服務草根階層和中產階層。

中產階層以往支持民主黨，是支持民主黨的政治信念，包括人權、自由、公平競爭、自我努力。在社會經濟方面，他們是憑着自己的努力，對政府沒有甚麼需求。可是，隨着全球一體化及經濟轉型，他們的工作開始不穩定，而對民主黨的要求亦開始變得複雜，可說是豐富了。除了政治信念外，他們亦要求民主黨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能兼顧他們的利益。民主黨體察到這個改變。所以，在過去 1 年，我們已盡量將政黨定位由左邊慢慢偏向中間。我們的經濟事務發言人單仲偕議員已對我們說，我們現在的政經政策，可說是中間偏左。為甚麼要偏左呢？因為我們始終是關心弱勢社羣，這是我們的政治信念；但為甚麼要移向中間呢？因為要照顧中產階層。

除了要照顧中產階層外，我們亦體會到政府的負擔能力很有限。這便涉及稅制問題。民主黨支持低稅制、簡單稅制，因為這是香港生存的基本條件，亦是香港的基本，維持着我們的經濟競爭力，特別是我剛才提到的全球一體化。我們的競爭力一定不可削弱。無論怎樣，我們要全力保障低稅制和簡單稅制。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沖擊，如果香港的競爭力受損，我相信很多資本的轉移會令我們的經濟出現很大危機。所以，民主黨是非常崇尚低稅制和簡單稅制，因為除了我們的競爭力外，還要面對全球一體化的挑戰。

第二，民主黨是支持減赤的。如果不支持減赤，便是違反《基本法》，對嗎？減赤其實顯示了政府的負擔力有限，因為要維持低稅制。如果社會服務不斷膨脹，政府的負擔便會越來越大，赤字亦會越來越大。我們根本不想政府借貸度日，所以我們是支持減赤的。不過，我們只有一個擔心，那便是

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因此，我們對司長說，我們支持減赤，但減赤的時間表可否不要來得太快？我們當時問，可否有 3 年時限？現在，司長已差不多是兩年半後才開始減赤，這是較接近我們的構思，所以我們今次支持財政預算案。

回想起來，民主黨是首先建議政府發債的，因為那時候利息很低，人們將錢存放在銀行根本是沒有利息的。政府有很多資產是有盈餘的，例如隧道、機場、商場，基本上每年也為政府帶來很多盈餘，如果以這些資產發債，我們說一定有市場。事實證明了這個看法是對的。我們現在與唐司長合作無間，相信日後在這方面，我們跟司長的合作是沒有甚麼大問題的。

第三，在福利主義方面，民主黨其實是很清楚反對免費午餐的。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曾進行很多調查，問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那便是當市民遇到困難時，他們會用甚麼方法解決？七成被訪者也是說靠自己，兩成會靠家人，少於一成說靠政府。換言之，經過了七十年代，很多社會服務的發展令社會變得安定，但民眾始終認為自力更生這個價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民主黨亦提出了所謂責任福利的觀念，那便是說我們在有需要時，要接受社會福利，但到了我們有能力時，便應回饋社會。我想這個福利和責任的主張是很適合香港的。

第四，所謂公營和私營兼備，即 PPP 的問題。市場是有它本身的優點，效率較高，但有些地方是市場照顧不到的，須政府提供。可是，怎樣能公私合營呢？在這方面，我們其實可以再詳細研究。我們可以支持某程度的私營化，因為既可照顧政府的優點，亦可照顧市場不足的地方。

最後，時間差不多了，我是全力支持吳亮星議員的議案。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as early as the mid-18th century, the English economist Adam SMITH had been advocating free trade and market economy in his pioneering book *The Wealth of Nations*.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the lesser a government interferes with private business, the more prosperous a nation will be. In retrospect, the economist's concept of free enterprise capitalism has proven to be the cornerstone of many prosperous cities and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ong Kong was once very close to this ideal economic promised land advocated by Adam SMITH. That was in the pre-handover years when the then

colonial Government consistently adopted an active non-intervention approach and promoted a favourabl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same Government also strived to defend Hong Kong's core values which are prerequisites for our present success. What are these values? They are fair governance, rule of law,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maintenance of a level economic playing field, and a stable and benevolent government. While pro-market policies have established a firm foundation for Hong Kong's prosperity, these core values and sound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 together with resilience of its people, have also helped us to overcome economic difficulties over the years. Together, they have created an intervention-free environment where intrepid individuals can achieve their personal goals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wards the city's collective prosperity. In the short span of few decades, Hong Kong has matured into one of the world's major economic centre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ust be credited with making Hong Kong an economic miracle, a role model for free enterprise capitalism which has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many renowned economist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at of the late patriarch DENG Xiaoping, the architect of our presen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Madam President, the principle of "big market, small government" is therefore not a new concept to Hongkongers. Precisely, because of our deep understanding of it, many of us have grave concerns ab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governance. The question we keep asking is: Will the SAR Government practise what it preaches? Despite our Chief Executive repeatedly giving support to maintaining a small government in his policy speeches, many here would agree that his active non-intervention policies have increasingly given way to positive interven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increasingly engaged itself as a big, bureaucratic and omnipresent government. But wit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place now, having the experience of handling Hong Kong's economy, we are hopeful that we will not see a "大政府、小市場".

The economic slump of the last six years caught many by surprise.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have brought a new political awakening, driving many citizens to demand universal suffrage in future elections. This has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a strong opposition voice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stead of winning these Members through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and persuas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t times subconsciously sought their appeasement by, at times unknowingly, forsaking the principles of non-intervention in business policies, deviating from its sound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doing so, they are buying short-term peace at the expense of long-term prosperity.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they have disrupted normal market operations.

Madam President, now I would like to substantiate my argument by giving concrete examples. In the housing sector, the setting of an arbitrary supply target of 85 000 flats a year has been a form of absolute, direct intervention. That created a market collapse, plunging property values by more than 60%. Over 1 million homeowners have lost their wealth overnight. The supply of Home Ownership Scheme (HOS) flats is another case in point. The rationale for HOS — which uses taxpayer money to subsidize private home ownership — is no longer justifiable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post-handover years. The Government in its wisdom has eventually dropped these anti-market policy initiatives, highlighting and confirming its commitment to market growth and market economy.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has handed out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valuable land to the Mass Transit Railway, Kowloon-Canton Railway, the Airport Authority, the Cyberport and the Science Park, through private treaties grants. These then become backdoor routes for more land to be released into the market, breaking up and weakening the established supply and demand chain through competitive bidding. What is worse is that there is no effective public scrutiny of land subsidy for these commercially operated companies'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But the ultimate tragedy is that when the market's supply and demand of land is upset by this current "backdoor" policy, and the real property investors find that their investment plans are derailed and the value of their capital destroyed, the whole market sinks.

In the area of public transport, the policy of making railways the backbone of the transport network has been in practice for 20 years. But it is now tim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which has resulted in an imbalance between the railway companies and the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 Should the Government not give commuters a choice in the matter and let the market forces play?

Similarly,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o often, regulatory practices from overseas are introduced to our local secur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name of keeping ou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owever, these rules do not always fit our system. Rather, they end up scaring away potential investors. Certainly, in my opinion,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n over-stringent approach in regulating a wide variety of market activities. A favourable market environment is not created just by regula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role of a regulator,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the part of a facilitator, too.

A small government should instead focus on policies facilitating marke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on the provision of essential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has a jobless rate as high as 30% presently. Has the Government genuinely listened to the sector's urgent demand for a wider practice of th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scheme to create more jobs and employment?

All in all, a small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a heavy hand in controlling the market. It should know where its limitations are. It is not the Government's job to tinker with the market or guide prices, however tempting that may be. Instead, it should defend the real core values we commonly share. With these words, I support the motion.

譚耀宗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一個新的綱領，名為“市場主導、政府促進”，這完全是“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我們支持“小政府”理念，是希望政府有效益地運用公帑，避免浪費，不應與民爭利等，但同時我們要求政府要做好經濟和社會的基本設施，例如保安、運輸基建、環境、教育、醫療等。因此，政府不能以“小政府”為借口，大力壓縮基本的公共服務，例如嚴重影響到公務員的人手編制及職業保障，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我想舉數個例子來講述一下這數方面的問題。第一，是關於紀律部隊文職化的情況。大家都知道，社會的秩序是靠紀律部隊來維持的，一支專業、持平及高效率的紀律部隊，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可是，在今年年初，政府的效率促進組曾就 5 個紀律部隊部門，包括警隊、懲教署、入境事務處、海關及消防處進行“文職化”檢討，在各部隊內引起極大回響，員工人心惶惶，士氣受到打擊。

這數年來，各紀律部隊部門其實已經採取了不少節流措施，例如將部分非核心的工作外判或由文職人員處理，從而達致善用資源的效果。由於這些改革措施都能夠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廣納職方的意見，又顧及行動上的

需要，故此效果一直良好。可是，今次效率促進組有“一刀切”之嫌，使員工質疑政府是否借檢討為名，實質是要採取非常手段削減部門的資源，以及剝奪員工的權益。

紀律部隊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有兩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團隊精神，另一個是應急的支援能力。對紀律部隊進行過急及過度的“文職化”，恰恰會破壞這兩個重要因素。紀律部隊一向注重團隊精神，官階明確，分工清楚，如果將大量紀律部隊工作轉由文職人員負責，兩種不同的文化和傳統不但難以融合，反而會沖擊彼此的合作關係，破壞團隊精神，嚴重影響對社會整體的服務水平。其次，紀律部隊經常都要面對突發事件，處理突然增加的工作，在紀律部隊一體化的情況下，部門首長可以靈活調配人手予以應付，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若將紀律部隊內的後勤職位大幅度由文職人員出任，必然會削弱各部隊的支援能力，遇上突發事件時，將難以迅速調配足夠人手處理，令社會秩序失控，後果非常嚴重。

維持社會穩定和秩序良好，不但是市民安居樂業的基本要求，更是吸引更多外來投資者和遊客、保持國際都會地位的重要條件。因此，雖然面對嚴重的財赤，政府都不應對紀律部隊採取過激的“文職化”措施，必須全力維持紀律部隊的專業性及穩定。

第二個例子涉及食水的供應。食水是市民的最基本需求，食水安全及供水的穩定是社會的命脈所在，因此如果政府是為了達致縮減編制，而犧牲食水的安全，我們是絕不認同的。最近，政府建議以公私營機構夥伴合作模式重建沙田濾水廠，以及提供供水、配水和相關客戶服務。作為本港最大的濾水廠，沙田濾水廠每天為 300 萬市民供應超過 120 萬立方米的食水，佔全港總需求量的 40%。公私合營計劃不錯是可以減少 800 個水務處員工，但其他國家，包括美國、澳洲及菲律賓的水務公私合營計劃，許多都失敗收場，有些更要賠上市民的生命及健康。如果香港的食水供應是要依靠私人商業公司，請問政府有沒有足夠的監管能力來保證食水安全及廉宜呢？

我想說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公路的管理，三號幹線是新界西與市區的其中一條主要南北通道，但因為經營的公司徵收過高的隧道費，以致發揮不到交通分流的作用，三號幹線是有路少車行，而屯門公路卻經常擠塞到有車無路行。情況已維持這麼多年了，政府仍然一籌莫展。我們現在又要面對后海灣幹線通車，現在我們有關的局長還難以應付，所以這肯定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小政府”的結果。

主席，我們支持“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但絕不應該以犧牲基本的公共服務來達致。我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I have been making remarks in this Chamber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relating to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nd its role in our economy. I have been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o practise free market economy. I have been asking it to promote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I have been asking it to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by cutting red tape and streamlining its procedures. I have been asking it to remove unnecessary rul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may stifle the vital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 All these are fundamental to the "big market and small government" principle.

I am not going to repeat these points. But I must comment on the Government's misguided policies on the Civil Service which are advanced under the pretext of "big market and small government", and are driven by its obsession with reducing fiscal deficit.

Indeed, a team of clean and efficient civil servants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our pillars of Hong Kong. Unfortunatel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e past years to enforce pay cuts and even downsizing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order to achieve its objective of controlling expenditure on the Civil Service. All these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without the slightest regard to the morale of the Civil Service.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staff side, the Government has politicized the pay issue and manipulated public opinion to its favour in order to push through the pay reduction legislation in 2002 to which I strongly objected. Its action has totally shattered the trust and co-operating spirit built over the years between the staff side and the management. Moreover, the pay reduction controversy has caused a rif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civil servants. Nevertheless, the worries of the Civil Service do not stop here.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pondering ways to make further cuts to the fringe benefits of the civil servants. While the civil servants' pay levels and fringe benefits usually fall behind their private sector counterparts during booming times, it is most unfair that their pay and fringe benefits have to be cut in bad times,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he private sector.

Downsizing of the Government is a bigger concern of the Civil Service. I have no objection if the size of the Civil Service is to be reduced by voluntary retirement schemes and natural attriti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opted

to take a more drastic action. For example, in the works departments which I am more familiar with, many young engineers who have undergone training in these departments failed to get their contracts renewed upon expiry. Such employment policy which focuses only on cost consideration is very shortsighted. Sooner or later, these works departments will suffer from serious succession problem in professional grades with a clear absence of new recruits for an extended period. As we all know,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are the key to an efficient and reliable team of the Civil Service.

While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its policy on the Civil Service, I must sa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a right direction in seek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PPRD) Region which is also known as "9+2" includes nine provinces — Fujian, Jiangxi, Hunan, Guangdong, Guangxi, Hainan, Sichuan, Guizhou, Yunnan as well as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s the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said earli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PRD Region can greatly expand our economic hinterland and enhance ou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gether with the benefits offered by CEPA, it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s in many sectors of Hong Kong, including logistics, investment, tourism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Talking about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the engineering sector, I deeply believe that the huge mainland market offers huge potential as long as the high entry threshold set for Hong Kong firms and the problem of 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can eventually be sorted out, the sooner the better. In this respec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Economically speaking, the prime role of a government is to create a better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the business sector. Madam President, we should not be asking too much if the HKSAR Government is expected to do the same for Hong Kong businesses to thrive not only in Hong Kong, but also in markets outside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Mainland. With these remarks, I so submit.

Thank you.

李卓人議員：主席，剛才很多發言的議員均支持“大市場、小政府”，為了有進行辯論的理由，不如讓我反對好了。但是，反對其實沒有意思，支持亦沒有意思。為甚麼呢？因為其實甚麼叫“大”，甚麼叫“小”呢？如果按照全世界的水平，如瑞典般百分之五十多的 GDP 是公營的，公共開支佔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多，那個才真的算“大”。香港現時是 22%，其實正下降至 21%，將來會降得更低。香港現時所佔只有 21%，即使將來有機會增加至 25%，是不是便真的是大呢？25%也可以說是“大市場、小政府”。所以，討論是否支持“大市場、小政府”，其實沒有意思，視乎甚麼是“大”，甚麼是“小”而已。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我覺得香港現在很“小”，在全世界的水平來說是非常之“小”。今天應該討論的問題應是既已如此“小”，是否還要讓它再進一步“小”下去？大家不如集中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在聽下去時，很多人叫政府這樣不要做，那樣也不要做。這個不做，那個也不做的話，在某個程度上，便覺得政府不可以再“小”下去了。

我的立足點很清楚，政府現在已經夠“小”，不要再“小”下去，並且有空間可以再“大”一點，就是這麼簡單。為何我有這樣的立足點呢？其實，一直以來，我們與政府就每個政策的細節進行討論的時候，發現議員在很多事情上也要求政府多做工作。如果真的是要政府多做工作，現在便不可以支持政府一直“小”下去。我在此舉幾個例子，讓大家研究一下。

第一，就是如何才算是令它變“小”？政府其實說得很清楚，它只有幾個招數。第一招就是減少公務員的數目，把整個公務員的架構縮小；第二招，很清楚，就是削減所有開支，現在有一個很清楚的時間表，大約到 2008 年左右，便會減到 2,000 億元。大家計算一下，如果開支在 2008 年達 2,000 億元的話，我們的公共開支屆時其實已佔整個國民生產總值大約 17%，返回到 1997 年之前的水平。

大家試想想，如果到了如此“小”的地步，我們的社會是否能夠支持得住呢？會不會出現一個“大市場，小政府，市民負重擔”的情況呢？雖然我問會不會，其實我的結論很清楚是會的。否則的話，錢從何來呢？從樹生長出來嗎？一定是不會的。最後，如果是“小政府”和縮減開支的話，不是要削減服務，就是要市民付更多，只有採取其中一個方法。

我們以往一直有提出一些較實際的例子，例如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是教育開支。說到教育，今天下午又有一些老師進行絕食，他們絕食的原因其實是縮班和超額教師問題。我經常說，如果推行小班教學，根本還有空間要聘請更多老師。如果要聘請更多老師，要推行小班教學，那“小政府”如何推行呢？除非全部私營化，但私營化不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要市民負重擔嗎？豈不是不能提供平等機會？

其實，直資學校現在也在走這條路，部分學校轉為直資，我覺得是可以的，因為不是所有人也得付貴學費，但為大家提供了一個選擇。可是，沒錢的人也不應為此而減少了機會。在教育方面，我們是否須削減教育開支呢？

在醫療方面，醫療開支亦正在削減，將來可能還考慮融資，市民要付更多。由於醫療開支真的越來越貴，最後市民也可能要付更多錢，但是，削減開支的限額應達到哪個水平呢？是否一直削減下去呢？我認識一些病人，每個月要付萬多元藥費，醫管局是不願支付的。試想想，每月萬多元，吃那種藥每年要付 18 萬元以上。我也認識一個人，這人因為沒錢，他的太太最後死了。我問他為何不透過醫務社會工作者提出申請？他說不可以，因為那種藥是不納入公營的部分的。

我們是不是希望香港社會達到這個地步呢？社會福利也出現同樣情況。在提到天水圍事件的時候，大家又起鬨要加強家庭服務。起鬨是正確的，但我覺得大家在起鬨之後，大家要一致（consistent），不可以支持政府一直把開支削減下去。福利方面也如是。

在公務員方面，這樣繼續下去的話，穩定就業的人便越來越不穩定。斷層的情況現在越來越嚴重，勉強把公務員人數限於 16 萬人，便會出現斷層，亦造成就業機會的問題。很多議員經常說要政府解決失業問題，但我們怎可以支持一方面解決失業，另一方面又支持政府削減工作機會呢？不管是合約的非公務員，還是公務員也好，均是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政府很多時候怎樣精簡架構呢？亦要靠外判，但外判又是另一個問題。明顯地，在進行外判以後，每兩年倒閉一次，然後兩年減一次工資，以致工資水平越來越低。我們是否想看到這樣的政府呢？政府是不是一直這樣地縮小下去？所以，我很清楚地反對政府這樣縮小下去，我也覺得如果要減赤的話，應該是考慮讓有能力的人付出更多，而不是純粹單靠縮減。浪費的地方當然要縮小，例如維港巨星匯那些，當然是不可以。我希望政府能視乎情況去做。

最後，關於福利主義，我想回應一句話，那句話：免費午餐，是大家所濫用了的。其實，最低工資不是免費午餐，而是較有尊嚴的工資而已。多謝代理主席。

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對於“大市場、小政府”的建議，本人一向深表認同及支持。事實上，本人並不只一次批評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越俎代庖，政策思維多多，以致影響市場本身的自由運作。究其原因，是政府始終未弄清楚自己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甚麼，在飾演男主角的時候，往往又兼做女主角，連配角、大配角，甚至“茄喱啡”也照樣做。試問這樣拍攝出來的電影，質素會有多高呢？因此，政府現在是時候放下一些包袱，專心致志完成本身應該做的工作。

如果特區政府能本着“小政府”的原則運作，切忌不務正業，隨便插手干預商業市場運作，盡量放手讓相關業界去辦，則可以增加市場的投資機會。現時，香港有近 30 萬家中小型企業，僱用的人口佔香港整體勞動人口高達 95%。中小型企業的老闆多是中產一族，政府經常表示要協助中產階層，暗地裏卻又剝奪他們的投資機會，令人懷疑政府是否有誠意協助。本人認為只要政府能夠減少干預，把商機留給業界，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話，不僅對中產階層有利，甚至勞動階層也會因職位空缺增加而從中得益。

過去，香港的經濟發展之所以能突飛猛進，與政府堅持自由貿易政策及積極不干預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秉承過往的傳統，專心扮演經濟推動者的角色，主力負責制訂有效的政策，為商界創造一個理想的營商環境平台，協助他們降低營商成本及消除不必要的掣肘。可是，環顧現時香港很多行業，包括飲食業、娛樂業、旅館業等，他們在發牌經營方面均遇到不少困難，例如申領牌照時間過長、手續過於繁複、條件苛刻等。政府實在應精簡其運作架構及提高行政效率，以營造一個理想的政策平台，協助各行業發展。這方面的工作，現在顯然做得不夠，有待改善。

事實上，港進聯就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所提的建議當中，亦曾提議將一些具盈利潛質及優質的基建項目轉交市場營運，以充分體現“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財政預算案第 94 段中亦作出了正面的回應，希望港府能夠真正做到言行一致。

代理主席，環顧現時港府的架構，實在是過於“肥胖”，所以堅持實行“小政府”模式，就好像為政府進行“纖體療程”，對提高行政效率、節省公帑皆有利。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有 300 萬人口，聘用約 6 萬公務員，而

香港有 700 萬人口，卻聘用 17 萬公務員，接近人家的三倍，估計到 2006-07 年度，仍只可削減至 16 萬人。本人認為政府應確保在不影響現有公共服務質素的前提下，減少插手管治範圍以外的事務，以精簡架構，提升效率。

不過，奉行“小政府”原則，並不等於政府可以放棄承擔某些社會責任，例如照顧弱勢社羣、為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生活保障等。以上皆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政府不應以實行“小政府”原則為口實，隨便削減援助，以免影響到有需要的市民。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MR BERNARD CHAN: Madam Deputy, although Hong Kong has a reputation for having a "big market and a small government", it is not really true. Nearly half the population depends on the public sector for housing — far more than in any capitalist economy. More than 90% of hospital care is provided by the public sector. And,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easily the biggest employer in town.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seen the Government taking on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in the economy, and spending more and more of our money. In some cases, they are for good reasons. During the difficult economic times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does need to step in, for example, to assist those who cannot help themselves.

However, we have also seen the Government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volved in areas which should be left to market forc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n obvious example is the attempt first to bring property prices down, then to push them back up. Official interference made things worse. All the Administration had to do was nothing. The volatility in our property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deflation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far less, if the Administration had simply stood aside.

Another example is the Government's attempt to allocate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than market forces. It decided to grant expensive land at low prices to encourage hi-tech, science and tourism. So, we have Cyberport and the Science Park.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Hong Kong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se secto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simply auction land off to

the highest private sector bidders, and let them decide what to do with it. They will not waste it on something which loses money or brings low returns.

The Government has gone into business as a money lender and venture capitalist, offering funds t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e film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developers. The returns on this financing are terrible. The Applied Research Fund has lost \$200 million. Th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und has spent \$1.4 billion on projects, most of which are useless. If this wealth had been left with the people who crea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it would have been used far more productively.

These are just a few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public sector competes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or overrides market forces. It wastes resources. It deprives the private sector of opportunities. It sends a very bad messag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t tells them that the Government runs the economy — it plans it, it steers it, and it controls it. This is a dangerous message to send out.

It might even be against the Basic Law. After all, the word for this sort of system is "socialism". Article 5 of Chapter 1 of the Basic Law says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policies shall not be practised" in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op trying to manage market forces and participating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We will se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can keep out of the market when the question of a centralized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system comes along in the future.

Lots of people like the sound of this idea. Employers think it will be cheaper. Labour organizations think it will be more dependable. It has been tried overseas. In the only places where it has worked, centralized employees coverage has ended up costing consumers more than a competitive, private sector system. All the evidence is that competing insurance providers are the best at pricing and managing risk, and offering competitive prices to customers. There is also evidenc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driven by the profit motive, does a better job at pressuring employers into improving safety in the workplace.

Madam Deputy, I am sure most of my Honourable colleagues in this Council will be voting in favour of this motion, and for the principle of "big market and small government". I hope many of them will still be here after the

election in September. I expect they will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issue of a central employees compensation scheme. I am sure when that time comes, they will be consistent and they will vo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mall government principles.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ssued the results of its annual surve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s. The survey provides a very interesting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It showed that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declined from 13.5% in 1992 to just 4.6% in 2002. Over the same period, our services sector grew from 78.8% to 87.7%. This trend is continuing. In the three years to 2002, net output in all our service sectors grew at an average rate of 2.4% a year, while net output in our manufacturing sector fell by 9.2% a year.

Some people may find this alarming, but there is nothing unusual about it. There are few, if any, factories left in London or New York City. Like us, they have become major trading centres and exporters of high value-added 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s. Of course, Hong Kong owns a huge manufacturing sector, but it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where it is economically viable, and provides a lot of business for our service sectors.

If Hong Kong investors wish to build factories on this side of the border, then I wish them the best of luck. But I do hope they will not be expecting any subsidies or other concessions from the rest of us — the part of the economy which makes profits, pays tax and creates jobs.

I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s not viable here without some sort of handouts, then let us just keep it that way. Thank you, Madam Deputy.

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大市場、小政府”這 6 個字跟很多口號式的原則有同樣的問題，很多時候抽象的東西人人都可以支持，但具體實行的時候，爭議便會產生。

對於李卓人議員的意見，我並不太贊同，但剛才他發言時，開頭幾句話我卻是非常同意，即使大家都同意我們應該推行及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但並不等於政府會進行這項政策。政府應否進行那項政策呢？對於甚麼事政府應該管，甚麼事不應該管，如果說我們拿着這 6 個字來量一量，

大家便會同意，這是不會的。剛才在陳婉嫻議員、譚耀宗議員等的發言中便說明了這一點。

陳婉嫻議員和譚耀宗議員都會支持原來的議案，李卓人議員就表示，為了辯論起見而不支持，但我完全理解他背後的道理。不過，我覺得是有危險的。如果我們將這 6 個字：“大市場、小政府”看成一個科學的規律，是一條很嚴格界定的公式的話，即拿着這東西作為基準，量一量政府應不應該去做一件事，這是很危險的。反而很多時候，我們可見是因應一個時期的政治經濟環境而使用這個口號，那麼，這口號便可能有些用處。例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所謂小政府理論大行其道，我們看看當時美國和歐洲若干的國家都是保守勢力擡頭，政府的政策都是右傾的，由於當時的情形是這樣，於是小政府的理論便大行其道。

我記起香港回歸後不久，我出席了一個研討會，好像是由商界主持的，是邀請英國政界當年主持私營化的一些權威人士到來介紹私營化的成功地方。當時，大家聽後都覺得精采，拍爛手掌。但是，我記得今年較早時候，立法會亦招待了一位來自英國商界的權威人士。他跟我們說：“不是，我們現在覺得私營化有很多東西都不行，現在我們英國也重新辯論過，並在檢討中，例如鐵路服務就不見得私營化後便改善了，還可能有很多問題。”我便回應我們正在想將我們的鐵路私營化。所以世事的發展往往就好像一個鐘擺一樣，有時候要承着時勢提出“大市場、小政府”，即當政府的干預是去到扭曲市場的規律甚至妨礙經濟發展，又或政府預起的包袱是重得這個社會認為無法承擔，這個“大市場、小政府”說法當然可能是合理的，而且是一種清醒的態度。可是，反過來說，當一個純粹市場的規律，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多不公平的現象，例如貧富懸殊或壟斷的出現，影響了真正的自由競爭，在這個時候，如果政府仍然都說奉行“大市場”而不加干預的話，便一定會造成社會的不幸，一定會造成很多矛盾。所以，最重要的地方並不是我們支持還是不支持這句話，而是我們判斷現在究竟在我們的環境中，甚麼才叫做“小政府”，甚麼才叫做“大市場”。

剛才有一兩位議員的發言我是有些疑問的，例如石禮謙議員，他現在不在席，他說其實這“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在以前的政府——很久以前，七八十年代時——已經建立起來了，非常之好，積極不干預，香港那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功，也是有賴於這個原則；彷彿在過去這幾年，是由於特區政府違反了這個原則，所以我們便出了問題。但是，我覺得他發言的內容，聽起來有些矛盾，例如石禮謙議員很自然地提到物業市場，物業市場是過去由政府干預得最厲害的領域，誰敢說以往的（即港英）政府對於這物業市場是採取不干預的政策呢？

石禮謙議員亦批評公屋建屋計劃。建屋計劃是一向都有的，而以往的政府也承擔了很多基層家庭的住屋問題，亦因為如此，在福利的其他部分，政府的開支是可以做得很少，是可以做得比較“孤寒”，因為房屋問題已解決了。同樣的是，過去，基於政府的房地產政策每年賣地收入成為了庫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收入來源，所以我們也可以長期維持一個比較低的直接稅率，就是這樣的。

當時也有很多經濟學者指出，有很多人認為香港稅率低，但有些卻屬於隱性的稅，好像在房屋上的負擔就是了。所以，我們不能夠從表面看，就說以往是不干預，反而現在說要取消公屋政策，兩鐵現在要研究公司化等。其實，現在才反而應該走向“大市場”的方向。

多謝代理主席。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今天討論這個“大市場、小政府”的題目的時候，我聽了數位議員的發言，到現在輪到我發言時，我便覺得慘了，我不知道說甚麼好了。為甚麼呢？因為我剛才聽到，特別是李卓人議員和曾鈺成議員所說的話，與我所想說的會很接近，而所舉的例子也會差不多。

事實上，我認為很真確，並且同意的是，當我們就這樣說“大市場、小政府”或“小市場、大政府”，其實只是說些抽象概念，沒有特別大的含意，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也要針對事實，針對客觀環境才可以，不能夠就這樣單靠一個原則來做。事實上，當我們說大市場，是大至怎麼樣呢？小政府，又小至怎麼樣呢？根本沒有一個規範存在。就這樣說這些沒有規範的空象和抽象的東西，真的沒有甚麼重大意思。

我們看回頭，例如今天我們要特別說到“大市場、小政府”這個概念的時候，肯定有一個概念。是甚麼概念呢？即是說以往我們一定是“小市場、大政府”那個模樣。如果肯定以往是“小市場、大政府”的話，我們便不斷要問一個問題，以我們過去的香港經濟來說，是否一直都是很差呢？如果我們看深一層，好像不是的，我們的經濟差，也只是這數年間的事。過去，在1997年以前，大家都覺得香港經濟是不斷繁榮，不斷增長的，我們更被人稱為四小龍之一。

如果我們現在說今天應該要走“大市場、小政府”的方向時，是否在說以往的方向不正確呢？但是，如果以往的方向不正確，為甚麼我們能夠躋身四小龍的地位呢？以及我們可以讓整個經濟發展、民生的生活水平、生產值

不斷上升呢？為甚麼呢？所以我有時候覺得，說這些話或提出這些方案時，不但沒有甚麼意思，甚至是很荒謬，因為我們不能夠實際地看問題。例如我也同意曾鈺成議員剛才所說。我們看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也好，香港經濟繁榮發展，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最主要的不是“大市場、小政府”，那麼，最重要的原因在哪裏呢？就是正因為有一個廉價的勞動市場。為甚麼我們有一個廉價勞動市場呢？就因為我們有公屋的提供。這個循環導致我們的競爭力加強，可以爭取到其他的國際市場，這便是香港發展的原因之一。我們不能夠否定這個事實，亦不能夠否定這段歷史。

以當時來說，是否真的就是“大市場、小政府”呢？不是的，在那時候，政府亦有干預，有參與，否則，便沒有今天的日子。因此，我們認為不可以這樣的，不單止是我們香港是這樣，美國也是一樣的。美國三十年代時的大蕭條，其後美國羅斯福總統推行所謂新政策，而這新政策就是政府介入社會，然後才將美國的經濟頹勢扭轉過來。如果美國政府當時不是介入社會的話，就沒有那美國在六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所以說，我們過去的做法是否真的不行呢？

還有的是，我們看一看今天的北歐國家，如丹麥、荷蘭等，它們的經濟發展都非常好。但是，剛才同事亦說過，以這些國家來說，政府的參與，實在不少於香港的。然而，他們在世界的經濟增長排名是名列前茅的，是否真的是人家才能做到，我們卻不行呢？我們是否要改變我們自己呢？其實，說到底，我也認為大小並沒有甚麼意思，最重要的就是制度是否好，如果制度不好的話，說大說小也沒有意思的。我們怎樣界定制度是好或是不好呢？就是例如能夠訂出來的制度，是公平的，是令競爭平等的，可以受到監察的，要是這樣的話，便較好了。例如我們今天看到，甚至我們已不斷批評，自從九七回歸之後，很多方面都是被壟斷、有所偏幫、不能公正地進行競爭，導致很多事情不但是發展得未必理想，而且還令民憤、民怨不斷增加，這些才是最不好的。

所以，在今天來說，我們不應該只說一個所謂大小市場的問題，我們應該確保我們的政府制訂一些政策符合目前的發展，無論是社會、經濟、政治、以至民生等，才是更有實效的。

當然，我們可見很多人會說，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會否導致我們的政府介入市場呢？但是，我認為介入亦不是一個原則正確或不正確的問題；問題在於原則，要視乎介入的時候，是如何介入，介入得是否適合。例如很簡單，我們最近看到政府作過很多介入，剛才李卓人議員也舉了例子，政府介

入了“維港巨星匯”、亦投資了在這些活動上，這是否正確呢？大家心知肚明，好或不好，大家都很清楚，這種介入就是不妥當的介入。

但是，我則認為有些事情是值得介入的。例如，過去我們一直都在說失業的情況不斷飆升的時候，政府是否有需要提供一些職位，讓我們一些因缺乏技術難以找尋工作的中年工友能夠找到工作做呢？這種介入便是有需要的，否則的話，我們的失業率便會不斷飆升，情況不斷惡化下去。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認為一定還要再看一看這個問題。我又要問，政府能否體恤得到市民所需的是甚麼？要介入些甚麼？政府不要只考慮一些抽象原則。原議案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在這方面，我認為一定是沒有人會反對的。然而，原議案同時提到要節省公共開支，我認為如果政府是浪費的話，當然是要節省，但如果是不顧一切，不理市民的需要，只是為削減開支而削減開支的話，我認為這樣的做法便不妥當，所以這方面一定要細心研究。

今天，香港經濟雖然回升……（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梁耀忠議員，時間到了。

梁耀忠議員：……但市民卻感受不到，所以我們不要只說抽象的話。

黃宜弘議員：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大市場、小政府”，給人一個感覺，兩者似乎是有關係的，是一條 **equation**。可是，實際不一定如此，不是說政府越大，市場便越小，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兩者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市場大，當然是大家想爭取的，但要市場大，我相信中小企業便應該掌握今時今日我們所說的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要好好地裝備自己，才可以享受經濟全球化的好處。政府是否小，我相信這是一個很主觀的看法。我認為政府不應該過大，但應該削減到甚麼程度，我相信政府當局會自己掌握。

我還想說一點，便是剛才吳亮星議員提到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每年參加的展覽的活動，似乎對私人代理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可是，如果大家看看貿發局每年所組織的展覽，一年比一年多，只是很多時候一些參展商因為種種原因沒法享受到展覽的機會而已。實際來說，私人的組織（**organizer**）如果做得好，我相信也有一定的競爭力。因此，我希望稍後司長向議員清楚解釋貿發局的角色，因為除了吳亮星議員外，我相信民建聯對貿發局的角色似乎也有一些誤解。多謝。

梁劉柔芬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我們第二個最後的議案，我也想稍說一點。自由黨覺得“大市場、小政府”是我們素來崇尚的一個概念，其實，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之一，亦是由於擁有一個“大市場、小政府”。我嘗試談談所謂的“大市場”角度。我們現在對於二十一世紀——或我們是否應該從政府怎樣能夠對市場作出貢獻，是否應該製造一個我經常稱為 **enabling environment** 的角度來看這個“小政府”——是如何推動市場能夠成為一個更大的市場呢？這個我在其他的 **panel** 中已說過很多遍。

我今天反而想說說的，是政府已答應了在 2005-06 年度，把政府的編制減至 16 萬人。我想預先作一點的提醒，因為其中會經歷一個減省的過程，一定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今天，報章上有些人已經說我們昨天“水浸了立法會”，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在未來不要因為這個過程的痛苦，又再來一次要“水浸立法會”。我覺得，在過程中，我們真的要預早理解到這個過程一定是痛苦的，以及準備怎樣把這個痛苦減至最低，這是我們已經應該考慮的。我覺得政府，尤其是領導公務員的部門，應該要理解到這一點，以及怎樣在這個過程中引入和注重管理文化、管治文化，還要帶領整支大軍都從這個角度去想，才能夠把這個沖擊減至最低。我希望李卓人議員和工聯會的同事，都從這個角度去想想。我們自由黨很樂意與所有政制中的人共同努力來做好這項工作。

其實，這個管理文化，不單止是在公務員中，我希望能夠在社會上多些推動這種風氣。有關的承擔力，即是說每個人的承擔責任的力度到達某一個水平，而且會認為是帶有着一種光榮來承擔，而不是一種被迫作的承擔。因為如果說是被迫的話，那種痛苦會更大。我說得好像很抽象，但我相信李卓人議員在工運的工作中會很理解我所說的是甚麼。將來，我們會有很多工作須一起進行的。這種風氣應該是由社會整體來帶動的，因為到了今時今日，有幾位有承擔的人士都下了台，社會上的輿論也各有不同的見解。其實，這是一種光榮的承擔。如果我們能夠從光榮承擔的角度去看事物，大家便會處之泰然得多，不會有爭拗了。我相信這是我們要去想的。

我再說回在建設制度上我們亦須重新思考，我們是否應該從架構上的減省方面着手？大家要從這個角度想，而不是從保持崗位、保持職位的角度來考慮。還有，希望大家都從“大市場”的角度來推動市場，使市場能夠更開放，即是使經濟更蓬勃，變得這 2 萬人要出外的時候，是有一隻很歡迎的手，在外面歡迎他們。這是“大市場”的角度，我想這正正是我們須思考的事項。

最後，我亦想談談，我們以前一直奉行的“小政府”制度，為何又能夠這麼棒呢？其實，我們不要忽略以前除了政府的法定架構外，還有一個諮詢架構，那個是非法定的，卻很蓬勃。但是，我現時看到它變得有點像跛腳鴨，為甚麼呢？原因是以往政府在那個諮詢架構中，是逐層“揀蟀”到下一個階層，但我們現在這下一個階層卻像是不見了。如果沒有了這階層，便很難吸引精英進入諮詢架構。這是一個互動的情況，我亦希望我們下一屆回來時，能夠同心協力想想這些組織內不足的地方，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代理主席，我可以看到政府在削減編制的過程會很痛苦。現在我自己也感受到我們各層次的同事擔憂很大。我們怎樣推動他們呢？一方面自己的心理要更平衡些，另一方面，社會上要更能接受他們，第三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當經濟更蓬勃，更具活力的時候，市場是會很樂意吸納各階層的精英。不要說到下一屆，就是由今天開始，我已很樂意與公務員體制中的任何機制的人士談談，尤其是經過昨天的“水浸”之後，那種壓力是不可以留至最後一分鐘才解決的。我希望在開始時便已經能夠與大家共同努力進行這件事。多謝代理主席。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在不同場合都表明香港奉行的是“小政府”路線，強調在市場經濟之中，私營經濟才是繁榮的要素，所以“多扶助，少干預”，便是政府的基本哲學。不過，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最少在環保問題上，這種說法便絕對不是事實。要說的事例實在很多，今天，我就只以處理垃圾作為一個環保的典型例子，以說明我的看法。

代理主席，本人過往多次在本會發言時，已經不斷重申，不論在減少垃圾，以至如何處理垃圾的工作上，特區政府的做法均與其他先進國家和城市大有分別，更與“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背道而馳。

首先，特區政府寧願死抱僵化的政策教條，也要堅決反對採納業界、環保團體和我們議員的一致訴求，始終不肯利用“四兩撥千斤”的方式，為環保工業提供有利的營商環境，從而引入私營企業的力量來解開垃圾長期堆積的死結，反而堅持獨力包攬幾乎所有的垃圾處理工作。在缺乏誘因，垃圾回收無價的情況下，回收率自然難望有效提升，導致本地垃圾的回收成效，長期以來都遠遠較鄰近城市遜色。

這種“由上而下”的做法，既缺乏效益，又必須設立龐大的監察架構，最重要的是浪費大量公帑。

代理主席，單是我們的堆填區，今個年度估計便要用上 11 億元，如果把收集、運輸和其他相關的開支一併計算，用於垃圾處理的費用，每年便高達 55 億元。即使本會上周通過了拆建廢物堆填區收費，但對於減少這方面的公帑開支，也只是杯水車薪。

我們實在想不通，既然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表示願意預留 12 億元，用以推行 3 項就業措施來紓緩青少年的失業問題，為何反過來卻不肯靈活地透過政策及稅務優惠等手段，為同樣能創造大量職位的環保工業，提供一點實質性的扶助呢？

目前問題明顯不過，便是現時根本欠缺一套明確的鼓勵政策，推動私營企業發揮市場力量，分擔龐大的垃圾整治工作，反而完全沿用過往的模式，由政府一力承擔所有環節。如果情況不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投入大量的資源，也只會有如泥牛入海，事倍功半。這也是垃圾問題長期無法有效解決，堆填區加速滿溢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雖然推動環保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創造財富，但事實上，只要扭轉錯誤的政策方向，政府不單止每年可省回五十多億元的垃圾處理開支，更可創造大量職位，兼且可推動環保工業茁壯發展，創造出數十億元的經濟效益。一加一減之間，相差便超過百億元。

環保產業被專家認定為二十一世紀的主導產業。單看內地環保產業每年平均增長達到 15%以上，便肯定是最具潛力的新經濟增長點之一。香港哪怕只享受到其中 1%的生意額，也是一個極可觀的數字，況且同時還會創造大量職位。

事實上，眼見這種情況，我在 1999 年年初便在本會提出“檢討廢物管理政策”的議案，促請政府制訂一套扶助政策，扶助本地建立綠色工業，藉此把握龐大的商機。同時，各界過去也就扶助環保工業提出了不同形式的建議：包括設立環保工業基金；向業界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低價批出環保工業用地，以至將部分空置工廈轉為環保工業中心等，可惜政府至今仍未有任何回應。

本人在此利用本屆會期的最後一次會議的機會，希望再次促請政府，必須以開放的態度，為本地的環保工業和廢物處理等引入市場機制，避免環保

工業，特別是回收再造業陷入自生自滅的惡性循環，否則最終犧牲的，始終是我們的香港，我們的環境，以及香港市民。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我非常同意剛才李卓人議員和曾鈺成議員所說的觀點，即是說“小政府、大市場”的觀念是非常空泛的。何謂“大”，何謂“小”，都是一些相對的概念，如果沒有具體數字和指標作為分析，辯論便會流於空泛。

我着重要說的反而是，今天的議題其實牽涉到很根本、很有趣味的政治和社會哲學或政策的討論。其主要的論點是政府和市場的界線在哪處，換句話說，政府在一個市場或一個經濟體系內所應扮的角色和功能。實際上，在今天，大部分的自由市場或資本主義社會中，較少爭論的一些社會功能，包括例如對市場秩序的管理以確保自由市場的運作，確保一定的公平競爭，政府一方面要消除一些貿易的障礙，同時須確保沒有市場的不公平壟斷。以往，立法會也替政府制訂了很多政策，例如金融市場規管等。所以，縱使間中有人說是過分監管，但在大體上是有共識的，即我們要確保公平競爭是有適當的監管，足夠的披露、透明度和公平競爭。

另外一點是，政府的介入是要確保公眾利益。公眾利益通常是市場參與者不大願意付出成本加以照顧的，包括環境保護、工業食品安全、消費者權益等。這些當然有時也是會有些爭辯，應保護到甚麼程度，公眾利益的界線應定在哪處，但大致上對政府應有這功能也是爭論不大。

此外，政府當然要維持社會上最基本的服務及確保這些服務的質素，有很多工作一定要政府執行，例如維持公眾秩序、保安、公共衛生、基建、公共交通等。然而，最近有一種觀念是，有很多工作是可外判的。剛才曾鈺成議員提及，我們參加過一個研討會，英國有一些專家來港發表，說甚麼才可作外判，怎樣外判才做得好。他們提到太陽照到的任何事物也可外判，沒有甚麼不可以，甚至監獄的管理、一些紀律部隊的工作也可外判。我還記得我曾舉手問他們：“一個政府的管治可否外判？租界是否可行？”我記得他們回答不大清楚。不過，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究竟我們可外判至甚麼程度呢？當然這是個很哲學性、很理論性的辯論，政府並沒有說警察要外判或任何工作也外判，不是這樣的。但是，事實上，有一個爭辯是我們外判到甚麼程度，食水是否也要外判呢？剛才提及食水的處理。更有一點談到的是，例如西九龍計劃是否應把整幅地判給財團管理、作全盤設計呢？這些是會產生爭論

的。我們是反對的，我覺得不應到達這個程度。當然，今天的時間並不足夠仔細談到其中的論點，但有一點，即使外判，政府仍有一個不可推卸的責任，便是確保外判服務要達致我們要求的水平。

我們記得在公屋短樁事件中，我們曾作出研究，已外判的工作政府是否可卸責呢？是否可說不關它的事呢？專責委員會認為不是。其實，我覺得政府最後也同意“不是”，他們應有一個監管角色，確保運作和提供服務的水平，應達到所期望的水平。

當然，還有一點是政策的考慮，進行私有化，也應該視乎社會環境，整個社會局勢。我同意曾鈺成議員剛才所說，有時候是會有改變的，有些情況下是基於政治考慮而不能過急推行私有化，甚至要停止私有化。這可能是涉及政府對經濟扮演一定程度的積極角色，以確保例如失業率不要再飆升，以及有很多事情是要透過運作而取得經驗的。其實，大家在資本主義市場中還有很多要摸索，不過，完全認為私有化、外判的政策，便是有利、便是造成大市場，可以遏止公共開支，不是絕對正確的見解。我們對於這種看法有所保留。

最後一點要提及的，是政府的角色，它是有一個重要的角色，便是對公眾資源的管理，甚至資源調配。這裏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有穩定社會作用，例如照顧弱勢社羣、確保平等機會、確保基本人權保障等；第二方面，政府有責任促進和擴大市場，司長也提及政府有促進市場的功能。我們由頭至尾不反對政府採用吸引外資的政策，甚至很審慎利用一些優惠稅率，在適當時以低地價政策來吸引一些很特殊的工業，這樣可以製造大量就業。民主黨由頭至尾不反對這些，但認為要審慎從事，而不要予人覺得偏私和浪費。所以就這方面，不要再造成最近工業邨所引來的一些爭論。

有關公共財政方面，減赤是重要的，但我們要記着，如果不適當地或急促地進行，便可能會造成失業高企、經濟蕭條和社會不穩定。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吳亮星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這項有關“大市場、小政府”的議案吸引了兩個不大不小的修正案，本人善意及開放地請大家可以在研究後才對有關的修正案作出表決的決定。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將本人原議案中“節省公共開支”改為“確保政府部門善用資源，減少浪費公帑”。就此，本人認為這項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屬可有可無。因為在立法會提出的議案的措辭，應當在篇幅上做到盡量節省，精簡明確。原議案中“節省”之意，正正就是要善用資源，減少浪費，而並非要政府盲目地削減或無目的地減少支出。此外，本人亦須指出，本人原議案所強調節省的是公共開支，這包括政府開支，也包括其他的營運基金，甚至是房屋委員會等方面的開支。不過，單議員的修正案的用辭則予人似乎只是集中關注政府開支部分的印象，容易令人誤認為沒有考慮到在整體公共開支上，是否亦必須善用資源，減少浪費。事實上，現時政府的公共理財包括兩個目標：一，是削減財政赤字；二，是要將公共開支佔經濟的比重控制在 20%或以下。要達致這兩個目標，不但需要政府部門的努力，同時也需要其他使用公帑運作的機構一起將資源切實地用於為市民提供具效益的服務，減少浪費。因此，本人認為原議案的措辭已很明確是想達致全面促請政府最終履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精神。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至於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的措辭則令人感到有點疑惑，其中提出“合理運用公帑”而不指明節省開支，難以令人對消滅財赤有信心。至於提及確保公務員人手編制及職業保障不受影響，這點本人可以明白，因為陳議員是代表員方，所以必定會如此提出，但這與政府節流形成頗大的矛盾。本人認為不論是公務員，還是一般私人機構的員工，他們的工作保障除自身要努力、增值，具備競爭力外，最終仍有賴“大市場”的蓬勃發展來吸納人力，加上“小政府”得以長遠地穩健理財，才能達到整體效果。本人認同政府必須致力協助提升本地人力資源的競爭力，為真正沒有能力的市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並不適宜過分干預勞動市場，更不適宜干預工資水平或是設定“鐵飯碗”式的保障制度。如果勞動市場不能以最大的自由度運作，反而只會令投資者卻步，結果減少聘用僱員的機會，甚至減少稅收來源，最終亦會損害“打工仔女”階層的利益。

多謝主席女士。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非常感謝吳亮星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單仲偕議員和陳婉嫻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亦感謝剛才各位議員提出寶貴意見。在這個立法年度快將結束的時候，讓我藉着這個機會向大家講述一下，我們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所做到的工作。

我們深信“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是香港賴以成功和蓬勃發展的基石，因為這政策能有效地分配和運用資源、刺激創意、激發經濟活力，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只是在市場未能完全有效地運作，或為保障公眾安全等情況下才會積極參與。

在市場主導的大前提下，政府致力為各行各業創造更佳的營商環境，增強外商來港投資的信心。為達此目標，我們長久以來堅守法治，保持高效率 and 行政主導的政府，維持廉潔能幹的公務員隊伍，不斷提升整體勞動人口的質素，促進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我們更確保資訊自由流通，維持穩健的財政制度和健全的金融機制，奉行審慎的公共財政政策，以及實施簡單和清晰的低稅率稅制。

在行業的層面，政府自 1996 年已推行方便營商計劃，目的是要確保香港能提供有利營商的環境及維持香港作為最佳營商地方的地位。這項計劃涉及的主要工作，是要取締不必要或過時的規管，精簡及加快政府發牌及其他對營商有影響的程序。至今，我們已在這項計劃下進行了約 110 項方便營商的研究及檢討，並落實了超過 400 項改善措施。

為了能進一步深化這方面的工作，政府在本年 1 月成立了經濟及就業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之下，又成立了方便營商小組。小組會優先就建造業、物業發展業、娛樂業及零售業進行方便營商研究。研究會從用家的角度來瞭解規管對業界的影響，從而制訂更有效的措施，精簡運作架構和精簡過程，以期能夠提高行政效率，締造更佳的營商環境。

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一環，是要不斷提高公營部門的運作效率和管理服務質素。政府在這方面積極推行多項改革計劃，其中包括：

- 精簡架構；
- 推廣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共服務；及
- 革新提供服務的模式。

在精簡架構方面，在主要官員問責制實施以後，各局長檢討了政策局和部門的組織架構，並且落實了一連串的改組計劃，從而更好地運用資源，提供更好的服務。這些改組包括：

- 教育統籌局與教育署的合併；
- 前房屋局與房屋署的合併；及
- 政府車輛管理處、政府物料供應處及政府印務局合併成為政府物流服務署等。

在推廣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政府亦已有多年經驗，這包括服務外判計劃、以“建造、營運及移交”（即 **BOT**）和“設計、建造及營運”（即 **DBO**）的模式落實大型的基礎建設項目等。近年，政府更積極推廣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共服務計劃（即 **PPP**），目的是想充分利用私營機構的靈活性及動力，為公營部門注入新意念和發展新的服務模式，藉以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服務。外判服務的合約價值由 2000 年的 320 億元倍增至 2002 年的 650 億元。現正考慮中的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計劃，包括提供康樂文化設施、海上垃圾收集服務、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等。

在革新提供服務模式方面，我們積極研究以共用服務中心模式，提供一站式的支援服務，以期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源，來提升效率及服務質素。綜合電話查詢中心是一個成功例子，目前該中心就 12 個部門的服務，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查詢服務。

在改革公營服務的過程當中，我們會嚴格控制公務員編制。行政長官在 2003 年的施政報告中已訂立了清晰的目標，便是在 2006-07 年度或之前，將公務員編制削減至 16 萬個職位。

我們透過自然流失和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推出兩輪自願退休計劃、暫停招聘公務員、重整架構及工作流程等，將公務員編制由 2000 年年初高峰時的 198 000 個職位，減至目前的 17 萬個職位，減幅達 14%。事實上，在本年 5 月底，公務員編制亦已跌破 17 萬。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為市民大眾提供服務的水平，是不會因縮減公務員編制而下降的，相反，我們必須確保公務員能與時並進及精益求精。因此，我們會循序漸進地推行公務員體制改革，透過檢討公務員的聘

任安排、薪酬及福利政策、培訓制度及表現管理機制，確保公務員隊伍能配合香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轉變，切合市民的期望。

我十分明白陳婉嫻議員對公務員職業保障的關注。特區政府在制訂公務員政策時，必定以保留及發揮公務員體制的優點，包括常任、專業、政治中立及廉潔為目標，並會恪守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原則，以及充分諮詢公務員的意見。公務員的權益亦受到《基本法》、政府政策和聘用合法的保障。我們深信一支高質素和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是協助政府推行“大市場、小政府”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上種種措施，不單止改善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素，為各行各業提供更好的營商環境，而且還有助我們節省開支，善用資源，消滅財赤。

過去數年，由於經濟轉型，加上泡沫經濟爆破，為香港帶來嚴重的通縮壓力，政府亦面對龐大的赤字。本港自 1998-99 年度開始，連續 6 年出現經營赤字。財政儲備已經由 1998 年 3 月底的 4,575 億元，相等於 28 個月的政府開支，下降至 2004 年 3 月底的 2,753 億元，相等於 14 個月的政府開支。

即使我們對未來的經濟發展審慎樂觀，仍然必須處理我們現時嚴重的財赤問題，合理運用公共開支，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我們有決心能達致在 2008-09 年度恢復經營帳目收支平衡和綜合帳目收支平衡的目的。為此，我已經在 2004-05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訂下指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務求在 2008-09 年度把政府的經營開支減至 2,000 億元。

在“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下，我已承諾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20%或以下。

由於各政府部門不斷努力提升效率，節省開支，精簡架構，加上收入比預期好，2003-04 年度的暫定赤字為 401 億元，遠比我們在 10 月份預測的 780 億元為低。

為了達到“節流”的目標，各政策局局長已經在確保必要的服務不會受影響下，相繼提出多項檢討項目，他們務求以更少的資源提供更多服務，正如我剛才提到，各個部門的改革措施，包括重整服務優次、精簡架構、減省不必要工序等。

這些管理措施不但為政府節省開支，亦使公共資源得以更有效地運用。政府會繼續推行各項節約措施。

就陳婉嫻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想強調，縱然我們面對龐大的財赤，政府對投資教育及對弱勢社羣的承擔並沒有動搖。我們預計 2004-05 年度政府的整體開支總額為 2,587 億元，其中教育、社會福利、衛生及保安佔整體開支約六成。至於開支細項方面，教育佔 23%；社會福利及衛生共佔 26.4%；保安佔 10.5%。我們在制訂未來的開支分配時，會繼續考慮社會需求的優先次序，確保資源得以最有效地運用，並提供機會讓私營機構出一分力。教育方面，今年的實質增長將會是 2.4%，社福在 2004-05 年度同樣有實質增長。我們現在的做法是貫徹特區政府對市民的承擔，而並非一如有些人似是而非的批評所指。

政府高度重視就業問題，並已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促進就業，配合經濟轉型。其中短期措施包括延續公營機構的萬多個臨時職位，以及推出多項為不同年齡組別人士而設的就業及培訓和再培訓計劃，提升本地勞動人口的就業能力及競爭力。在中長期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政府會從根本着手，改善營商環境，以吸引更多外來投資及促進經濟發展。

在這方面，我們的投資推廣署和貿易發展局正向這些目標邁進。投資推廣署的工作目標包括在外國吸引外資來港，成績相當不錯。至於剛才黃宜弘議員所提到的貿易發展局，貿易發展局的工作目標是拓展新市場和新的服務行業，所以該局在展覽會、開拓市場，以及如何令 CEPA 發揮更多優勢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們在各方面均不會與民爭利的，所以如果在這方面是有所誤會的話，我相信我們會與可能對此有誤會的議員作進一步的解說。

主席女士，在“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大原則下，政府會不斷創造有利的條件，讓各行各業持續發展，從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使整個社會能夠一同受惠。在這一屆立法會快將完結的時刻，我衷心希望社會各階層能團結一致，共同為香港的未來而努力。我們更應該發揮香港獨特的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抓緊機遇，利用 CEPA、“9+2”、“一國兩制”的平台，發揮我們自強不息的精神。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吳亮星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三)”之後刪除“節省公共開支”，並以“確保政府部門善用資源，減少浪費公帑”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吳亮星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陳婉嫻議員，由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的措辭，內容一如 7 月 5 日發送各位議員的文件內所載。請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用 3 分鐘時間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雖然我支持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但我卻與他同時就吳亮星議員的議案提出修正。我的原意是想指出，在“小政府、大市場”下，當政府要考慮削減開支時，將會影響整個架構的服務，即政府公僕的服務，以及員工的就業情況。現時，香港基層勞工的就業情況實際上已很惡劣，因此我亦很擔心在這個“大政府、小市場”下——不好意思，應該是“小政府、大市場”，可能因為我經常想着要有多些人可以就業——勞工所面對的情況會更差，所以我便提出了這項修正案。

雖然我不反對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但如果缺少了我接上的那部分，我覺得會有一點遺憾。不過，由於依照議事程序，須先就他的修正案進行表決，要先待他的修正案是否獲得通過，因此，我仍然會按照他的修正案修改我的修正案。我希望同事明白，有一批人，可以說是基層的人是有一些看法，他們便是香港現有的 130 萬基層勞工，我希望同事明白他們在就業上很困難。如果政府推行這項政策，但不考慮推行一些扶助這些基層人士的就業措施，便會令我很擔心。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對經單仲偕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消滅財政赤字”之後加上“；與此同時，政府須確保公務員的人手編制及職業保障不受影響，並應制訂就業及勞工保障政策，讓基層勞工可以自食其力，過有尊嚴的生活；政府亦應繼續為弱勢社羣提供合理的生活保障”。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就吳亮星議員經單仲偕議員修正的議案提出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婉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AN Yuen-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麥國風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胡經昌議員及張宇人議員反對。

霍震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鄧兆棠議員、黃成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吳亮星議員及馬逢國議員反對。

何秀蘭議員及劉慧卿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8 人贊成，11 人反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17 人贊成，2 人反對，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1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2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ed.

主席：吳亮星議員，請你發言答辯，你有 3 分 10 秒。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們就“大市場、小政府”這項議題進行討論，儘管在今天最後一次會議中人才單薄，但仍然有來自 17 位同事的大大小的發言，我認為這足以證明這項議題是有必要值得重視的。

我很多謝大家的真知灼見，同時期望這項議案對今後促進香港各行各業有更大發展空間，能發揮作用。我亦促請政府再次針對大家關心的事項，採取有關的行動和措施，要加以落實，以求達到目標，令香港的公共財政更穩健，令市民得以真正從“大市場”中受惠。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吳亮星議員動議，經單仲偕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四項議案：告別議案。

告別議案

VALEDICTORY MOTION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依照議程，代表本會全體議員動議第二屆立法會會期終結的告別議案。我十分榮幸可以提出這項最後的議案，因為我是四分之一途出家的，只做了 1 年的內會主席，大部分的榮耀應歸於做了內會主席 3 年的周梁淑怡議員，雖然現在她不在席，未能聽到我稱讚她。

主席女士，市民從電視上看到的只是議事堂內針鋒相對的場面，從報章上看到的也只是議員同事的三言兩語，市民很難理解立法會實際的工作量，亦有市民批評立法會議員說多於做，建樹不多。不過，從一些事實和數字均可以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各位議員同事其實也堅守本分，做好議員的工作，發揮立法機構應有的功能。

過去 4 年，議員同事均盡了最大努力，審議各項法案及附屬法例。埋單計算，今屆立法會共處理了 135 項政府法案及 13 項議員法案，其中 37 項法案是政府建議須優先處理的，議員須趕工開會，使這些法案可以趕及在今屆任期內恢復二讀。到今天為止，本會共通過 125 項政府法案及 13 項議員法案，其中 90 項政府法案及 1 項議員法案是在經審議後，應議員的關注而作出修正，然後獲本會通過的。另有 10 項政府法案因為仍在輪候中而未能“上位”或政府不恢復二讀，因而未能完成立法程序，當中包括最具爭議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至於附屬法例方面，今屆有 906 項在憲報刊登及經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提交的附屬法例，就其中 163 項附屬法例，議員成立了 58 個小組委員會作出詳細研究，有 58 項附屬法例在經審議後，應議員的關注及建議而作出修正。

儘管議員不辭勞苦，但政府仍然有一個老毛病，便是政府在提交部分法案予立法會審議前，未有做足諮詢市民和業界的程序，或法案草擬的內容根本上有問題或法案不能反映政策，又或未能提供足夠時間讓議員審議，令議員須加倍努力，趕工開會，但亦有多項法案由於有爭議而須擱置或延誤審議。或許有人會認為，有延誤或爭議，是由於議員在雞蛋裏挑骨頭，但我認為，如果政府給議員的是真正的雞蛋，而不是含有雜質的雞蛋，議員怎樣挑、怎樣找也是找不到骨頭的。總的來說，我希望政府在下屆立法會可預留更多時間給議員審議法案。

主席女士，歷任內會主席在就告別議案發言時，也會數一數當屆立法會有何特色。今屆立法會一個較明顯的特色，就是在一個會期內成立了兩個專責委員會，也可以說今屆是最不幸的一屆。我相信同事也希望香港沒有重大的事故發生，以致立法會須成立專責委員會。不過，如果有重大事故發生，我們便有責任深入研究，找出真相，督促政府從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今屆的另一個特色是問責官員與議員的磨合。政府在 2002 年 7 月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在實施問責制後，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事實上有少許改善，多位問責官員也有出席立法會大會及各委員會的會議，向議員解釋政策，而行政長官出席答問會的次數亦由 3 次增加到 4 次。當然，我也要提及，政務司司長承諾每年會前來內務委員會與議員溝通兩次，我在此多謝司長。不過，仍然有問責官員較少出席委員會的會議，只派副手出席。我不知道問責局長是否害怕前來立法會作出匯報或害怕見到個別議員。我相信議員是希望問責局長多些出席立法會會議，解釋政府的政策，以及多些與議員溝通的，我亦相信市民大眾也希望問責局長勇於負責。

自推行問責制以來，先後有 3 位問責局長辭職。在該 3 位局長當中，以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提出呈辭最能充分體現問責精神。對於楊永強先生勇於向市民大眾負責，是值得我們尊敬的。楊局長會多留任 3 個月，我希望楊局長在留任期間會一如以往，繼續為香港服務。即使在楊局長離任後，我仍然希望楊永強先生繼續為香港作出貢獻。

雖然局長因問責而主動呈辭，以及這樣做有助完善問責制，但我相信問責制仍有改善的空間。剛就 **SARS** 發表的報告便清楚指出，在推行問責制時，政府並沒有將衛生署署長防疫的法定權力移交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因而出現了問責局長有責無權的情況，衛生署署長則有權無責，而其他的政策局或部門也可能有這種情況出現。因此，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問責制有甚麼未完善的地方，以確保不會再出現有責無權的情況，這樣，市民大眾才真正可以令問責局長問責。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立法會會監察和督促政府在這方面做好檢討和完善的工作。

主席女士，今屆的另一個特色，便是“八黨聯盟”的出現。八黨會就一些事項商討共同的立場，向政府提出一致的建議，或爭取政府在政策方面讓步。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爆發 SARS 期間，大家團結一致，提出八黨共識，共同抗炎。當然，議事堂內的同事之間意見不同的情況比比皆是，我們經常會爭論得面紅耳赤，但中國有句古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座各位皆是君子，我們要承認“不同”，但可以在“不同”的基礎上尋求“和”。大家放下成見，我相信便可尋求共識，為市民、為香港做一些事。

我說了這麼多，我相信大家會期望我談一談政制的問題。

雖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已決定香港不會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雙普選，但對於不少支持雙普選的市民而言，這難免會令他們失望。在同事當中，亦有很多人在這方面非常執着，這是可以理解的。話雖如此，人大常委會同意了 2007 及 08 年的兩項選舉的安排有修改餘地，我想我們立法會也可以積極地提出方案配合。以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為例，在直選和功能議席比例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如何作出改善，例如增強認受性及代表性，或同步增加兩個組別的議席，我覺得這些事情也是有待討論的。其實，這些安排均反映了政制發展正在按《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的方向進發，我們應該作出詳細討論。

政制發展的方向肯定會繼續成為下一屆立法會討論的焦點。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和而不同”，我希望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員可以放下成見，繼續尋求共識。

主席女士，轉眼間，第二屆立法會的任期即將完結。從報章報道看來，小部分同事，即有兩位同事已宣布不再參選，亦有傳聞說有其他議員也可能不參選，但由於第三屆立法會的選情十分激烈，各路人馬經常變陣，去馬的可能最終不去馬，不去馬的又可能去馬，最終會有多少位同事辭官歸故里，或有多少位同事再披甲上陣，現時還未清晰，但截至這一刻，有兩位同事已表明不再參選。

第一位是我非常尊敬的李家祥議員。他在 1991 年加入立法局，我和他在當時的立法局和 1997 年後的立法會共事了 13 年。立法會經常有皇者出現，以前有“bill 皇”。相信大家也公認，李家祥議員的數口最精，是“數皇”，我不是指“掃黃”，而是“數目”的“數”，“皇者”的“皇”。大家也認同他是這樣的。他在 1998 年開始擔任立法會帳目委員會的主席，我相信在他擔任主席後，政府聽到帳目委員會便“聞‘會’喪膽”，因為政府

的糊塗帳經李家祥議員帶領的帳目委員會看過後，所有的糊塗帳也是無所遁形的，也一一被剔出來狠批。我相信李家祥議員在這方面的功勞是非常之大的。本會損失了這位“數皇”，是本會的損失，要作出 **debit**，但本會也要為他“入數”，要 **credit** 他，記下他對本會、對市民和對香港的貢獻。正如我剛才說，今年各路人馬其實也經常變陣，因此，雖然李家祥議員現在宣布不參選，但我不排除他仍然可能參選的。如果李家祥議員改變主意，再次參選，我相信我們立法會是會歡迎這位皇者再臨的。

第二位是羅致光議員。**CK** 被喻為民主黨的“大腦”，在他離開議會後，我希望民主黨不會變成“無腦”。事實上，**CK** 清晰的思路和強而有力的分析，是大家所公認的，本會少了這一個“大腦”，對本會來說也是一大損失。當然，**CK** 最近的功績，便是擔任有關 **SARS** 的專責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他的英明領導下，專責委員會完成了這項 **mission impossible**。我有些擔心，當然我之前也曾說過，我不希望香港有重大事故發生，以致我們須再成立專責委員會，但如果有的話，如果將來也有 **mission impossible** 來挑戰我們時，我們可能會很難再找到像湯告魯斯般的 **CK** 來完成這類 **mission impossible**，這將會是很難做得到的。

主席女士，除了要多謝這兩位議員外，另一位要多謝的議員便是主席閣下。我可以坦白告訴大家，主席的確不易做，最少主席的座椅並不好坐，但主席你可以動輒坐在那裏好幾小時，還有一點，便是坐在那裏卻不打瞌睡，這正正顯示主席閣下你的功力。

從來都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連夜趕科場。有同事在不久將來會重返這個議會，亦有同事可能要暫別這個議會。對於有意再參選的同事，用科場來形容選舉最貼切不過了，因為每一事項都是一個考驗。可是，對於離任的同事，我相信他們也不會樂得清閒，我深信他們會繼續在議會外為社會服務。

最後，我謹代表全體議員祝願第三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

昨天，同事們說，就今天的告別議案，他們不會發言，因為他們不想離開。不過，我想這項告別議案只是告別過去的 4 年，我們要告別過去的 4 年，再擁抱未來的 4 年。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呼籲同事多就這項議案發言。

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已完成工作，現祝願第三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很高興能夠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在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席上就告別議案作出回應。

首先，我想談談一項大家一直十分關注的課題，便是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基本法》清楚訂明行政和立法機關的不同角色和不同的職能：兩者既要互相制衡，亦要互相配合。在這個憲制框架下，雙方間中有一些不同意見，實在不足為奇。儘管如此，在日常工作的層面，行政與立法機關可說是合作無間，整體關係良好。過去 4 年，政府雖然未必能事事認同議員的意見，但雙方本着求同存異的精神和維護公眾利益的大前提，在許多領域上均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合作成果，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以立法工作為例，劉議員剛才亦列舉出很多數字，但對特區政府來說，自本屆立法會任期由 2000 年 10 月開始以來，政府一共向立法會提交了 135 項法案，包括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的 15 項法案。在議員努力不懈和衷誠合作下，我們在今屆的立法會共通過 125 項法案，包括在這次會議所通過的 8 項法案。這些法案當中，不乏一些複雜及稍具爭議性的立法建議，例如《2002 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土地業權條例草案》、《2003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及《2003 年廢物處置（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等。

超過 90% 的政府法案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獲得通過，我們對這個成績感到十分滿意，亦衷心感謝議員在審議過程中積極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支持並通過這 125 項政府法案。

此外，立法會也通過了由政府提交的約共 260 項財務建議，以及超過 800 項附屬法例。問責官員在本屆立法會會議上，答覆了超過 6 000 項由議員提出的口頭、補充及書面質詢，以及在約 200 項議員議案辯論中作出回應。

我理解過去幾個月以來，議員在立法方面的工作尤其繁重，這種情況往往在立法會換屆前的立法年度出現。為避免大量法案因未趕及在本會期內獲

通過而失效，因此，政府在本屆立法會首 3 個立法年度內已提交了大部分，即 120 項法案。在本立法年度，政府只提交了 15 項法案，其中除了與預算案有關的 3 項法案外，所有其他法案均已在本年 3 月或以前向立法會提交，以預留時間讓議員繼續審議。我希望這項安排可再改進，希望我們在合作方面，以及在審議法案時，可給予議員充分的時間。

議員會明白到，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政府未必能夠完全掌握向立法會提交法案的時間表，例如當政府須在指定時間內通過法例，以履行香港的國際責任時，或立法時間表須配合政府及有關法定機構在金融市場的特別安排時。以《商船（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條例草案》為例，有關的海上保安條文於本年 7 月 1 日起在全球生效，並對香港具約束力。然而，很多細節的實施問題，是在去年年中才由國際海事組織轄下的各個小組圓滿解決的，這令本地的立法時間表相當、相當的緊張迫切。此外，為了充分利用市場的利好因素，《機場管理局（修訂）條例草案》及有關“五隧一橋”的附屬法例，也同樣具迫切性。我在此再次感謝議員在處理這些緊急的法案時作出積極配合，以一貫高效率 and 負責任的態度，在緊迫的時間表下完成審議工作。

主席女士，接着，我想談談在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實施後，立法會的工作情況。問責制由 2002 年起實施至今，已經推行了兩年。

我和其他問責官員繼續在平等共處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與立法會一直保持直接溝通和積極合作。我自出任政務司司長以來，定期地按特別議題，多次出席內務委員會的會議，與議員就公眾關注的課題交換意見。我知道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及其他問責局長也按議程的需要，盡量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以便議員更清楚瞭解政府的施政方針和策略意向。

議員希望問責官員更多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和其他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解答議員的問題。對於此事，問責官員是樂意配合的。事實上，自問責制實行以來，問責局長在遇有重大的新政策或公眾高度關注的課題時，均會親身向議員交代，例如問責官員在本屆立法會曾先後就政府的立法議程、政制發展、房屋、人口、經濟及公共財政管理、重大的交通基建及環保政策等課題，透過聲明或其他方式，率先向立法會通報和接受議員的提問。

此外，問責官員亦會視乎需要，與其轄下的常任秘書長和其他副手妥善分工合作，委派合適人選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與議員討論在其政策範圍內所須處理的實務性事宜。不過，若有關會議的討論事項涉及政策事宜，各問責官員必定盡力配合時間，親自出席會議。

我希望指出，問責官員是有誠意與立法會加強溝通和緊密合作的。無可否認，問責制的實施是香港政治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在改變和前進的過程中，必定會遇到各方面的挑戰，這是任何一個進行政制改革的政府必定會遇到的問題。我們在處理這些挑戰和問題上的經驗，將會成為進一步完善問責制的基礎。

主席女士，作為今天這項告別議案的總結，容許我代表特區政府先向主席女士你致意，感謝你在處理立法會事務上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又經常親力親為，促進政府與立法會之間友好融洽的合作關係。此外，我亦衷心感謝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定期與我會面，不但討論立法會事務，亦向我反映議員所關注的重要事項，以促進政府與立法會議員的溝通。最後，我要向各位議員致謝：對於決定不參與下屆立法會的議員，我在此感激你們在過去 4 年來投入精神和時間，為立法會及廣大市民作出貢獻。對在座的其他議員，無論你們打算通過何種形式參與 9 月的立法會選舉，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繼續不辭勞苦和鍥而不舍地為香港整體利益及全體市民服務。

我謹祝願各位在未來的日子事事順利。

多謝主席女士。

霍震霆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在成立後已邁進第八年，第二屆立法會現正進行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過去幾年，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折騰及磨練，政治爭拗和社會分歧至今仍未平息，昔日的東方明珠亦因此而變得黯淡無光。猶幸在外圍景氣改善和國際支持下，香港經濟已從谷底回升；而最近社會吹起和諧風，亦為香港前景亮起綠燈。

監察問責從來就是施壓，立法會基於角色功能而持續向政府施壓，是應該的，但施壓也應該有一個限度，不能因此而破壞社會的團結及和諧，以及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所謂一隻手掌拍不響，弄致早期出現對立分歧，背後當然有很多比較複雜的元素，亦非因為一人一事所造成。事實上，家和萬事興，與其無休止地指責謾罵，與其為實現個人理想而不顧一切地爭取，倒不如平心靜氣地，為香港的未來、為社會的團結及社會的福祉，多想和多做一點實事。

這種情形便好像一隊球隊般，如果教練與球員不和或球員之間有意見，皇馬、湖人等夢幻組合最後也會一事無成，相反，名不見經傳的希臘卻能憑

着上下一心的拼搏精神，在葡萄牙舉行的歐洲國家盃中創出神話。反觀香港，在過去 1 年內已經折損了 3 位局長，我們還有本錢繼續內耗折損下去嗎？

毫無疑問，要實現真正的團結及和諧，立法會及立法會內的主要黨派均須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我希望將來舉行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以及 10 月組成的新一屆立法會能開創出一個全新的局面。

事實上，隨着自由行、CEPA 和“9+2”協議相繼落實和發揮效益，香港的經濟格局和與周邊省市的協作關係均出現了根本的變化，亦展現了新的發展機遇和方向。無視新形勢而仍然堅執過往的思維理念，是不現實的，也會對香港的發展前景造成障礙阻攔。認識新形勢、調整思維及把握新機會，是大家所必須認真面對的當前急務，也是能否引導香港邁向光明前途的關鍵。

主席女士，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內涵，這些方面從動到靜、從精神到健康、從傳統到現代，不斷豐富我們的生活內容，提升我們的生活素質，為社會的永續發展提供柔性的支持，更是彌補社會裂縫的最佳妙藥。當然，除了這些隱性效果之外，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本身便是商機無限的創意經濟，只要規劃得宜和推行有序，肯定會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強力火車頭。事實上，它們所蘊含的商機和潛力其實並不下於其他支柱行業，問題只是在於我們能否把握，以及如何把握而已。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過去一屆的立法會，我相信是一個很令人難忘的立法會，因為政治議題是刺激到“暈”的。但是，現在於告別議案中，我不希望與大家這麼刺激地回顧 4 年內的事項，總結所有的刺激的事項，反而希望大家可以與我玩一個遊戲。我現在會先向大家讀出 10 個“最”的問題，大家可以填上答案，稍後我會揭露那些答案給大家聽，大家可以看看符合不符合你們的想法。

第一個“最”是最有原則，那是誰呢？接着的問題是：最指定動作？最變色？最“BB”？最忍得？最引人犯罪？最想說話？心臟最強？最惹火？最神秘？究竟這 10 個“最”是誰呢？現在我逐一與大家一起研究。

最有原則的人，不是司徒華議員，大家可能都以為我會選司徒華議員，其實，說到最有原則的，我是選黃宜弘議員，因為他是拿着“中指”。（眾笑）

最指定動作的，我會選司徒華議員，因為每年到了 5 月左右，他一定會有一個指定動作，就是動議六四的議案，相信以後，我們有分在支聯會的議員也要替他輪流分擔一下這個指定動作了。我也開始有一點毛病，也開始在每年 6 月作出一個指定動作，就是一定叫人參加七一遊行。我不知道這個指定動作要維持多久。此外，當“華叔”發言時，大家都知道他的樣子也一定是指定的，即是垂下頭來，手持着一張張很大的紙，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變色的，主席，不是你，最變色的是余若薇議員，因為我逢星期三看見她的時候，發覺她的衣服的颜色也在變。我很想向余若薇議員呼籲一下，我們職工盟有一個舊衣回收助人中心，我想她拿她的舊衣服來賣，希望可藉此幫助一下我們的失業工人。

最“BB”的，我不知道大家會想到是哪個。不是最有名的“BB”，最有名的“BB”當然是寶寶 Baby，又稱寶 Baby。但是，真正在議會中被封為“BB”的那個，是大家最不想看到他的“BB”樣子的那個，就是我們的陳偉業議員——“大嚟 BB”，為甚麼呢？大家試猜猜林瑞麟今年多少歲？林瑞麟的外孫今年應該是多少歲呢？原來陳偉業議員是林瑞麟的外孫，那他是不是最“BB”呢？所以這個“大嚟 BB”，相信大家也不太喜歡他的“大嚟 BB”樣子的——他的頭這麼大，而且還是光頭。

最忍得的，主席，就真的是非你莫屬了，因為縱使自然界怎樣呼喚你，你也得坐在這裏，還要忍着這麼多人說過話後，你又沒分兒說。不過，忍得所付出的代價是有成果的，因為你現時從民調所見，支持率很高。所以，主席，你的“忍”功“忍”出了在民調得分很高，那也是一件好事——因為會“忍”出一片天空。

最引人犯罪的是誰呢？這就是我們的李國寶議員，因為他“三點不露”，我們相信這裏在座各位，是不是也想他“露”多些呢？如果他“露”多些，又真的會引人犯罪的了。

最想說話的是誰呢？各位當議員的，固然也最想說話，不過，也很容易想到誰最想說話，因為她經常說“我想說”、“我想說”的，這個當然就是陳婉嫻議員。然而，我覺得最近她好像戒去了這說法，但她開宗明義仍是最想說話的一個。

心臟最強的是誰呢？我覺得在我們這麼多人之中，心臟最強的始終是劉慧卿議員，因為即使她感到極度震驚，也是屹立不倒的，她震驚了這麼多次，也應該心臟病發了。可是，劉慧卿議員震驚了這麼多年，仍然沒有心臟病發，證明了她的心臟功能非常之強。

最惹火的，以往選最惹火的往往也是陳鑑林議員。但是，陳鑑林議員今屆應該輸給梁富華議員了，因為最惹火的，似乎應算是梁富華議員，尤其是大家也一定不會忘記他那些老人痴呆症和病態聖徒的說法。所以，現在最惹火的是梁富華議員，由於梁富華議員已經表明不再參選，所以如果陳鑑林議員再回來的話，便可以急起直追，下屆可能會由陳議員再度入選的。

最後，最神秘的是誰？這個真的很神秘，大家也很想知道，而直至今時今日，大家仍未知誰是我們議會中的“麥當勞”。沒有人知道，所以最神秘的就是那個“麥當勞”，究竟誰是“麥當勞”呢？原來我們的議會內有一個議員叫“麥當勞”。

剛才本來就是要說這麼多，但我還加了兩個“最”，其中一個是臨時加上的，因為是剛才我聽到劉健儀議員發言後才想起的。大家覺得哪個政團、政黨是最沒有腦呢？將會是民主黨。因為他們沒有了“大腦”，C.K.不再參選了，如果一如剛才所說他是民主黨的“大腦”，那怎麼辦？即是好像說民主黨現在變了最“無腦”的一個黨，所以民主黨要回答一下，你們是否將會沒有了“大腦”，那麼怎樣運作呢？

最後一個我覺得要問的就是誰的演辭最廢話？便是剛剛發言的那一個，也即是說，我剛才所說的全部都是廢話。（眾笑）多謝主席。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現在輪到我說廢話。真的肯定不再出任議員的只有數位——羅致光是民主黨的神童，他有甚麼長處？他可以一口氣以蝶式泳術從淺水灣游到南灣，然後再回頭。他另外的一項長處是，對於完全不懂的東西，他可以在幾天後，變成專家。他還有一項長處，便是“說了好像沒有說”。所以，民主黨有“大鑊嘢”，便由他做發言人。當他發言的時候，記者似懂非懂，跟着便問寫甚麼，沒有東西可寫。（眾笑）

第二個肯定離開的便是李家祥。我不明白為何他說做得那麼“沒癮”，其實，他經常擔當政府帳目委員會的主席，又沒有發生泄密等事件。後來，我想通了為何他說“沒癮”。他常常吃早餐，午餐也不吃。如果他可以不時與民主黨吃免費午餐，那便不用離去了。

另一個可能離開的便是“華叔”——“華叔”永不轉軌，因為他根本不懂開車。（眾笑）他把事情看得很簡單，例如他不喜歡修正議案，他會說：“為甚麼要修正？不喜歡便反對，喜歡便贊成。”誰知他晚節不保，昨天，他竟然就回鄉證建議修正案。（眾笑）李卓人也說得對，“華叔”每年都提

六四，如果下一年他不在這會議廳的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華叔”想辦法“回頭”也不稀奇。（眾笑）

另一個無法肯定的便是梁富華。其實，我覺得陳日君主教很想他回來，因為如果他不回來，陳主教便會感到很寂寞，他現在身體還好，還有一段時間才會變老人痴呆。

還有一個可能離開的便是丁午壽，我也不明其所以。他好像說不再得到自由黨的支持。他這說法其實欠缺理據，他時常買油條給他們吃，還有菠蘿包和其他東西，但我不能夠肯定。

本來要惜別的應該是那些真的決定離開或其他人說他會離開的議員。我想可能贏不到的都有權發言，不能勝出便要跟大家惜別了。其實，我大有資格這樣做，如果只要大家看過前天發表的民意調查，便知道港島首名票后將會是余若薇，第二名便將會是主席，剩下來的票着實所餘無幾。如果我跟楊森排位，我名列第二，於是便有資格發言，（眾笑）老實說，有誰想選這個一進維園便變成阿伯的李柱銘。我現在已經是一歲大的長者：我不認老，我只是一歲大的長者而已。蔡素玉和我在 1995 年爭奪一個席位，現在爭的是第六個位。我在 1995 年贏了蔡素玉，她在 1997 年又取回，連我的車位也給她取去了。（眾笑）

主席女士，我想把話題扯得遠一些，因為我想起多年前發生的事。我在 1985 年進入立法局時，當時的“大家姐”鄧蓮如請我們飲“tea”，並且逐個介紹，到介紹李汝大的時候，問：“Desmond，你的中文名字叫甚麼？”他說：“李汝大。”我說：“‘阿姐’，你還不多謝他，他正稱讚你呢！”（眾笑）後來 Michael THOMAS 跟“阿姐”結婚，Michael 經常跟我談直選的問題。那一晚，我對他說：“Michael，你不要談直選，不要說 direct election，不如說 direct erection。”當時推行雙語制，他反問我怎樣翻譯為中文。我們便找了王葛鳴來翻譯，她說：“你不要再說直選，你今晚要說直舉。”這當然是跟“選舉”一詞語帶相關。

主席女士，我在這個議會也有過一些“威水史”，如果我不說，可能便沒有人說，即使我走了便沒有人說了。第一件我自己感到十分驕傲的事情，便是成功爭取不准吸煙——經過 12 年的努力，我才爭取到把 217 房列為吸煙房。其他的房間，一律不准吸煙。在《基本法》起草的時候，我已提出了，並準備建議在《基本法》裏列明不准吸煙。誰知內地草委十分機警，他說：“李柱銘，不要忘記你所說的自由。”我說：“是，你有吸煙的自由，卻沒有噴煙的自由。”想不到我用盡辦法也不能在第三章列明這項規定。

“華叔”也有一段戒煙歷史。我曾經跟他說：“我父親 81 歲戒了煙。”他說：“是，馬丁，我 81 歲便戒煙。”雖然他後來戒了煙，不過，現在如果我在他進入洗手間後跟着走進去，便會嗅到一陣陣煙味，不知道他是否秘密食煙？

有一次，黃宏發到我家中吃飯。我兒子那時候年紀還小，他指着黃宏發說：“黃宏發，你快要沒命。”我當時被他的話嚇得快要昏過去。原來，我兒子說吸煙危害健康，黃宏發至今還健在呢！（眾笑）

另一件我感到驕傲的事情，便是在本局建議廢除死刑。其實，我要申報利益；那是因為我害怕到了 97 年還有死刑的話，我可能會遭殃了。因為我當時被批評為賣國賊。民主黨也要申報利益，那便是大家都知道的，panels 經常遇到組織議員出訪時人數不足的情況。可是，民主黨在 97 年探監的時候，卻出現全部成員到齊的情況。可能他們基於自己會有機會入獄，害怕那些監獄不夠清潔所致。

主席女士，我還要提一提選舉。朱幼麟當年說想參選，我對他說：“If pigs can fly，你便有機會了。”（眾笑）他便說：“可以了，我便是飛天朱。”（眾笑）

主席女士，我還有沒有遺憾呢？是有的，那就是與坐你的座位有關的。有一次，當 David WILSON 擔任主席的時候，他在 JEAFRESON 發言時突然“人有三急”，走出會議廳，可惜我當時也是“人有三急”，不在會議廳，否則，我便會坐在那椅子上，然後說：“At this moment, I am sure Members would like to have a break”，然後把會議 adjourn 了即可。可惜，我當時不在會議廳。

現在，時間無多，我又說一說財政司司長提出的自訂車牌建議。根據這項建議，自訂車牌不得多於 8 個英文字母。我想 David LI 一定會自訂車牌，他現在的車牌是 DL1，即是“DL”。如果是寫上 David LI 那該多好，那麼他便不用脫皮鞋了，即使距離多遠，也可以看得到 David LI 的字樣了。（眾笑）

主席女士，現在時間無多。我們在這裏曾發生過不少爭拗，不過，我們最終亦是朋友。謝謝。

麥國風議員：主席女士，我原本有一篇擬稿，但我未必依稿發言。轉眼間，我在議會度過了 4 年的光景，從一名新丁直至現在，我仍然有一份新鮮的感覺，因為我對很多事物都仍然感到新奇。

我們在樓上宴會廳吃早餐的時候，議員似乎對就本議案發言存有一些禁忌（taboo），恐怕告別後不能重返議會。我為人是永遠向難處看的。我想告訴大家，我會參加競選，雖然我重返議會的機會像報章所說不高，不過，我會盡力而為。所以，我對告別議案沒有特別的看法，既然我重返議會的機會不高，而且我認為可抒發自己這 4 年在議會的觀察或經驗，所以也是絕對值得發言的。

這 4 年來，我從一名新丁到現在，經過了一段相當艱辛的路。最初，我真的一無所知，未找到李柱銘議員所說的“揸軚”。我最初給人的感覺像是怕了民主派般，我當時像在大海中飄浮又未找到舵手。不過，劉千石議員突然把我一手抓住，就像給我找到救生圈。我在這裏要向劉千石議員表示萬分謝意，感謝他大約在 2001 年年初把我捉住。這對於他來說並非好事，因為我經常令他感到尷尬，我更經常要他協助周旋。最近，“石哥”自己也遇到很多尷尬事情。然而，我仍然支持“石哥”，我認為他的方向是正確的。

我在議會得到許多議員（包括主席）的提攜，我想很多議員都是我在某方面的啟蒙老師。就像李家祥議員，我在此一定要向李議員公開致歉。那是我的助理所引起的問題，我也曾對李議員提及過。有一位 Dr Eric LI 曾經打電話給我的助理，邀請我出席一個宴會。由於我的界別稱呼醫生為 Doctor，所以當我的助理對我說 Dr Eric LI 約我吃飯的時候，我說好像不認識一位叫 Dr Eric LI 的醫生，哪想到當時約我的人李博士。我想我的助理是弄錯了，於是他照單全收後，告訴對方麥國風議員說並不認識一位叫 Dr Eric LI 的人。以我所知，這就是他當時所說的話。這件事其後令我感到萬分尷尬，我實在感到不好意思。我當時說並不認識 Dr Eric LI 的這句話，可能令李家祥議員的助理以為我有眼不識泰山。後來，當我問 Dr Eric LI 會否是李家祥議員的時候，才知道真的是李家祥議員。李議員，我真的要向你致歉。

此外，我想就另一宗事件發言，這件事也是與我的助理出問題有關。我真的曾經報名參加審議關於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法案委員會，我當時寫得很清楚。可是，當報章報道此事的時候，很多人說我想做 show，但我完全不是想做 show，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最後要求詳細列明我沒有名字的紀錄。很多議員或傳媒當時以為我想借那件事拖延法案委員會的成立或其他工作。

此外，我又想起一件我深深牢記的事，可以說是感受或是難受的。不知道劉江華議員是否在外面或在會議室 A。去年，就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之際，我想是 5 月 20 日後數天，當時聯席委員會正在就匯編的問題進行討論。我當時真的絞盡腦汁，透過電話和其他多方面途徑，清楚掌握我得到的信息，指出葉劉淑儀是騙子，我真心說她是騙子。可是，不幸地，我給法案委員會

主席劉江華議員趕出議會廳堂。此事其後在內務委員會作出討論，“發叔”也說劉議員無權把我趕走。直至現在，我絕不言悔。我認為我當時的做法相當有意思，最少可令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暫時擱置。

因此，當我反覆思考這三四年光景所做的事，我認為是值得的。謝謝大家。我更希望 10 月可以重返議會。

丁午壽議員：主席，我選擇在議事堂就這議題上發言，是因為我已表明不再參加立法會工業界(一)的選舉。至於是否參加地區直選，至今我仍未作出決定。

可是，我仍想為自己過去 6 年的議會工作作出總結。在眾多的議題當中，為了協助備受亞洲金融風暴打擊的工業界，特別在中小企融資方面遇到的困難，我在 2001 年促請銀行界改變舊有的“磚頭貸款”政策，多以企業的業績或發展計劃，作為審批貸款的依據。為了加強市場的透明度和銀行業的風險管理，又研究設立工商信貸資料庫，協助企業解決融資方面的問題。這建議得到政府積極和正面的回應，並按照建議在計劃商討期間，加入會計、企業、政府和銀行的意見。有關的商業信貸資料庫服務計劃現已付諸實踐，國際性的信貸評級組織美國鄧白氏商業資料(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營業商，以專業的角度為信貸進行評估。資料庫會於兩個月後開始運作，企業可向商業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提供信貸資料。我相信隨着計劃在年底正式運作，中小企將可更容易向銀行取得貸款，拓展業務。作為業界代表，我總算盡了一分力。

不過，唯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我未能在會上促請政府就《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釐清有關公眾預期的安全準則。現時，很多不清晰的條例，令業界感到不安。雖然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已答允作出改進，可惜在今屆立法會會期在今天行將結束之際，我仍然未能有機會提出。我會督促下屆立法會完成這項任務。

談完有關業界的事務，我也談一談參與議會工作的個人感受。在立法會所有新成立的委員會首次舉行會議時，一定會由姓氏筆劃最少的議員擔任臨時主席，負責訂定首次會議的日期和主持選舉正式的主席。由於立法會內沒有一位同事的姓氏比我的姓氏筆劃更少，所以，擔當臨時主席，已被我視為在本會生涯中的家常便飯。其中我最深印象，也是我所創下的新紀錄，便是臨時主席大多只主持 5 分鐘會議，但曾因擬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緣故及麥國風議員和陳鑑林議員的關係，有某次會議由 5 分鐘延長至 1 小時，這也是一項紀錄。

我想在這裏談一談，立法會內其實有很多能幹的同事。大家只要放下政治立場，真正為香港多做點事，為祖國多做點事，我認為一定能令更多事辦妥。可惜，立法會不說政治是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少說一點政治立場，真正為香港、為祖國多做點事。

今次使我有深刻的感受的，便是在 SARS 的專責委員會中得到我們的神童，即我們的專責委員會主席的領導。由於他不再參選，再沒有政治責任，我對他所做的工作十分欽佩，我覺得他令立法會感到驕傲，只可惜由於“泄秘”而令專責委員會的工作美中不足，希望大家以後在這方面能作出改善。

今天，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暫別立法會，為此我向各位同事說聲謝謝和再見。同時，我也藉此機會向各位決定離開議會的同事說聲“前程錦繡”，並祝每位準備在 9 月競選議席的同事“成功連任”，當然亦包括我們自由黨各競逐議員在內。

主席，我謹此陳辭。

呂明華議員：主席，說笑話不是我的專長，不過，既然時間過得那麼快，第二屆立法會又將告結束了，我就在此說說自己的感想和體驗吧。當了 6 年立法會議員，能夠代表工業界在立法會工作，為工業界發言，以及為香港經濟發展及其他問題提供意見，我深感榮幸。在這 6 年間，香港的經濟從盛極轉向衰弱的戲劇性變化，的確令人感慨。在這段期間，香港的議會文化及政治生態的變化，也令我感受至深。今天是第二屆立法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我想藉此機會，回顧我在過去 4 年的議員工作，也談談議員生活的體驗和感想。

我參與立法會工作是基於一個強烈的理念，即香港需要製造業，以創造財富，推動經濟發展，以及提供就業機會。這也是我 6 年來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目標。在議會內，我多次提出質詢及議案並發言；在議會外，我不斷在媒體發表文章、出席論壇和講座，目的是要提醒政府，只強調發展旅遊、物流、金融及工商業支援行業，作為香港經濟的支柱，是脆弱及危險的。基於對其他一些國家經濟發展和香港過去五十餘年的經濟歷程的研究，我認為若要重振香港經濟昔日的光輝，必須發展製造業。要讓製造業發展起來，便必須朝高科技及高增值的方向走，即進行新工業化。但是，這個經濟結構重整的過程是艱巨和漫長的，是有需要得到政府積極支持和協助，甚至起主導作用，香港的新工業化才有希望。6 年下來，我所提的建議，例如支持中小型企業、成立科學園和創新及科技基金、設立工商科技局及創新科技署、輸入專才、要求內地給予香港產品零關稅優惠、發展納米科技、吸引內地民企來港設

廠、擴闊經濟基礎等，均曾獲政府考慮，並見於政府的政策內，可見議員的工作並沒有全部付諸於東流水。

今年，由於自由行的帶動和 CEPA 的刺激，大量內地遊客來港消費，推動了旅遊業、酒店業、零售業和飲食業，市面上一片活躍景象。加上貨物轉口量增加和地產市場復甦，這些也為 GDP 增加了數個百分點。雖然經濟上的改善是值得慶幸的，但應該認識清楚，這只是表面的繁榮，香港的經濟結構並無根本改變，失業率仍然高企不下，我們的服務型經濟仍然是外強內虛，是不健康的。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措施，切實改善經濟結構。古語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教誨，請政府官員切記、切記。

立法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立法機關，肩負憲法所賦予制定法例和監督政府的職責。按常理，立法會應該既制衡政府的工作，也要配合政府的施政，藉着良性的交流和辯論，集思廣益，為政府出謀獻策，共同為香港謀福祉。但是，現在的立法會，尤其是在 2003 年 7 月 1 日後的立法會，已偏離務實和理性地議政的議會文化，變成非常政治化。議會內的黨派壁壘分明，發言激情，互相攻訐。結果，議會從議事論政的場所，淪為政治鬥爭的鬥獸場地，變成政客藉各種名目爭取出鏡的途徑。莫非有些議員把在議會工作的每一天也視為下一屆競選工程的一個環節？若真如此，這的確是對普選制度的一大諷刺。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很多議員的發言長篇大論，全無新意，浪費議會的寶貴時間和社會資源。更令人費解的是，有自認為代表基層利益的同事，極力為基層爭取福利，但卻反對政府增加徵稅和收費，難道他們認為特區政府是會生金蛋的肥鵝？

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架構有先天性的缺陷，而這也反映在議事堂內，令挺政府的黨派吃盡苦頭，因為他們若挺政府，便不為選民所贊同，但如果順從民意投票，便會受政府責難，因此“轉軟”頻頻，兩頭不是人，令人同情。最不可測的是中間派，利益取盡，但在關鍵時刻，卻耍一招回馬槍，令政府措手不及，顏面無光。其實，議會內的民主派是有議政能力、有理想、有韌力及有活力的一股團結力量。不過，奉勸民主派的朋友，民主化是須用時間和社會條件來鑄造的，不要為追求民主而急速進行民主化，否則會變成捨本逐末，對社會不利。最近，民主派向中央政府釋放善意，這是政治智慧的表現，是因為政治形勢轉變而採取行動的正確方向。此外，在此願民主派今後要多着力於經濟建設，少些政治爭拗，這樣將會更受選民歡迎。按表現，獨立議員應該是議會內的中堅力量，他們有專業知識，有理念，有議政能力，不受黨派的羈絆，能夠就事論事，以香港的總體利益出發來投票。我向早餐派的朋友致意。然而，儘管各黨派議員在議事堂內舌劍唇槍，激情爭辯，但在議事堂外，大家也能夠握手言歡，把酒高歌，彰顯議會生活人性的一面。

最後，藉此機會，我向決定離開議會的李家祥議員致敬。他的議政能力、高尚品德和專業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位無可替代的議員。希望李家祥議員在退出議會後，仍能夠支持繼續在此鬥獸場中為理想而爭鬥的早餐會朋友。

馮檢基議員：主席，時間過得真快。第二屆立法會的會期即將結束。我在 2000 年透過地區直選重返立法會，看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在過往這段時間裏，無論對我自己或民協成員，有努力過的地方，亦有感到不快的地方。我們發現須予努力的地方是，在這過去數年，即自 1997 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後，由 2000 年直至現在的一段日子裏，香港經濟仍然處於低谷，經濟問題更導致很多民生問題，市民生活困苦。

我最熟悉的深水埗區首當其衝，因為深水埗是 18 個區議會中最貧乏的議會。我們曾經在這數年間，透過立法會，以至區議會、地區組織提出意見，希望政府改善生活困苦的人所遭遇的問題，其中包括失業問題、由以前有兩三份工作減至一份、以至半份工作，甚至失業。面對這些困難，香港人為了解決問題，大部分節衣縮食；可以說，大部分人並沒有因為這些問題而感到煩躁，甚至造成暴力、偷呃騙拐等問題。我們覺得香港仍然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可惜仍有些人因為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而以燒炭、跳樓等方式自行結束生命，這反映了香港生活困難的一面。我感到可惜的是，他們因為生活困難而放棄自己的生命，可愛的是，他們沒有破壞社會，沒有像其他地方在這情況下所會發生的搶劫或暴動事件。

在這個情況下，很多人期望看到政府在政策、施政方面帶領這一羣面對經濟困難的香港人，減輕他們的痛苦和困難。當然，如果能夠早日脫離困境，那便更好。可惜特區政府施政未能因應市民的期望，雖然有做工夫，但總看不見成效；雖然有做工夫，但總是理想多，執行時卻眼高手低。在 1997 年前被香港人公認為全世界最好的公務員隊伍，在遇到一些重大問題例如 SARS 問題、禽流感問題的時候，總是給人“倒瀉籬蟹”的印象。面對改革，政府提出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可是，所有高官都沒有問責，最後總是在羣眾壓迫和輿論壓力下才含淚辭職，香港市民不得不問為何這個政府會弄成這個樣子。

在去年七一之前，我在香港透過以往未有選舉前的壓力團體，或八十年代參加選舉後，一直參與推動香港進行普選、推行民主。可是，我在歷年來推動的力氣已經用盡，效果卻很小。我記得最多人遊行請願和最熱烈要求普選和民主的時候是八十年代當時正是《基本法》草擬的時候，但當時參與的人數也只有數千人。維園集會如有二三千人出席，我們已經感到很高興。但

是，去年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有數十萬，今年的七一遊行也有數十萬。我不理會確實數目是 2 萬、50 萬還是 100 萬，總之人數達幾十萬。我們看到街道擠滿人，這些人不是組織出來的，更不是我們這些壓力團體、政黨動員出來，而是自發走出來的。我們更看到參加遊行的人兩年相比，平均年輕了 10 年，去年我看見的人大概是三十多四十歲，今年看見的是二十多三十歲。如果我們再看看報章的調查，例如香港大學的調查，那些人很多是專業人士。我發覺現在的遊行的目標，已經從不同的問題收窄至絕大部分人的期望——希望有民主政制和民主的政府。政府說已經聽到這些聲音，我覺得七一遊行已經不再局限於某一羣人或站在某邊的人，而是反映香港人的價值觀、文化和訴求。對於這集體訴求，政府除了聽到和看到外，更要知道如何作出回應。

我說以上這段話，是因為我在這 4 年經歷了在我參政的生涯以來未經歷過的數個重要階段，其一是整個社會面對的經濟困難，第二便是政治上要求民主訴求的大波浪，這是我們前所未見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議員應該怎樣做呢？我仍然認為，既要向政府爭取，但亦要跟政府攜手合作想辦法。當然，如果政府不聽不理，我們這些進行爭取的人便只有被迫與政府對立。我仍然維持“有傾有砌”的原則——既要跟政府傾談，希望達致共識一起工作，否則我便被迫要“砌”政府了。舉例來說，我們以往在深水埗經常討論扶貧和處理困難的問題，政府也沒有作出回應。最近，我們惟有改變方法，透過區議會的層次動員深水埗所有志願機構，包括為老人、年青人、新移民提供服務的團體，看看可否一起做好扶貧工作，希望可以達致 1+1 多於 2 的目標。可是，我擔心即使我們找到一些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政府仍舊不願意做。我希望政府認真想一想。多謝。

羅致光議員：主席女士，剛才聽到李卓人議員說要搞選舉，我建議他應想想議會中最“蛇王”的議員是誰。我選了兩人，一個是李家祥議員，另一個是羅致光，即我自己。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們二人生肖都屬蛇，大家可猜猜我們是同年，還是他大我 12 年或 24 年呢？這個留給大家猜猜了。第二個原因，就是大家很快便會“蛇出去”了。

我在立法會及以往的立法局，覺得自己最“威水”之處，便是自己是第一個在立法會辯論上以唱歌形式表達意思的人，我唱的第一首歌是“Blowing in the Wind”，第二首歌是“Streets of London”。不過，後來已很少唱歌了。我正在想，在告別議案中，是否也應唱一首歌呢？但請大家不用擔心，因為近來我要花太多時間處理 SARS 專責委員會及應付傳媒的工作，每晚覆電話要覆至 11 時許，所以沒有時間選歌，亦找不到一首適合在此時表達告別議案內容的歌。

我在議會中有很多不同的感受，不過，我只想與大家分享我對立法會整體形象的感受。我願意擔任 SARS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只有一個原因，而事實上，我最初真的很擔心立法會成立這個專責委員會，一開始便被人批評非常政治化，好像未工作已經有了結論，那麼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是為了甚麼呢？事實上，去年，我心中已很想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雖然我在兩個月前才正式宣布，但心想這樣也好，當這個專責委員會的工作完成後，我便可以告別，所以我覺得應盡量做一件我認為對立法會有幫助的工作。

我覺得擔任立法會議員，會受到一個稱號，令自己常常感到很不舒服。每當有人稱呼我做“尊貴的羅議員”，我便會感到糟了，他一定預備罵我了。通常有人稱呼自己為“尊貴的議員”時，一定是自己有些地方不很稱職，於是對方想罵你，所以有時候當聽到“尊貴的議員”這個稱呼，心裏便會有些質疑。在這議會中，我最不能忍受的是語言暴力，我曾多次真的走出這會議廳，當然我離開時沒有表現出很突然的態度或做任何動作，但原因都是由於我不能忍受這種暴力。有時候，我們要想，作為一個尊貴的議員，如果說話帶有侮辱性的字眼，來侮辱坐在會議廳中的任何一個人，事實上就是不尊重這個議會，亦不尊重自己的身份。我想主席女士也可能感受到，間中有些議員對主席女士不太尊重，這些亦是間接不尊重議會，更是間中、間接不尊重自己作為議員的身份，對於這些，我的感受是比較強的。

我的另一個感受，是有關立法會的整體形象問題。其中一點，是立法會具有很多權力，包括向政府提出質詢，但在口頭質詢中，當看到一個原本應由區議會提出的問題，我便會覺得很奇怪。大家好像真的不介意，我們這麼多人坐在這裏，這麼多官員用很多時間回答這些問題，加起來幾百萬元薪酬的人都坐在這裏，竟然回答一條可能連區議會都會覺得不值得問的問題，我們是否尊重這個議會呢？當然，我明白他們的動機是甚麼，但我相信若要令立法會真的發揮在社會上的角色及監察政府的功能，“尊貴”這兩個字是相當重要的。怎樣來保持這個立法會的資產呢？我希望日後議會內的同事，會盡量做好這一點。

很多人都說我很低調，事實上，剛才李柱銘議員說得對，我並不是想低調，只不過所說的話沒有人報道出來，便自然很低調了。這是我的壞習慣，說話過於長篇大論，好像很有層次，但結果卻沒有人知道我想表達甚麼，所以認識我的市民不多。不過，有時候總不很舒服的，作為一個議員，我平時走在街上，有些人很奇怪的望着我，似乎在說，這麼面善，這人是誰？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同事在鯉魚門吃飯，飯後往停車場，那裏的人問我：“先生，你是誰？你很面善，你是否每天都來鯉魚門吃飯？”這便是我低調的客觀效果。不過，作為尊貴的議員，令我自從 1995 年進入立法局後，再沒有光顧街邊無牌小販，有時候我經過小販檔，看到那些魚蛋和雞蛋仔，我也很想買

一些，不過，由於這個尊貴的議員的身份，便覺得也是不好買了。我相信日後我可以放寬一點了，雖然光顧他們在法律上並不太正確，但可能我也會禁不住光顧。

今天是告別議會，亦是告別我與立法會同事的關係，不過，我相信，我仍會在許多其他不同的工作及場合上與大家見面，以及在各方面進行合作，希望將來再有很多機會，與大家一起為香港社會一同服務。多謝主席女士。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第二屆立法會的會期又屆結束，本人正如主席女士等數位同事一樣，是經過兩屆選舉委員會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在此要特別感謝來自 38 個界別與階層的各位選舉委員會委員對本人和多位議員在議會工作上的支持，特別是選了我們出來，以及在工作上得到他們的鞭策和鼓勵。為了不負各位委員的支持，本人在議會的工作中全力投入，也全力將每一份因議會工作而產生的公共服務工作做到最好，包括在立法會大會及各個委員會的參與，以及因應立法會議員身份而相應參與的其他社會公職，例如在房屋、社會服務、大學教育、強制性公積金，以至漁農業等方面的各項義務工作。

本人參與立法會的工作時所秉承的理念，總體而言是與議會各位同事一起，努力做好在“一國兩制”之下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立法工作，具體上是監察和促進政府真正落實剛才提及的“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維護我們自由市場的運作，以穩健的態度處理公共財政。同時，本人也深信，議員應維繫香港與內地良好的合作與溝通關係，並嚴格依循《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確保均衡參與，從而推動香港的政制、經濟、民生等各方面的全面發展。本人參政議政，除了盡心投入之外，所持的原則一貫是就事論事。由於代表着 38 個界別與階層，既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又要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絕對不為反對而反對，假如因為在理念上與政府施政的方向在大多數情況下一致，這正好證明政府與本人也同樣是面向全港各界，平衡整體利益，本人也絕不介懷被視為接近或屬親政府的一方，因為事實證明，在一些重要政策或有關法案上，本人仍然是本着“是其所是、非其非”的態度。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最新近的例子便是，本人與其他多位獨立議員在上月由於關注稅務對市場運作的影響，因此對政府在《2000 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內的立法建

議投反對票。當然，可能有人會說這種情況是否較為少一點，但我們在應該反對時，我們便會投反對票。至於對低技術勞工的就業政策、公私營醫療配合的政策，以至改善公營廣播政策等，本人經常也提出多方面的意見，在這些方面，很多時候，議會的同事甚至認為本人有太多的堅持。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回顧本屆 4 年的工作，本人與選舉委員會的委員仍保持很密切的聯絡和溝通。委員一直有關注公共事務的熱忱，對於公共政策，也不時透過本人提出很多意見，他們亦有不少真知灼見。選舉委員會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來自 4 個組別共 38 個界別及階層的，因此，它本身所代表的各行各業選民團體及個人的人數多達 18 萬人，就香港這個以經濟運作為重心的社會來說，的確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自回歸以來，他們發揮了各行各業均衡參與的重要作用，現在基本上已完成了選舉委員會在立法會議員選舉中的歷史任務了。與此同時，事實證明了選舉委員會這個制度本身所具備的均衡參與優勢仍然有發展的空間，對香港各行各業和各界別有特殊的平衡功能，值得政府在廣納民意和改善施政的工作中加以充分使用。

在政制發展檢討的過程中，本人便堅持和建議政府應該多諮詢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意見。當然，本會很多議員同事也是當然委員，本人也很高興看到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能夠採納並落實這項建議。本人認為在今後不同政策範疇內的施政，甚至在立法工作的過程當中，政府也應該進一步重視選舉委員會所擔當的角色，並充分利用這個現成並有廣泛代表性的架構，採用這個意見表達的渠道。

本人深信，求穩定、謀發展，是香港社會的民心所向，特區政府必須繼續維持和推進均衡參與的歷史優勢，維護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只有這樣，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才確有保障。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自從我說過不參選後，有些同事私下表示很羨慕我，因為我無須進行選舉的工作，傳媒朋友亦多次問我，為甚麼不參選。因為常常回答這些問題，以為今天已沒有甚麼好說了，但傳媒說，不如你“激”一點，“爆下料”吧。我有一個優點，就是有自知之明，知人者智，知己才是明。“爆”人的話，倒不如“爆”自己的癥事好了。

進入政圈 13 年，知道自己做事有時候未必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來做，唯一真正可以自己作決定的，就是在何時及在甚麼情況下離開這個政圈。當時，我想到有 3 個選擇，第一，是很轟烈地說，像李鵬飛般，參加直選嘗試那種滋味；第二，是很有尊嚴、很有道義地，好像梁智鴻般下台，可惜他請辭得慢了——否則，我也有衝動跟他一樣，因為我已說過自己會辭職——所以跟不到；第三，是靜悄悄地，來時清風兩袖，去時也不帶走一片雲彩。

登上政治舞台，知道這是一個戲劇人生，我曾經覺得自己是一種很穩重、堅定和專業的角色，但其實只能做一個甘草角色，我實在很不滿意。我亦曾嘗試做一個政治明星，努力塑造形象，突破自我，但最後亦不很成功。我知道心平氣和，開心快樂地做回自己才是命中註定的。

我嘗試模倣過很多議員，不過，請大家不要太認真，當作廢話聽聽就好了。第一個是張文光議員，請大家不要見笑。（眾笑）最初覺得張文光議員口才了得，出口成文，說過的話，第二天就成為新聞，我覺得他沒有甚麼了不起，討論教育問題人人都懂得，於是我又討論一下。我當時提及書包很重，寓意教育制度給學生的壓力，但說了之後，功力就很見不足，只是東施效顰，當年報章便批評這個是最無聊的議題，但張文光議員年年都說這個問題，年年都繼續見報，所以我知道模倣他是很不容易的。

我亦曾模倣楊森議員和許賢發議員，他們討論社會福利。我亦擔任過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等工作。當時的熱門問題是“包二奶”，我覺得李華明議員、鄭家富議員等作為“師奶殺手”，也顯得頗為開心及很有型，於是說出事實婚姻這一點，指“包二奶”不外乎一紙婚書的分別，當天晚上便給晚報“轟”了，雖然得到婦女的支持，但卻給文化界追打得百辭莫辯，有理說不清，我連“師奶殺手”都不敢做了。

我亦覺得李柱銘議員、黃宏發議員及“華叔”等談論政治威風八面，於是我嘗試找一些政治議題討論一下。當時與李鵬飛議員及楊孝華議員一起去“九四方案”，但大家也知道，結果是慘痛收場，終於“水浸立法會”。

本來眼淚也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政治武器，但哭要視乎有沒有功力，哭得是否感人，我做不到劉千石議員那樣，一哭就激起千重浪，夏佳理議員一哭就成為人民英雄，鄧蓮如議員為香港前途而哭，劉柔芬議員、麥國風議員、陳國強議員昨天為我們的 SARS 英雄而悲哀，而我只能做一個最沒有政治智慧的“喊包”。

最高明的一次是與英明神武的早餐派議員一起“砌”房屋政策及地產政策，我們當時找到這個好議題，針對當時的“八萬五”政策，主張停建居屋，我們合作發信給孫明揚局長，以為有一個話題，誰知孫局長太快投降，立即改變所有政府政策，“八萬五”政策沒有了，居屋又停建，我新找到的直選議題便立即消失了，因為無法說下去了。

至於涂謹申議員，由於劉健儀議員說得慢了一點，我不知道還有一個叫“數皇”的名號，但我也做了 14 年的 ICAC，證監會做了 8 年，以為說一下保安也可以，那麼多男子漢都聽他說話。本來有一條關於證監會的法案是由我提出，誰知道現在來不及提出，失去了最後的機會。

我說了那些自己曾經嘗試但不成功的事後，也說一說自己曾經想過自己還有哪些其他條件。

主席女士，很多議員也具備參加直選的條件，主席女士，我認為你便是其中一位，你坐在主席的寶座上，非常淡定，有威嚴，而我連坐也坐不定（你知道我是整天進出會議廳的），加上你有很好的氣質，你一走下寶座之後，便帶着很親民的笑容，這亦是我自問做不到的。

田北俊議員是一個很 cool 的議員，有大量的磁力，我不是埋怨他一接近記者房便把記者吸引着，而是他能夠將七黨一派一綫，都可以黏在一起，以這種特異功能，黏選票相信亦非難事。

朱幼麟議員上天下海，十八般武藝，無所不能，那麼多姿多采的選舉，我自嘆不如。

周梁淑怡議員除了是政壇大姐外，一句“今天這樣的服務態度還不夠好”，已經盡在不言中，人人記得。

黃宏發議員天馬行空的思維，辯論時聽似無招，心中有招，通常分析問題出人意表，我只配做他的學生。

曾鈺成議員、李柱銘議員、余若薇議員、吳靄儀議員、劉江華議員都有辯才，思路分明，寸土必爭，這些辯才令人佩服，我對他們是無言以對。

劉慧卿議員除了勤力盡責及溫柔之外，還有很硬的腰骨，這都是我做不到的，特別是她和鄭家富議員“瞓”街的時候。（眾笑）

陳智思議員，是無敵青年，年輕，亦如馬英九般英俊，這些條件我同樣是沒有的。總之，我寫不了那麼多人，也說不了那麼多個，但各人具備不同的直選條件，各自精采。我唯一可以說一說自己在會計界別所享有的一點尊嚴，這點我與劉健儀議員是比較相似的，特別是我們連關心小孩子都是一樣。

我唯一開心的是，走了一個大圈後找回了自己，我沒有迷失方向，過了很豐足的 13 年，交了很多肝膽相照、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有甚麼不開心的事都忘記了。我記得的只是在彩虹之中，一船星輝的回憶。今天，我能夠劃上一個美麗的句號了，祝願大家在本年 10 月回來這裏，希望大家記得在外面的市民之中，有一位是關心大家、很有興趣看着大家如何為香港前途而奮鬥的朋友。

司徒華議員：主席，我以回應一些議員有關我的言論，來作為告別議案的發言。

首先，有關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的議員曾經多次抨擊我的兩件事：

1985 年 12 月 18 日，幾乎是 19 年前了，立法局提出關於設立長期服務金的法案。當時，我是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的成員，在勞顧會內外，大家進行了長期的協商，特別是和資方的陳瑞球先生，達成了協議。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的代表潘靖也有參加協商和接納這項協議。可是，在法案提出時，有人反對，認為寧願有缺失的法例延遲通過實施，甚至寧願不要，但我支持法案，覺得他所說的意見是違反廣大僱員利益的、不負責任的和譁眾取寵的。最近這數年，勞顧會的一些協議，我並沒有同意，於是便被抨擊為態度前後不一。我的回應是：第一、這些的協議的達成，我沒有參與，亦沒有給予接納的承諾；第二、已經十多二十年了，時代進步了，僱員的覺醒提高了，亦應該有較高的訴求，但有些人僵化，並沒有與時並進，不反思，為抨擊而抨擊；第三、抨擊我的人當時在長期服務金的協議上，是曾經參與和接納了承諾的，只不過後來言而無信地“轉軚”而已。

第二件事是：1997 年 4 月，我到美加為民主黨籌款，曾說過回歸之後如果離港，或許不能回去，因而下淚。民建聯的議員多次以此嘲諷我，其實有甚麼可以嘲諷呢？第一、來日方長，要放長雙眼看；第二、香港的公民社會已經形成，民主力量不斷壯大，某些人不做某些事，不是不想做，只不過是不敢做；第三、我的下淚，是悲哀而不是畏懼，畏懼才是值得嘲諷的。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梁富華議員的。我曾經提及，1982 年 9 月 18 日，在維園舉行“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篡改侵華史實群眾大會”，當時鄭耀棠應邀出席發言。但是，在舉行大會前數天，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忽然說，此事已告一段落。鄭耀棠來找我，問他的發言應該怎樣說。我說：“工聯會是一個民間組織，不須與官方的言論一致，千萬不要說這件事告一段落，否則會被會眾轟下台的。”梁富華議員對於我的複述，說我是狂妄自大。他究竟有沒有問過鄭耀棠是否有這樣的事實，以及他有否接納我的意見？

其實，徵求和接納別人的意見，謙虛可貴，並非可耻。

我再說一件事。工聯會設立了工人醫療所多年，但沒有牙科服務。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很早便設立了牙科診所。鄭耀棠來請教，教協是怎樣和牙醫合作的呢？我很詳細地告訴他，我們是採取分帳制，並將我們和牙醫簽訂的合約副本給他參考。梁富華議員可以問一問鄭耀棠是否有這樣的事。

7 月 6 日，我在《明報》的“三言堂”專欄刊出了有關立法會告別議案的一篇文章。現在我將它的內容簡略覆述一下：

“有議員曾批評我是‘政治動物’……人是動物，動物包括了人，‘政治動物’並不可耻，但千萬不要做‘政治禽獸’，更不要做‘政治蝙蝠’。……”

又有人常常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我以為……出賣背棄原則的妥協……不是‘藝術’，而是‘偽術’。……

‘政治智慧’，常有人提及，……我認為‘政治道德’是首要的，沒有‘政治道德’的所謂‘政治智慧’，只是沒有靈魂的權術、詭計、技倆而已。……”

1985 年，我第一次參選立法局的時候，口號是“鞠躬盡瘁，貫徹始終”。18 年來，我對這個口號是無愧的。

最後一句話，做不做議員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人，不要辜負“人”這個莊嚴的稱號。

主席，我謹此陳辭，臨別贈言。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聽了“華叔”那樣沉重的言論，我想我是承不上的，“華叔”，對不起，我會用一個平常心的心態來說這一番話。

剛才馮檢基議員說，我們未來對政府的態度應該繼續是又“砌”又爭取合作。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切合這個年代的工作模式。在這裏，我想向大家說，有一本很風行的書，今天早上，我們在樓上也談及過，這本書亦是由我一個認識的朋友所寫的，題為 *Negotiating for a Yes*。因為各位都不會是我的選民，我只可以答應，我會預備這本書共 60 本，當 10 月大家重返議會時，我會每人送一本，我希望拿着這本書——不能回來的議員，如有需要，我亦會很樂意送給他，即這本書會每人送一本。我認為，我們不要再說是否堅持，因為有很多事情，現在是應該因應時代，有些事情是要轉一個彎來走的，有很多路不是直衝過去的。以往興建房屋可能用很簡陋的磚牆，或是用木搭建，撞過去最多也只會撞倒那道牆，但現在是用鋼鐵興建，所以有時候要轉一轉彎來走，我希望這本書能夠令我們的議會從另一個層次來看事物，亦因應羅致光議員所說，讓我們能夠選一些更深入的議題在議會上討論，不再是一些連區議會也可能不應提出來的議題。

在這裏，我想指出，剛才多位議員亦曾提及一些民生問題，其實，我們若要解決香港的各種問題，最終應該從加大香港“經濟餅”的角度。在這裏我或許替丁午壽議員宣傳一下，就是在本星期一（7 月 12 日）下午 4 時半，工商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會由一些專家說說如何加大香港“經濟餅”這個層次的問題。這將是邊境工業區的伸延，我越來越有信心，這確是我們未來之路。在此我希望大家能夠參與。

其實，我們的議會似乎有各黨各派，亦有各種堅持，我完全同意“華叔”所說，做人是要有堅持。但是，堅持之餘，並不是以一條直線的方式直衝的。我覺得，正如我的名字叫劉柔芬，我很着重自己名字中的“柔”字，即有很多方法達成目標。我今時今日，能夠以當天赤腳來到香港，當天是沒有鞋穿的，亦是憑自己白手興家，時至今天能與多位尊貴的議員共事一堂，我覺得我也有一點成就，這就是靠自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物所致。

我希望，我們若重回議會，能夠看一看——大家未必一定同意，社會上在這數年間有沒有分化的說法，也無須一定同意。但是，只要有一把聲音說有分化，我們作為這個立法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考慮這個分化在於哪裏？始於哪裏？這些都並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們立法會這 60 位議員不要給人一個分化的現象。

有甚麼辦法可以解決呢？其實，甚麼問題也可以溝通，我希望我重回議會的時候（暫時來說，機會應該頗大的），能夠肩負這個盡量做溝通的角色，即任何人都可以溝通。今次擔任了 **SARS** 專責委員會的工作之後，我覺得溝通根本是很容易的事，我們在專責委員會中亦有各黨各派，關上門後一切問題都透過討論解決，即使吵架，到最後都可以擺平任何問題。為甚麼我們不好呢？我們公布了那份報告，當然亦有很多批評，但我可以告訴大家，第二天，我刻意找一些有相當成就的專業人士詳談，請他們看看那份報告，他們認為我們是很“**logical**”，即很能有邏輯地分析每件事，這給我很大的信心。

我覺得除了溝通的技巧外，另一方面是協商，如果能協商就協商，如果不能協商，最低限度，我們應該採取一種互相尊重的態度。我很同意羅致光議員所說，我很鄙視語言暴力，我覺得，我們雖是動物的一種，但我們可以用語言來溝通，用心來表達，無須用任何形式的暴力來表達任何事的。

在此，我亦想說一說“低調”的問題。我自己亦被傳媒批評為最低調的一個，我至今仍沒有能像羅致光議員般，分析自己為何那麼低調。第一，我覺得不說話或不用說，有些事大家是心裏明白的，若要說的時候，就可能說得太過理想化，以致大家不明白。在這方面，我還要努力。不過，有一次在北角某大廈的公眾電梯，即電動電梯，我正乘電梯向下，剛有一對男女乘電梯上來，他們的態度當然很親密，但當那個男的望一望我，發覺是我之後，立即“彈開三尺”，然後望着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個女的卻又對着我笑，我也只好向她笑一笑。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我想就由大家自己演繹好了。

接着，我會以另一個角度來做另一件事，在此，我亦想與大家分享，那就是大家都重視的，我叫它做 **quality parenting**。我希望可以在未來的 4 年為自己推展一個新的工作項目。

多謝主席。

劉千石議員：主席，我想趁今天告別議案的機會，提出我過去一段時間內所看見的一些問題，以及將來努力的方向。

首先，我想說一說兩次七一遊行。這兩次遊行都有不少年輕一代的參與，他們關心香港前途，也展示出對民主的堅持。他們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積極參與，很令人欣慰和鼓舞。但是，我亦看見令我憂心的一點，正如我在 5 月 5 日的辯論時提及，我預見日後香港的民主運動，本土意識會越來越濃。我想就這點說得清楚一點。

自由、民主、法治是港人所認同，是港人的共識，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但是，我看見，相對於我們這一代，香港的年青一代，他們成長的環境、生活方式，令他們對國家少了一份鄉土情懷。老一輩的香港人，很多好像我們般，曾在內地生活過，因此對於部分親中人士的言行，多一分親身的體驗、多一分掌握、多一分的理解。但是，對年青人來說，他們會覺得格格不入、無法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當年輕人看見中央政府處理香港政改的手法，他們會感到高壓、會覺得反感，在感情和身份的認同上，會更為疏遠中國。

很多人說七一遊行是一個建構和強化香港人文化身份的過程，但如果在這過程中，疏遠中國的元素繼續強化，我擔心一旦形成趨勢，要扭轉就會有相當、相當的困難。

主席，我再次提出這個憂慮，不是說誰對、誰錯，我只想提出，在獨特的歷史環境下，會出現一個可能發展的趨勢，我並促請大家（包括民主派、親中派及中央政府）想一想，這個發展的方向是不是我們願意看見的。

我跟很多民主派的朋友都一樣，我們的理想，是希望香港能夠成為偉大中國的一個偉大城市。我樂於看見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繼續深化，但同時，我也希望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不是寄於對國家的疏離，在這方面中央必須正視，必須爭取港人的認同。

即使撇開民族感情，香港要發展民主，除了我們要努力打拼爭取外，在某程度上，是要中央覺得放心。上月初，我提出中央及政府與民主派展開對話，除了希望緩和當時緊張的政治氣氛，減少分化、減少對立、減少內鬨之外，也希望透過中港接觸和溝通，拉近港人和中國在文化觀感及身份認同上的落差，拉近北京和港人對爭取民主訴求的肯定。我相信只有這樣，才可創造有利香港民主發展的環境，有利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

主席，當然有人會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相信，民主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特質，是多元和包容，而我更相信所有爭取民主的朋友，也會堅守多元和包容的信念。作為民主派的一分子，我覺得我有責任將看見的問題提出，讓大家考慮。過去，我曾提出不同的意見，今後，我也會繼續這樣做。

在未來的日子，我仍然會堅守“飯碗、公義、民主”的綱領，但我也會抓緊每個可與中央溝通的機會，因為我相信這樣是有助於達到民主早日實現的目標，我期望中央和港人可以攜手合作，實現我們的共同理想——民族回歸、民心回歸、民主回歸。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大家，也多謝秘書處所有同事、即時傳譯的同事，我給你們帶來很多麻煩，包括保安同事、服務員，以及所有、所有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人。多謝。

胡經昌議員：主席女士，我希望第三屆立法會能夠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因為目前香港整體經濟正處於逐步恢復的階段，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須立法會議員盡快處理。再者，根據財政司司長的減赤時間表，估計要待 2008-09 年度才能夠解決財赤問題，因此，我期望第三屆立法會議員可以加倍努力，盡力加快工作，提早達致減赤的目標。

主席女士，其實我的助理替我寫了 11 篇紙的稿，我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讀完，因此，我不會照着稿子讀的了。至於工作報告，我可以向大家另行提供。

主席女士，雖然在過去 4 年，我已經順利完成不少有關金融服務界的工作，但有關工作仍須持續的監察，而部分仍未達到目標的工作，更須進一步積極跟進。事實上，這 4 年的工作也並非事事稱心如意，部分重大事項結果甚至令我和業界感到十分沮喪。

就今天的“告別議案”，其實我本來不準備多說，特別因為我不希望自本屆立法會會期第一次發言到今天，一直爭吵至最後。可是，因為數天前一位業界朋友，或業界人士，要求我將他對證監會一些執法手段和態度的看法向大家說一說，因此，我今天便要履行我的諾言。

這位朋友一向關心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對一些違規違法的行為非常、非常關注，並曾多次向證監會投訴或舉報。據瞭解，曾經有些投訴成立了，令一些不法之徒被繩之於法。但是，證監會卻連多謝也沒有說，更將好人當賊辦。我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在早期的一宗舉報個案中，儘管他是原訴，即原訴人，卻反被視為“疑犯”，現在隨時可能變為“被告”，他說證監會這種態度，相信大家也有目共睹。

這個例子和其他例子只是冰山一角，相信還有不少個案的當事人怯於證監會的強權，恐怕影響其業務運作而被迫啞忍，逆來順受。可以預見，制衡證監會過大和不合理的權力將是未來立法會的重點工作之一。

我現在希望轉談一些輕鬆一點的事情，因為今天很多朋友，很多同事也很輕鬆的。對我來說，立法會其實是一所學府，因為在我過去一段時間裏，即在這數年間，學會了很多東西。從各位同事、甚至是立法會秘書處的同事

和政府的官員身上，我學會了很多東西，特別是在政治方面。可是，若立法會是一所學校的話，我相信，我想我們最少也是 **Band 8** 的了。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大家都清楚，我們經常在這裏吵架。哪裏會有上堂吵架的呢？第二，很多時候，我們又遲到早退，又曠課，更在課堂上吃東西，我想這些是不會在學校發生的。幸好我們的主席，即班長，控制得宜，不致有打架，不然就會像台灣那樣，我想我們的學校便要立即變作 **Band 9** 了。

我為甚麼說這些事情？主席女士，因為今天的會議是本屆立法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我希望是最後一次，主席女士，**touch wood**。我希望在稍後至 9 月底的期間不用再開會，不然便很大件事。“告別議案”的議案令人聯想起一所學校學期完結，我們快要放暑假了。我於日前曾往一所學校，即金銀業貿易場學校的畢業禮，而他們進行了一個傳統的傳徽禮，由一個畢業的六年級同學將一面錦旗交給一個五年級的同學代表全校接受。在傳徽禮過程中，他們會說一些話，而稍後我會加以節錄，也學他們那樣，說一些話來祝願我們自己。

現在就讓我引用傳徽禮的精神來祝賀第二屆立法會圓滿成功，也祝願第三屆立法會順利產生和運作順利：“余謹以至誠，期望第三屆立法會議員，秉承我會傳統精神，繼續努力，發揚光大，普照萬方，是所厚望，並祝列位同僚，健康快樂，而完成任務功成身退諸君，前程無量。”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吳靄儀議員：主席女士，我曾認真考慮今天應否投反對票，因為告別議案述說本會已完成工作。可是，本會是否已完成了工作？今天報章刊載我們在這 4 年裏共通過了 148 項法例修訂、74 項決議、還有 908 項附屬法例修訂，而我一直關心的《土地業權條例》，亦包括其中，這確令我放下心頭大石。在政府方面來說，這不單止是完成工作，更是完成任務，因為我們通過了有關校本管理的條例草案。這可以說是完成任務，因為教會是唯一能夠與政府分庭抗禮的有組織力量，而教會的力量是體現於教育，因此，若除去了教育，這個宗教便“只有天上，並無人間”，因此，通過有關校本管理的條例草案，對政府而言，是完成任務。

至於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我不認為這件事已經完結，因為擱置了是會回來的。儘管如此，這仍不是令我認為要投反對票的理由。最令我非常介懷的反而是行政長官仍然不受有關防賄的條例規管。我們由 1998 年開始爭取，過了 2000 年，又由 2000 年爭取至 2004 年，行政長官才說願意受法例規管，政府才說會研究修訂法例。時至今天，我們

已通過了這麼多項法例、附屬法例、議案，甚至連《土地業權條例》也通過了，改變了 150 年的土地買賣規格。可是，到了今天，在行政長官受有關防賄的條例規管方面，竟然連簡單的條文也還未完成。這怎能說已完成工作呢？單是這點，便令我認為我們不能說已完成工作。“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為何只有行政長官受有關防賄的條例規管這件事不能完成呢？

主席女士，由於議案中第二句的所指，使我覺得很難投反對票，因為它祝願第三屆立法會順利產生，而我的確誠心祝願第三屆立法會能順利產生。2000 年至 2004 年的立法會的確是一個分水嶺，當我們回顧 2000 年的時候，我簡直有仿如隔世的感覺，因為在民主進程方面來說，我們傳統的議會過渡至可能是一個民主的議會。經過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抗爭、SARS 的抗疫，香港已經凝聚了很清晰的概念，便是我們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爭取一些東西，而經過兩次七一遊行，這民主力量，以及對民主的肯定，特別是對自己的肯定，而且已經成形。無論是功能界別的議員，或是直選的議員都一定要走入羣眾，這便是我們的民主不歸路，正如余若薇議員在我們昨天辯論 SARS 報告時所說，我們應汲取一個很清晰的教訓：若議會不反映民意，民意便會直接表達自己；民意便會走上街頭；民意便會迫問責高官下台。我們要記着這個教訓。這是一個分水嶺。

主席女士，剛才劉千石議員談及民主時語重深長，指出本土民主會有問題，說將來本土民主會缺乏鄉土之情。我與“石兄”有一處共同的地方，便是我們對中國文化都充滿鄉土之情，但我覺得劉千石議員無須太擔心，因為在今年七一遊行中，我在公園等待出發時，有一位大約二十多三十歲的青年人看到我走過，他說：“吳靄儀議員，記着 1 個口號。”我說好的，我記着，你說吧。他說：“中國民主，香港開始；中國民主，市民開始；中國民主，七一開始。”他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人，他不是要香港與中國分開，他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有責任走先這一步，他的理想，最終的民主理想，是中國的民主，是世界的民主。“石兄”，你可以放心了。謝謝主席女士。

劉炳章議員：主席女士，匆匆 4 年。猶記得 4 年前，我最初加入這個議會時，剛好出現了揭露房屋署短樁的事件，我們整個行業的聲譽遭受質疑；加上房地產逐漸呈現萎縮情況，業界生計當時面臨威脅。當時，我認定北上發展將能為本地製造業開創新路向，為同業開拓新空間。當時，我以為憑藉個人經驗和業界的集體智慧，當可為房屋署專業職系的會員澄清不白，並繼承前輩的努力，推動和落實內地與香港同業資格互認，讓本地專業可以北上，既可開拓商機及就業機會，也可協助祖國建設，加快內地同業跟世界標準接軌。

回望 4 年的立法會工作，立法會不單止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短樁事件，還完成了報告，揭露了問題的深種所在，不法行為是如何誘發，以還房屋署專業職系朋友一個公道。至於內地與香港專業資格互認的問題，適逢國家入世，促使內地與香港達成“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此大潮流下，專業資格互認自然水到渠成。中國房地產估價師學會跟香港測量師學會，以及全國註冊建築師管理委員會跟香港建築師學會已先後簽署協議，落實補充考試，首批可在兩地執業的專業人士已順利產生，而其他學會與內地對口團體的磋商，也有了實質進展。這項工作在業界共同努力下，以及在特區政府支持下，中期成績表總算是僥倖有所交代。

然而，當香港剛舉步走出經濟谷底時，去年卻觸發了波瀾壯闊的七一大遊行，整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躁動，立法會更是焦點所在。人在熱廚，灼熱可知。催迫一向溫純的市民上街，舉步表達不滿，除了是因為當時的經濟不好，政府連番施政失誤外，有兩件與業界頗有關係的事，其實是值得再探討的，而這兩件事亦是我感受最深的。

一向以來，公務員隊伍是香港一股穩定力量。因此，我一向支持政府採取“優薪養廉”的公務員政策，使公務員隊伍成為香港一支保存中立的精英。無奈，2002 年整體經濟下調，政府財政緊絀，公私營機構員工的薪酬差距巨大，政府沿用的減薪趨勢調查也得出公務員薪酬須下調的結果。在此形勢下，政府立法減薪，與公務員主流工會勢成水火。

我雖用盡辦法，包括安排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跟我界別內 15 個專業職系工會代表會面，磋商折衷方案，又向行政長官建議押後提交減薪法案或改由立法會議員提出法案等，無奈政府和主流工會各走極端，不肯讓步。加上在法例審議前夕，業界一個學會主動約見，出示所做的會員薪酬調查，顯示公私營機構僱員的收入差距超逾四成，要求我表決支持減薪。最後，我惟有作出痛苦選擇。在這次事件中，政府固然失去夥伴，而我亦成為磨心，如“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此外，觸發七一的導火線是《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這原是《基本法》所訂明特區須履行的責任，業界學會也曾表態支持立法，但政府自 2002 年 9 月開始諮詢，已展露出是急不及待。結果，政府越執意催生該條例草案，便越引起港人更大疑慮、反彈，迫使社會陷於非黑即白的境地，躁動起來，理性客觀的聲音已難見容於傳媒。其後的發展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法案以擱置告終。

市民情緒未有隨法案擱置而平靜下來，旋即嚷起要在 2007 及 08 年實行雙普選的聲音。可惜，一陣急風驟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在今年 4 月否決了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在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我曾作出努力，致函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亦委託了政務司司長將我的信遞交給喬曉陽副秘書長，要求人大常委會不要否決雙普選方案，讓港人有更多選擇。可惜，最終無法改變。

回望《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功虧一簣，以及 2007 及 08 年雙普選無望，看似是兩件獨立事件，但卻有共通處。立法保障國家安全是特區義務，直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成員更是我們的權利，誰能說權與責無關呢？但願 9 月立法會換屆，新選出的議員能有聰明智慧，帶領香港完成《基本法》的責任，好讓我們早日得到普選的權利。

我謹此陳辭。此外，我亦想藉此多謝立法會其他議員和各職級的政府官員，在過去 4 年給我的指導及意見，更要多謝各位立法會員工、秘書處上下各人對議員們和我所提供的支援及協助。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本來寫好了一篇稿，準備作為告別議案的總結。不過，剛才我在政府合署一邊工作，一邊聽議案辯論時，卻聽到很多笑聲，感到這是一次很愉快輕鬆的議案辯論，故此，我覺得無須太嚴肅，更希望就剛才多位同事發言的風格、對其他同事的看法或對議會過去 4 年的工作，積極作出較輕鬆的回應。

主席女士，談到告別議案，我在 1995 年加入立法局，在 1997 年不幸被迫下車。在我印象中，當晚的告別議案通宵達旦地進行，但我最記憶猶新的，卻與現時不在座的陳鑑林議員有關。後來，我也曾跟他說，在我過去數年的工作中，直至現在，即九七後數年，我看見陳鑑林議員笑得最燦爛的時刻，便是在完成 1997 年 6 月 30 日的告別議案時。那時候，當我們完成告別議案辯論要離開時，他很開心，我便這樣想：“對了，大家開開心心不就好了嗎，陳鑑林議員？大家除了針鋒相對之外，也是朋友。”他也微笑向我回應。我不知道他是否因為覺得民主派活該，要在 1997 年落車，因此而開心地笑，我便不得而知了。

不過，我剛才聽到很多同事，特別是自由黨的議員，在告別議案辯論中談及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或保皇黨和反對派在議會內的激辯，而羅致光議員甚至提及語言暴力。我的即時反應便是“不知鄭家富議員是否需要對號入座呢？”因為很多時候，我的說話可能會過火了一點。不過，主席女士，我經

常都堅守一項原則——儘管發言時聲量可能大了一點或粗魯了一點，但我也盡量避免傷及別人的自尊心。

主席女士，我想你也記得那天你叫我“罰留堂”，在會後到你的辦公室對話。當時我的心情也是一樣。對於主席女士，即立法會主席，我與其他同事一般都是尊敬萬分的。可是，大概由於我仍有少許年輕人的衝動，很多時候會感到自己的看法和原則被觸動，希望主席與我之間較為激烈或激動的對話，在我們立法會的歷史中，只是一些不會傷害立法會主席權威的浪花。我看見主席你現在向我微笑，相信你也認同。（眾笑）

主席女士，在 2000 年之後首兩年，我的直接感覺是我們立法會甚麼也幹不來。剛才吳靄儀議員提及分水嶺，說在七一之後，政治生態變得很不同。可是，在七一之前，我曾對數位同事談及這感覺。我特別記得一次吃飯時跟李卓人議員的談話，那時候我們剛在分組點票中輸了，大家都無言以對，感到很吃力，覺得每次到最後分組點票便會輸，即使投票的數字加起來是大多數，也會因為分組點票而輸了。我們都感到很氣餒、很氣餒。更令我氣餒的是，有時候我代替林旭華與“大班”一起主持電台節目，他經常說立法會是“垃圾會”，關了咪高峰又問我為甚麼做“垃圾會”議員，還是不要做好了，他總是“垃圾會”、“垃圾會”的說過不停。接着，在上街後，他又對我說“對了，鄭家富議員還做甚麼‘垃圾會’議員，做來為了甚麼？”我內心感到很痛，立法會，讀歪了就變成“垃圾會”，予人的感覺是否甚麼也幹不來？

今天的議題是期盼第三屆順利展開工作。我也懷着期盼的心情，無論民主派能否得到過半數或接近一半的議席，令政府可能感到壓力也好，我也希望我們的議會真正能代表民意，不要讓人感到我們是“垃圾會”。這是我的強烈感覺。我也希望立法會能有新一代輪替。雖然司徒華議員剛才發言時沒有清楚說會否參選，但到最後他也說臨別贈言，故此大家可能有少許依依不捨。“華叔”說可能不參選，羅致光議員也說了不參選，李家祥議員又表明不參選，而其他可能參選的又未必能獲選（這包括我自己在內），沒有一個人有膽量說自己一定能回來。但是，我仍期盼在議會內新一代的輪替。無論怎樣，七一市民的聲音是期盼我們立法會以及政府能聽取市民的聲音。這是很重要的。

最後，在新一屆議會選舉中，我盼望同事們，包括自由黨的議員成為我們的直選競爭對手（因為自由黨田北俊議員將在新界東出選）。我私底下曾向很多民主派的同事坦言，自由黨參與直選是一個突破。雖然在競選過程中大家可能會互相鬥爭和爭取選票，但我真的衷心期盼自由黨能夠衝出功能界

別的選舉框框，經直選的洗禮後能與直選產生的民主派同事合作共事，一起在議會內為香港尋求進步。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每當演唱會臨近尾聲，台上的燈光總是黯然。隨着舞台徐徐下降，觀眾會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有人說立法會像一個政治舞台，不少人在表演，但我相信各位同事也是負有死命，（眾笑）是負有使命，並非出於一己虛榮。我們有時候聲嘶力竭，也只是為了帶出問題，促請政府改善。

由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立法會至今，我也是由勞工界別的選民選出來。雖然並非出自直選，但一樣是以服務基層為己任。在本屆立法會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發生了不少大事，像非典型肺炎疫症、企業裁員成風、公務員減薪法例、政制問題等。每次有事情發生，相信在座多位同事和我一樣，也會接受不同界別和團體申訴。基本上，我會較注重民生問題，較少談及政治問題，或許因此損失了不少曝光機會，但這正正讓不同界別在立法會發揮各自功能。在鏡頭以外，我所接受的申訴也頗多，在議會內外也要替工會督責政府，反映訴求。

雖然我跟大部分同事共事的日子不算特別長，不及“嫺姐”、“華叔”等由前朝擔任立法局議員到今天的立法會議員，但我也會珍惜曾一起為各項政策努力的日子，亦感到能和大家愉快地度過了 6 年光陰，實在是我的榮幸。

我也很感激各工會給我機會為勞工界服務。本來，一切也可隨泡影而逝——我自問在 6 年內已盡力為勞工界別解決困難和問題，即使我的姿態不算高調，但也不算懶惰——但唯一教我擔心的，便是公務員及基層勞工將面臨更大沖擊，正如政府不斷強調壓縮編制，削減人手。另一方面，就業環境每下愈況，“打工仔”的議價能力仍未顯著回升。所以，將來不論是在會內或會外，我仍會為勞工團體服務及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

今天的告別議案一完結，便不知大家何時再會，也不知能否有機會返回議事堂反映市民心聲、反映工會訴求。然而，我祝願大家身體健康，開工順利，特區依然繁榮昌盛，永不見日落暮色。最後，送上杜甫“古柏行”的一句詩作結：“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是造化功”。只要順其自然，無須過分擔心將來，讓我以此作為我和同事共勉。多謝主席女士。

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With this belief, I would like to pay my respect to the few officials who have left and who are going to leave. They are Antony LEUNG, Regina IP, and E K YEOH. For the good they have done to Hong Kong, they must be remembered.

主席女士，在這項告別議案中，我不知道要說甚麼，所以，我在 Ante-Chamber 問了很多位經驗較我豐富的議員，應該說些甚麼。（眾笑）有些同事說，你“飲杯茶，食個包，慳番啖氣啦”；（眾笑）有些議員說：“‘阿石’，你說說笑吧。”我問：“說甚麼笑呀？”他們說：“很簡單，祝福 22 位民主派議員快點取得回鄉證，那麼他們便不用回來參加九一二的選舉了”。我現在祝福你們快點取得回鄉證。（眾笑）

Madam President, that is all for jokes. Goodbye is the hardest word to utter, and for this reason, I shall not say goodbye here, but wis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good luck in whatever you do or contemplate to do.

Madam President, as a freshman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you have been my role model of patience, tolerance and perseverance. Your application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is Chamber was done in a manner of fairness and firmness. This, I think, has the respect of all of us. But behind that firmness, there are always elements of kindness and gentleness, especially when I made mistakes, which I often did, speaking at times when I should not. I thank you for your accommodation. I wish you the best of health and best of luck in the coming election.

Talking about strength of characters and strength, I look to the Members of the DAB, for during the last four years, their strength has been evident in their defence of a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subject to attacks from all fronts. Defending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is Chamber is not easy, and must have cost them valuable votes and support in the community. They have played the role well and are a good model of what loyalty is. Most importantly, if you look at the award lists, on the list of Chairman of statutory bodies, they are not recipients, they have not asked for reward for what they have done, and for this, I respect them.

As a good model of what loyalty is,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r IP Kwok-him. I have known him for many years, and we have fought many battles out in the Western District. Even though his chairmanship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legislation for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might not have been completed, the work he had done will go down well in the annals of this Chamber as a loyal supporter of the Government. I am sure Members of this Chamber, whether they agree with his views or not, cannot deny that he had tried very hard to sell a government policy. For this, he is a good legislator.

From government party to op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I shall now speak, even without an introduction, you will all know who I am referring to — they are the democrats, the Democratic Party. Like many in Hong Kong, I thought that, before I came here, the Democratic Party's Members were anti-government in everything, 逢政必反. But after working with them for four years, fighting with them at times and eating with them, I find that I am holding a different view.

Sometimes, I would ask myself, are they a government party? Yes, they are. Why do I say this? If you look at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he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without them, many bills will not have seen the light of days, particularly the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Bill 2000 when the Government stooped so low to gather their support. They have become a government party. Putting jokes aside, they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working of the legislature. Most importantly, on behalf of their constituents, they have ensur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isplayed the best of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a very high standard. Without the democrats, it is like going to heaven for me, because this would be a very lonely place and I would not have my friends. Similarly, in this Chamber, without the democrats, it would be a lonely and very quiet place; we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listen to the speeches of Mr CHEUNG Man-kwong, Mr Martin LEE, Ms Audrey EU and the like. The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cademic and scholastic work of this Council.

Now, I would like to move on to my good friend, Dr Eric LI, the convenor of Breakfast Group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Your absence from this Chamber is a loss to the Council, the community and particularly the Breakfast Group. Your leadership in the PAC would not be

forgotten, and i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s legislature, you would secure a notable place.

As for the Liberal Party, I have known its members for many years. Many of you ask what exactly do the Liberal Party Members think and what are their convictions?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They believe in liberalism and practise what they preach: freedom of thoughts and freedom of actions among their members.

James — he is not here, if your departure from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in the forthcoming election is true, then,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would have lost a very formidable friend, and I hope the other side would gain an enemy.

Miriam — she is also not here. To me, you are a true representative of 業界，（計時器響起）……

主席：石禮謙議員，不好意思，時間到了。

MR ABRAHAM SHEK: for you fought for your industry. Thank you.

梁耀忠議員：主席，說到告別，人們或多或少總有一種黯然的感覺，因為告別了之後，何時可以再相見是說不定的，故此黯然也是必然的。但是，無論如何，有開始便會有終結，便必然有告別的一天。我們要堅強地面對告別，否則我們便不能踏開新的一步。我想這是每一個人的期望。

我亦期望在座每一位議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均能帶着一種盼望的心情來面對今次告別。我是第三次當立法會或立法局的議員，而在每一屆中，主席，坦白的說，我最喜歡聽的便是告別議案辯論。我未必不喜歡聽其他的議案辯論，但卻肯定最喜歡的是告別議案。為甚麼？剛才大家也看到，場面有時候可以令人捧腹大笑，有時候卻又會有人很嚴肅沉重地說出一些話來。我雖然喜歡聽，但自己卻是否喜歡發言呢？其實，越坐在這裏聽人發言，我便越不想發言，因為很多同事的言語能力非常高，可以一方面令很多同事捧腹大笑，另一方面又能夠談一些很嚴肅的事情，令大家深思一些議題和一些內容。

可是，我自己又能在告別議案辯論裏說些甚麼？這是真的很困難。但是，無論如何，我想了很久，仍覺得應說一些話。為甚麼？因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每位同事都可以將自己個人的感受說出來，平時就其他議案發表意見時，議員們都只是表達一些政見，或對政策分析，不是說個人的感受，但在告別議案辯論中，大家都希望發表一下對自己的工作，或對議會，或對同事之間的一些感受和看法。所以，我覺得應該珍惜這個機會，說說自己的感受。

其實，在 3 屆的議會中，我最懷念第一屆，即 1995 至 97 年的那一屆。為甚麼一直懷念這一屆？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議員，在議會中，不應只是希望發表意見，說說市民的心聲這麼簡單。反之，他們應希望透過議會，取得一些實際成果。這才是最重要的。市民會認為若議員只是說說意見，那麼他們自己也大可以在電台說，或在其他地方說，不一定要找議員代說的。因此，這其實是很重要的，亦呼應了鄭家富議員所說，若我們不能取得實際成果，別人就會稱這個議會為“垃圾會”，而不會稱之為立法機構了。

為甚麼我經常回憶 1995 至 97 年的立法年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作為民選議員，在議會之中並沒有面對太大的掣肘。為何我說沒有太大的掣肘？因為我們最少可以提出私人法案，將一些民眾的訴求以法律形式予以體現，在議會中進行辯論，若有機會的話，還可以爭取通過。這是很重要的，否則，便會像現在一樣，充滿困難，因為在很多事情上，議員都不可以自己提出來；要提的話，還要等政府才可以提，自己是不可以提出議案的。對我們議員來說，這真的是“綁手綁腳”，令我們不能真正地做到我們想做的事情。

我自己最懷念的是，在 1995 至 97 年度會期的最後一次會議，我提了一項私人法案，限制公屋加租。這法案現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我自己卻覺得無愧於心，因為事實上我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需要，體察到民間的訴求，才提出這項法案。我將每兩年加租一次改為每 3 年加租一次，以及把加租幅度限制在通脹率之下。我覺得這是適當的，甚至現在都是適當的。可是，當時同事作出了修改，出現了另一種模式，而引致更多問題出現。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真的有機會提出意見，在立法會討論甚至通過，而在回歸後的這個立法會，這些的“風光年代”卻已不再了；我們以前可以做的事，現在完全都不可以做了。我們最多只能像劉慧卿議員一樣，強烈地表達或責罵。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做的了。

因此，我真的很懷念那段期間，我很希望回到那個日子，讓我們真的可以嘗試將我們的民生問題和政治問題，透過立法向政府表達我們的心聲。但是，這真的很困難。為甚麼？因為這涉及修改《基本法》，而《基本法》是否這麼容易修改的？真的不容易修改，在這兩屆來說，我曾經連續兩年提出

類似的修改建議，但卻完全失敗。同時，最近的釋法的問題更凸顯修改《基本法》的關卡越來越多，所以，未來的日子也會是困難的。

但是，無論如何，到了今屆最後的一天，仍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歡欣，就是我由 1996 年開始跟進的青少年犯人刑期問題，終於在昨天得到解決，令他們能確實知道自己的刑期會有多長，能令他們有明確的展望。當然，我不是要自己領功，因為很多同事亦應記一功，而政府能夠提出這項法案（不知道是讓步還是它真的能體察到問題所在），改善目前的狀況，才是我多年來最感欣慰的地方。

主席，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主席，轉眼間，第二屆立法會會期即將結束，今天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盡“素”心聲。本來，我寫了一篇較嚴肅的演辭，但聽過各位同事剛才輕鬆的發言——雖然我並非整段時間都坐在這裏，但我其實已聆聽了每位同事的發言——我決定改為說一些較輕鬆的議題，即大家所謂的“廢話”，而我說的更是“廢話”。

剛才，我問黃宜弘議員會不會發言，因為每星期三的晚飯時間，他經常都會坐到我身邊，然後便會開始說一些笑話和二級以上的笑話，但黃議員說他的笑話全部只能在餐廳中說，所以他不會在這裏說。

現在，我其實是“臨時爆肚”，大家都知道這不是我的強項，我更和幽默扯不上任何關係。想來想去，有些甚麼是大家未曾說過又比較輕鬆的呢？我想到了衣着。

說到衣着，大家的注意力都會集中在女議員身上。我們 11 位女同事的確使整個議會生“色”不少。以我所注意到，說到衣着漂亮、名貴而且天天新款的，不用多說，大家都會知道是非坐在我身旁的余若薇議員莫屬，她實際上也給了我很大的壓力。她的衣服款式多，又漂亮，自從她進入議會後，很多人開始批評我的衣着，我相信也是拜她所賜。所以，怪不得電視鏡頭經常都對準她。不過，電視中可能只看到她的衣着，但有兩件東西是看不到的，其一就是她放在地上的手袋，我是天天都看見的。她的手袋天天不同，大家有時候見到我和她在談話，其實我們是在談論她的手袋。此外，她手上的鑽石很“勁”，加上她的名貴衣飾，她的衣着真的可說是千變萬化。

至於我自己，大家都知道我是天天一樣的，我的手袋由新用到舊，鞋又穿到破爛才換新的，手袋永遠都是同一款式，所以，可以說，我坐在她旁邊，令我覺得自己“定力”十足。

男士的衣着本來沒有甚麼好說，永遠都是深色西裝，除了羅致光議員之外，我發覺他較多穿淺色西裝。我覺得，男士在服飾上較能“出位”的是領呔。不知道大家有否留意到吳亮星議員曾經有一次在世界盃開鑼那天，帶了一條印滿足球花樣的領呔來開會，但議會中卻沒有人留意他，後來還是要他“自爆”，大家才看着他的領呔議論紛紛。這證明男士的衣着不像女士般能夠引起大家的關注。

在我印象中，我從未見過梁耀忠議員穿西裝。他好像永遠都是 T 恤或恤衫西褲，冬天則外加毛衣或飛機恤。李卓人議員也是一樣，我也不記得何時曾見過他穿西裝；但另一方面，我卻很少看見田北俊議員不穿西裝，即使公益金便服日那天也仍然見他穿西裝，只不過除下領呔罷了。

不知是否個人喜好，曾鈺成議員的西裝衣袖永遠好像長了一吋，加上他不喜歡扣上西裝的鈕，所以看起來他的西裝好像過大，每次我看見他穿上西裝的模樣，就會想到 *Oliver Twist* 的可憐模樣。

還有一點可能男士們自己並不知道，也請大家不要笑我，就是大家可知道哪一個洗手間是最多男同事“光顧”的呢？答案便是在二樓女廁側邊的供傷殘人士用的洗手間，可能因為該洗手間在二樓的關係，因而方便使用。每次我經過這個洗手間，都看見該處爆滿的。

其實，可以說的還有很多很多，剛才李柱銘議員說我在 97 年時曾霸佔他的車位，我要對他說，為甚麼我會霸佔他的車位呢？因為他有司機，但我沒有司機，所以我需要一個車位。無論如何，我要向在座各位同事致敬。多年來，各位同事對我都非常友善，我尤其要多謝張文光議員，他除了第一次在議事廳內罵我之外，其後也答應我不會再在議事廳中指名道姓地罵我。這麼多年來，他也真的沒有這樣做，所以我要多謝他。儘管大家政見不同，但在過去 4 年有機會在這議事堂與各位舌劍唇槍，的確提高了我的議政水平。多謝。

劉漢銓議員：主席，在本屆立法會 4 年的工作期間，發生了很多事件，包括 SARS 侵襲香港、七一遊行、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支持香港經濟復甦、人大釋法和決定，以及幾位問責官員辭職等。在短短 4 年之內，香港發生如此多重大事件，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同時亦令我們深思。

本港社會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不僅引起越來越多市民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亦引起中央對香港問題的高度關注，同時導致海外輿論和某些外國政府對香港事務的廣泛注意和談論。

在如何看待本港政治和經濟形勢發展方面，顯然存在多種角度和動機，並出現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價值取向，其中一些可以互相包容，一些卻截然對立。對此，我認為站在港人福祉的角度，對本港政治和經濟形勢的處理或發展，應該在 3 方面取得共識。第一，要有利於本港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第二，要有利於本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的改善；及第三，要有利於香港與中央在“一國兩制”框架內良好的建設性關係。我認為凡是可能損害這 3 方面的政治追求或行動，不管是來自任何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政治和經濟是本港兩個重要範疇，應該協調發展。目前，本港在經濟方面已經與內地緊密合作。自去年七一以來，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復甦的措施，包括放寬內地居民個人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加強港粵分工協調、建設西部通道和港珠澳大橋、考慮在香港成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積極研究 QDII，即認可境內機構投資者、促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和發展等，加深香港與內地經濟互補互利的合作關係。

可是，我們不能否認本港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與內地有明顯差別，但我認為本港跟中央在政治文化上應該可以尋求共同點，可以尋求妥協和包容，關鍵在於互相尊重。“一國兩制”的精粹是在一國之下的兩制要共存、要互相承認對方、尊重對方和容忍對方，而不是企圖改變對方。

除了兩制共存和包容之外，本港社會內部亦應互相包容。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其中“和”就是和諧、和睦、和平，“合”就是合作，結合，融合。“和合”是指不同要素的協調、結合和和諧。本港不同的政黨、團體和界別亦應該講求“和合”。本港政治要形成良性發展，中國文化中“和而不同”的道理可以啟發我們在不同和分歧中尋求合作和共識。

主席，本屆立法會已完成工作，我期望香港能夠保持自強不息的優良傳統，發揮有容乃大、求同存異的精神，促進社會和諧、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亦祝願第三屆立法會順利產生，繼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市民服務。

主席，我謹此陳辭。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立法會任期快將完結，又是回顧過去、祝福將來的時候。正如內務委員會主席開始時問，這屆有何特色呢？我相信以“數字人生”來形容過去 4 年是最貼切不過的。千禧年至今，各種各樣的數字（包括日子的數字）牽動着市民的心思與情緒，當中有悲有喜、有血有淚。

整個千禧年是 0101 的時代，0101 交織出來的科網熱潮席捲全港，上市公司的名稱只要採用“i”或“e”字頭或“.com”字尾，全部均可點石成金。科網熱潮一度令人相信“魚翅撈飯”的日子會重臨香江，失業率也會直線回落。最終，恒生指數由 18 000 點直插落至 13 000 點，整個社會在半年間經歷了天堂與地獄，無論市民是否“炒股”，也一樣難逃泡沫經濟再次爆破的沖擊，而 2000-01 年度的財政赤字也重現。

2001 年是巨大赤字年代的開始，當時預計 2001-02 年度的赤字高達 656 億元，數字驚人！但是，最恐怖的數字卻遠遠不及九一一，九一一事件震動全球，不但重挫本港的經濟，更改變了本港政局的發展。隨着財赤壓力激增，爭拗接踵而來，而公務員減薪、社會福利界削資、政府“瘦身”、加費加稅等掀起了不少風風雨雨，也為社會積累了不少怨氣。同時，九一一事件亦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所引起的遊行及紛爭揭開序幕。

2002 年行政長官推出高官問責制，3 司 11 局正式產生——是 3 司 11 局，不是“三屍十一命”，梁天來的故事是另外一回事。基於這個變化，2002 年也是首度“零”施政報告的年頭，原因是行政長官因要推行高官問責制而押後發表施政報告。在整個年頭中，政府均埋首於數字裏，把焦點放於減赤上。同年，200 億元的節流大計劃正式開展，目標是在 2006-07 年度全面減赤。無奈時移勢易，可說是人算不如天算，2006-07 年度這個減赤目標隨後也變成了 2008-09 年度。

2003 年，數字的升跌更觸動人心。在 3 至 6 月間，每天公布的 SARS 感染人數牽動了全城市民的情緒。在 6 月 23 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香港從 SARS 疫區名單中刪除。當香港人慶幸重生之際，有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爭議卻進入白熱化，接着便有七一大遊行，然後發生“七一六（上亞厘畢道）大地震”，兩位問責局長辭職，使政府統治陷於飄零。最後，在 11 月 23 日，區議會選舉的投票人數是 100 萬人，就此告別了 2003 年。

踏入 2004 年，數字同樣成為爭拗的焦點。年初，家禽業及政府就何時輸入活家禽爭拗不休，21 天、3 個月、還是半年後恢復活雞供應變成了焦點。禽流感之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2007 及 08 年普選又接着上位。七一前估計會有 20 萬、30 萬或 50 萬人上街，七一之後又再爭拗是 53 萬、26 萬或 20 萬人。至於九一二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如何，相信會是全年的焦點所在。

回顧過去這一大堆數字，無奈總是悲多於喜，爭拗也往往圍繞着數字糾纏不休。數字可愛之處，在於數字易記易明、簡單直接及容易引起共鳴。然而，數字可惡之處，卻在於數字過於表面、容易被歪曲及玩弄。過於執着數

字，有時候只會令爭拗無日無之，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誇大數字、甚至將數字自動過數，化為一己的政治籌碼，就更令人感到遺憾。

不過，展望來屆立法會，我們相信將來的數字一定會喜多於悲。隨着 CEPA、個人遊、大珠三角“9+2”協議等進一步深化、外圍經濟持續改善、2005 年迪士尼樂園的落成等，本港的經濟一定會更美好。在今年之內，最低限度可以告別通縮，失業率可望跌破 7%，而負資產的數字也相信會進一步回落。

雖然數碼港已成明日黃花，但公共服務電子化、資訊科技的普及化應用確實為市民的生活帶來便利，也為中小型企業提升生產力及擴展營商空間。“乜港、乜中心”雖然告終，但卻為政府重振四大支柱行業開路，總算重歸務實。

雖然 SARS 奪去了 299 人的性命確實是個沉痛的記憶，但經此一役，整個社會變得更注重環境及個人衛生，而防範及監控傳染病的系統也得以建立，對衛生環境有長足的改進。今年，我們可以告別 SARS 及禽流感了。

隨着九一二立法會換屆選舉結束，政制發展的爭拗將會趨於平和，而討論空間將會重現。今屆歐洲國家盃盟主希臘的踢法雖然毫不賞心悅目，但勝在“穩打穩扎”，最終也能先後擊敗法國、捷克及葡萄牙，逐步締造出希臘神話。葡萄牙在全國擁躉吶喊之下，滿心自信、急於求成，最終卻因一次失誤而功虧一簣。民主發展不一定要好像法國般可歌可泣，也不一定要好像捷克般波瀾壯闊，循序漸進、平穩發展也一樣可以實現民主普選。如果只是盲目追求，不惜激化矛盾對抗，偶有失誤，便可能會“眾敗”俱傷。過去兩年來，在政制發展的討論上意氣之爭大，建設性的提議少。現在遊戲規則也起了變化，參與者已不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界及政黨了，中央政府以至各界市民也參與其中。（計時器響起）

主席：鄧議員，時間到了。

鄧兆棠議員：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還有議員想發言？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聽過了多位同事很有技巧地以輕鬆而幽默的話來說“道別”和“依依不捨”，可惜，本人卻不能這樣做，因為本人昨晚整晚也在醫院陪伴着本人一生最尊重而病危的媽媽。

在本屆立法會的 4 年中，即 2000 至 04 年，形勢可謂波濤洶湧，香港的經濟一直處於困境，而整體失業率在去年受 SARS 影響下更一度上升至 8.7%。同時，工程建築界的失業率在過去數年尤其嚴重，由去年的 16.9%，飆升至今年的超過 20%。雖然在 CEPA 實施及自由行推出後，整體失業率已回落到 7%，可是對工程建築界的失業情況幫助不大。

在建造業這個失業重災區裏，失業工人、技術人員及專業人士超過 30 萬人，連同他們的家庭成員，受影響的人數差不多高達 100 萬人。因此，本人在任內代表業界不斷敦促政府加快基建。在三年多前，7 個政黨及早餐派所組成的跨黨派聯盟提出增加就業及紓解民困的 7 項共識建議之一，就是本人提出的“三合一建議”，包括(一)加快執行基建及工務工程；(二)盡快落實兩個已解散市政局遺下的一百六十多項總值 200 億元的工程；及(三)每年投入 60 億元修復和維修正在老化的基建和屋宇設施，為期 5 年。同時，為了跟進有關的要求，本人聯同本會的兩位同事及建造業內的商會、工人團體及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專業學會，組成了公共建設關注聯席會議。雖然上述“三合一建議”獲得行政長官的接納，可惜最終也沒有實行。

此外，在本人努力爭取的過程中，也曾受到其他阻力。舉例來說，前財政司司長在 2002 年提出“工程下馬論”，為政府工務計劃的推展施加新的條件，就是只投資在那些有經濟效益的項目，即“賺到錢”的項目，而那些無經濟效益或低經濟效益的項目則要延遲進行或甚至取消或“拖下馬”。他曾公開說香港興建了一些“不知帶我們去哪裏”的公路及天橋。本人認為他的評論等於是對政府工務部門、區議會及立法會，作出不合理的批評。在獲悉有關的言論後，本人當時隨即在 9 天內在許多的電台及電視節目中批評他的立場，並以本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表達對他的言論的不滿。最後，政府也作出正面的回應。在去年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增加了基建開支達 10%，由二百六十多億元增加至 290 億元。同時，政府也嘗試精簡工務工程的審批程序，以縮減推出基建項目的時間。可是，有關措施始終並不成功。

與此同時，本人在 3 年前已向政府建議發債及採用 PFI 以繼續投資基建。可惜，建議並沒有得到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的接納。然而，現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終於決定在今年發債，也將“五隧一橋”證券化，並且推行 PPP。

但是，後者與本人倡議的 **PFI** 是有所不同的。本人並不同意將現有的政府設施及服務私有化，而是應該鼓勵私人投資者，並利用銀行存款總額達 36,000 億元的私人資金，創造或提出在現有的工務計劃以外的新項目，以達致增加基建投資及創造就業的目標。由於政府所推行的部分 **PPP** 計劃涉及現有的工務設施，例如重建沙田濾水廠項目，與上述的考慮不符，所以本人是不贊成的。在發債方面，本人認為 200 億元實在太少，不能照顧到未來基建投資的需要。

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本年的施政報告第 38 段表示（引述）：“.....政府預定在未來 5 年的基本公共工程計劃，每年平均開支約 290 億元，較過去 5 年每年約 270 億元的平均開支為高。我們除已為工程的前期可行性研究安排了費用外，並已確保了工程計劃運作後所需的經常開支。這些工程平均每年需要大約 4 200 名專業技術人員。此外，政府批出各類招標項目和顧問合約時，會注意盡量減少對本地中小型專業機構參與的障礙。”（引述完畢），以回應本人對工程前期工作量（包括工程的可行性報告、建設計劃等）不斷減少的關注。事實上，有關的問題可說是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在 2000 年 8 月底向各部門派發內部通知所引起的。該文件要求部門重新檢視現有基本工程和開支，並延遲或終止一些不必要的基本工程。同時，在開展一些新的工程項目時，其經常開支須由有關部門自行應付。

雖然施政報告已作出有關的承諾，但工程經常開支的問題並未因此獲得解決。在過去大半年內，本人一直與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討論該問題。董先生和唐先生均表示經常開支已可向有需要的部門發放，可是，馬局長則表示要視乎計劃項目的優先次序而定。他們的說法實在令本人及有關人士有無所適從的感覺。

主席女士，本人也藉此機會向各同事致意，並對秘書處各同事過去 4 年非常辛勤的工作及他們每天與時間競賽的精神表示感謝。

本人謹此向各位致以萬分敬意。謝謝主席女士。

朱幼麟議員：主席，今天我會說《叉燒論 — 中集》，希望大家可以在歡笑中完成本屆立法會的工作。

我有沒有機會說《叉燒論》的下集呢？根據李柱銘議員說，這數天要看“朱”能否飛的這個問題了。（眾笑）大家會記得，上次說“叉燒”官員的時候，劉慧卿議員是第一個衝出來，用一把很長的刀，來“篤”這個官員，

她說這樣“篤”數刀，可以燒得透一些，亦可以增加透明度。這次有所不同，她自己不走出來，卻派一把小刀給另一位議員，她說現在推動的是“一人一刀”。（眾笑）

司徒華議員建議，上一次我們燒了一位官員，這一次我們應該“叉燒”一位議員，這是很合理的。司徒華議員說，這樣做可以改善行政和立法的關係，劉千石議員聽到這建議，可能會嚇到腳軟。（眾笑）我問司徒華議員，我們應該怎樣揀“叉燒”哪個議員呢？“華叔”說，你去問彼得和猶大便可以了。（眾笑）李柱銘議員立即站起來，他說如果要“叉燒”一個官員，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我們要諮詢國際社會，所以他要到一次美國，要去拜一下洋菩薩，邀請美國來說三道四。（眾笑）田北俊議員也同意“叉燒”官員是一件大事，所以他要到北京詢問中央領導的意見。不過，他說得很清楚，他回來後，大家不要打電話給他，任何來電顯示有“CE”這兩個字，他也不會回覆的。（眾笑）我所屬黨派的主席，劉漢銓主席上一次“叉燒”官員的時候，他到處找滅火器，找不到；這次不同了，他帶了兩大樽天拿水來，（眾笑）他說今天可以燒得快些，因為他趕時間要找下一屆的“着落”。（眾笑）余若薇議員最喜歡吃叉燒，她不單止自己吃，還帶了湯家驊和梁家傑來吃免費叉燒。

我自己趁着還有火的時候，靜靜地燒了那張拿去北京的民主派名單，（眾笑）因為劉慧卿議員（“卿姐”）整天追着我問：“老朱，你的名單裏有否我的名字呢？”現在燒了之後，我可以很大聲地說：“當然是有的，卿姐。”（眾笑）

上一次“叉燒”官員的時候，大家可能還記得李國寶議員說：“請你快一點燒，3時之前燒完。”（眾笑）這一次不同了，他說：“你們慢慢地燒便可以了，因為我反正都不在香港，你們燒完之後，預備兩份，速遞到我巴黎的酒店，放在我雙鞋的旁邊。”（眾笑）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首先要向朱幼麟議員致敬，因為他保持一貫的幽默，我亦向他道歉，因為聽聞他本來希望自己是最後一位發言的議員，好讓我們在笑聲中說再見。然而，我身份較特殊，希望他原諒。我是在這裏年資最長的議員，23年不是一段短時間，但我不是年紀最大的，只是年資最長。選舉在即，我不知道有否機會再次回到這議事廳，所以我覺得有需要說幾句。

在過往的二十多年來，在這議事廳坐過、工作過的議員，相信都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而我自己是體會了不少人性的善惡。很多人說政治是醜惡的，但我覺得政治是必須的。有人便會有政治，政治有時候很美麗，有時候很醜惡，不過，我始終覺得，總括來說，我個人的體會是，在這個議事廳的工作，為我個人帶來很豐富的人生經驗，總括來說也是美好的。

剛才劉健儀議員提到我做了 3 年的內會主席，而她是在最後一年才出任內會主席。我一定要藉此機會多謝大家。事實上，大家給予我很大的支持，亦令我“老懷安慰”，因為他們向我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意見，特別是會議一定要短，所以我常常牢記着他們的意旨，我以為自己可以建立一些紀錄，怎知卻被劉健儀議員打破了。

我相信作為議會的成員，有一樣東西特別能令我們感到自豪，便是我們在維護“一國兩制”方面起了一種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在這方面，我相信我們是能夠向香港人交出成績的。當然，在我的工作當中，我學習到很多很多的東西，但有一樣東西是我特別學習到的，便是易地而處，無論我們是不同的政黨或有不同的政見，也不論是個人或團體，我覺得要真正解決問題，或為香港化解一些重大的問題，易地而處這種態度及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瞭解對方的想法很重要，而這或會令我們能較易應付我們要打的仗，又或令我們在輸了的時候較易接受也說不定。這亦可以應用在我們與政府的關係上，因為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與政府的關係有時候好，但有時候卻拉得很緊，但如果我們能夠在這方面多下些工夫，便應較容易解決問題。

不過，這也是我希望向司長作出的忠告——兩位司長正好在座——我亦很希望公務員體系、高官、問責官員亦可以易地而處地考慮我們議員很多時候的取態及想法。為甚麼很多時候會有緊張的情況出現呢？其實便是大家在互相瞭解方面出了問題。有時候，很小的事會演變成很緊張的情況或很嚴重的事，其實這是沒有必要的。如果能夠體諒大家的觀點與角度及對方所處的位置，我相信便會有較大機會尋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

我相信無論大家將繼續從政或是離開這個熱烘烘的、被朱幼麟議員常常形容得十分有趣的廚房，因為 *if you canno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kitchen*，太熱的時候便要“彈”出去，而我相信有些同事會很明智地作出這個選擇。無論如何，我祝願大家保持幽默、生活快樂、身體健康。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我不是在找尋叉燒，而是在找尋“咪高峰”。我當然不會吃朱幼麟議員叉着的那塊叉燒。不過，我吃過朱幼麟議員在番禺所砍的蔗，也到過他的農場遊玩。

在立法會的 8 年來，我也很開心，因為結交了很多朋友。自由黨的同事有時候說我入錯黨；我和李家祥議員很投契；Philip 又經常約我飲酒，不過，我要告訴你，其實我不喜歡威士忌，我較喜歡紅酒，下次你請我飲紅酒，我一定奉陪；馬逢國議員、梁耀忠議員和黃宜弘議員，很高興有機會與你們一起飲至醉醺醺和吃火鍋。

不過，我很喜歡“性騷擾”3 位男士，第一位是石禮謙議員，第二位是張宇人議員，第三位是陳國強議員，因為他們 3 位也是“大肚揀，無良心”。
(眾笑)

在立法會的 8 年中，坦白說，我最懷念的立法會同事並不是本屆議員，而是上一屆的夏佳理先生。夏佳理先生是“bill 皇”，“bill 皇”走了後，我們來了一位“bill 后”。由於夏佳理先生 chair 了很多 bills，而在他 chaired 的 bills 中，他看事物往往看得很細微、很好，而與他共事多年來，我覺得在做 bills 的同事中他是最好的。當然，我想余若薇議員在做兩屆議員後，可能會超越夏佳理先生也說不定。

在今屆會期內，我創了兩項紀錄，我想在此與大家分享。我處理了最長的法案，即《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一共開了八十多次會議，梁劉柔芬議員經常埋怨我要在上午 8 時半開會，但不在 8 時半開會是不行的。我也曾做過時間最短的法案委員會，只須半小時便完成工作。劉健儀議員，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法案委員會其實是沒有必要成立的，那是有關機場的法案。所以，最長的和最短的，我也處理過了。

不過，我要趁此機會衷心祝福一個人，那便是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是我相識了 20 年的朋友。大家也許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在 1995 年才加入立法會，但其實我在加入立法會前已跟田北俊議員在葵青區議會共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梁耀忠議員、李永達先生及田北俊議員 4 人也是在 1985 年出任葵青區議會議員的。後來，他在 1991 年當立法會議員。田北俊議員今次真的接受劉慧卿議員的挑戰，參加地區直選。我衷心祝賀田北俊議員，我希望他有決心，並在選舉中勝出。

事實上，這也是我自己的希望。我是民主派的一名成員，但卻參加功能界別選舉，有時候我也懷疑自己是否一如司徒華議員所說的政治蝙蝠，既支

持普選，又參加功能界別選舉這種所謂小圈子的選舉；然而，我有一種信念支持我這做法，那便是我覺得如果大家能試穿一下對方的鞋子，社會便會融和一點，正如剛才周太所表達的意見。

今次自由黨參加普選是很值得大家支持的，但我更覺得民主派應圍攻所有功能界別。反過來說，在社會中，如果我們只側重一邊，社會便不融和或不能 **converge**。民主派如能多點參與功能界別的選舉，整個思維或政經取態便可能循中間路線走。當自由黨要直選時，也會循中間路線走，社會便會有一定的轉變。我想這也是邁向全面普選的一個很好的基礎。

不過，說到選舉，由功能界別轉戰直選的，田北俊議員不是首位。我看到以前曾經這樣做的李柱銘議員及司徒華議員已經有來者；但由直選轉至功能界別選舉，除了我之外，我看不見還有誰。我希望劉慧卿議員嘗試一下，也接受田北俊議員的挑戰，參加功能界別選舉。（眾笑）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原本也備有一份講稿，我亦想過再次拿出 4 年前在這裏提出的告別議案的內容來說說，不過，後來我覺得做人應該輕鬆一點，因為我的家人最近再三叮囑，要我開心一點，面向世界。所以，我想，開心一點，可能會令大家更舒服。我相信兩大黨派內一些極端的人，像外界的人一樣，是難以理解議會可以像單仲偕議員剛才所提到，可以飲酒、進餐、說笑，是很開心的。雖然我們在議事堂內可能爭拗得很厲害，但到了 **Ante-Chamber**，大家又可以有說有笑。換言之，民主的道路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途徑來達致的。

我覺得我最大的弊病是太執着，執着的程度令我自己有時候也覺得“支持自己不住”。就像今天，我想到社會上有些 40 歲的人沒有工作做時，我便會就甚麼市場、甚麼政府發表很多意見，其實，如果能退一步，便可以海闊天空，舒服很多的。近一兩年，我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一直對我說要開懷一點，其實，我自己也這樣勸人，特別當兩黨派劍拔弩張的時候，我也說要放開懷抱一點，只因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而已。

我記得自從 1991 年參加立法會直選開始，我每次的選區都是九龍東，那是一個“很好玩”的選區，在第一屆選舉時便已經“打到七彩”，因為我這個選區是著名的少壯派角力地區，候選人每次彼此都好像是勢不兩立。不過，這十多年來，我們發覺助選團人選擴闊了、人員放鬆了，在選舉時，我往往是與“華叔”對壘，我不知道“華叔”會否再參選。

我在一次公開場合中提到，民主其實應可以包含不同意見的。坦白而言，當大家就問題進行爭拗時，如果能夠退後一步看看對方的立場，我相信是好的。從 1991 年至今，就這一點的經歷，我認為參與民主政制的立法會選舉的同事是深有感受的。我祝願香港會洋溢着一種開心的氣氛，大家要開心一點，有不同意見是不重要的，大家可以協商，找出平衡點，就等於討論法例時一樣，我覺得是有需要找出平衡點的。

說到這裏，我想回到我的老本行，不過，今天，我是不會發火的。我不準備讀講稿，那麼，我應該說甚麼呢？香港到了今天，其實已出現了一種很好的氣氛，這是一種可以令大家放鬆的氣氛，當大家放鬆的時候，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為香港好，一齊走出一條民主的路。至於這條路應該如何走，是無須一定聽我的話，也無須一定聽任何人的話，大家應該共同找出平衡點。

我想說一說昨天的事。昨天，我在宴會廳碰到曾司長，我們談論到有關楊永強的議案，很多時候，我覺得政府如果能夠從一個較闊的角度來看我們，我們便可能做到一些事情。就像今天早上，我們因為有一個 **case conference**，所以在大樓開會。我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官員。我們提到為何在果州羣島傾卸泥沙，只對西貢區作補償，而對岸的鯉魚門和銅鑼灣卻沒有補償呢？原來傾卸後的泥沙並非固定不動的，而是會隨着水流轉往其他地方。那位官員最近可能聽到很多意見，他很好，一直抱着包容的態度，但他說政府亦有困難，因為錢已經用完，又如何作出補償呢？不過，他還在想可否有其他解決辦法。他的態度令我們今天多位惡人也有轉變——特別是黃容根議員，他現在不在席上，每當提到漁民時，他便會扯火——但他與該位官員也有商有量。

然而，就另一件有關冰鮮家禽的事件，我們所面對的，同樣是一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的官員，我卻真的“支持他不住”，我、Selina 及其他人，包括李鳳英議員都很憤怒，他向我們說話時像留聲機般，我們要求他聽一聽不同黨派議員的意見，既然政府願意為活家禽商提供補償，為甚麼售賣冰鮮家禽的便不獲補償呢？這羣人同樣是因為局方不再輸入活家禽而未能工作的。那位官員說因為活家禽商損失較嚴重，冰鮮家禽商的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他們還可以賣肉類。這些話他也有膽量說出來的。

其實，我無意“將軍”政府，不過，我想與政府和兩位司長分享一些意見，我們就某些事情為何會感覺這般勞氣？又或你們為何也會覺得勞氣呢？其實，當我們平心靜氣時，我們是可以想出一個平衡點的。正如我剛才所說，同樣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的中層官員，兩人所作出的處理方法會得出不同的效果。今天早上的效果很好，前數天的效果卻令不同黨派的議員扯火。這等

於香港的發展過程的寫照。在過去數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有很多“風風雨雨”，特別是去年的七一和今年的七一。我覺得當香港面對問題，而各方面也伸出善意之手時，我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為香港找到方案。

主席女士，三十多年來，我為勞工界進行談判，有些事情依然令我難以相信的。昨天，我與一羣工人到勞工處談判，但勞工處官員“耍”我們，指示我們前往法援處，而法援處告知我，勞工處是“耍”你們的。我當時當然感到十分憤怒，所以便帶着整羣工人返回勞工處往見有關官員。當他們明白我們的問題後，最後也想出辦法來重新就破欠基金作出辦理，來協助工人解決問題。其實，這羣狼狽的工人由 4 月份便四出奔走至今了。我說出這個個案，意思是無論任何事情，如果我們能夠退一步來看看的話，總有辦法走出一條香港人想走的路的。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祝願大家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藉着今天的告別議案，說一說我這 4 年來的感受，並藉此難得的機會，逐一答謝在座的同事，當然，我想答謝的同事有些人會繼續參選，但有些已公開表示不會參選了。

四年前，我得到工會朋友的支持，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踏入立法會議事堂。當時，自己抱着一個理念，希望從自己原來工作了數十年的工會環境轉換到另一場合，繼續為基層勞工爭取權益。可是，進入議會後，適逢香港整體經濟下滑，基層勞工的薪酬、福利待遇、權益等每下愈沉。即使在議會內外，我們叫得聲嘶力竭、很努力地捍衛他們的權益，但每一步也很艱辛。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作為職工會，作為基層團體，除了在議會內要有議員捍衛他們的權益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議會內外大家互相支持和配合，這樣才能成事。

轉眼間便 4 年了，我發覺我戰戰兢兢的心情仍沒有改變，唯一改變了的，是許多跟我一同站在勞工戰線的同事在進入議會後，我們的合作機會和工作機會都增加了。此外，在這 4 年裏，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他們對我工會的工作給予很大的支持。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視野拓闊了，學到的更多。因此，我要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早餐派的議員，我感謝他們的包容，儘管我不是早餐派的成員，他們也經常叫和我一起開會。不過，主席女士，我卻很現實，凡是跟勞工、僱員權益有關的議題，我才會出現，但他們並不介意，仍給我機會說出自己的看法，他們亦會盡量考慮是否支持我。在這個過程中，我要特別感謝李家祥議員、石禮謙議員、劉炳章議員及何鍾泰議員，他們真的很好。

我們原本來自不同的階層，他們各自均是業界的精英，但他們完全不吝嗇他們的學識，也很樂意支持工會的工作。他們已答應出任我們一些成員會的顧問，以他們本身的專業知識服務勞工，服務工會，我很感謝他們，特別是李家祥議員，希望你離開議會之後也會繼續支持勞工。

同時，我也要在此感謝曾鈺成議員——他不在席上——還有吳靄儀議員。雖然他們也很忙，但他們也不時抽出寶貴時間，擔任我們舉辦的講座的主講嘉賓，他們的精湛觀點和演說均得到與會者很大的共鳴，很熱烈的回應。此外，我亦要感謝余若薇議員，每當她舉辦涉及僱員權益的法律講座時，她也會主動詢問我們工會的同事是否有興趣出席。我很感謝他們對我們工會的工作的支持。當然，他們在議會的表現，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他們每次的辯論，儘管各自的觀點未必一致，我也未必認同他們每一次的發言和觀點，但他們還是採用較理性、邏輯性的想法，清晰地說服其他不同政見的同事，爭取支持，這點我是非常欣賞的。

主席女士，當然我也要感謝你，因為你不時借出你的辦事處，讓我召開居民、工友的會議，而且你也抽空出席我們的活動，負責主禮，故此我也要感謝你。

此外，我還要特別感謝勞工界的陳國強議員和梁富華議員，我們相識共事已經十數年——是十多二十年了，說起來大家像是已經很老的樣子。在進入議會工作之後，他們對我的支持，令我特別感動，例如每一次有其他活動時，他們第一個便想起我，問我是否識路，要不要送我過去。他們十分關照我，因為我一出門便完全沒有方向感，是方向盲。他們管接管送，特別是當我要出席一些勞工界的研討會時，他們也非常關顧我，因此我十分感激他們。此外，我要感謝我在進入議會之後才認識的黃容根議員，他也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居住在同一區，很多地方他也很照顧我，就此，我是十分感謝大家的。

主席女士，4年過去了，我覺得在一生中可以進入議會與大家共事、服務市民是很榮幸的。對於大家的支持，還有很多想一一致謝，但由於時間關係，今天無法逐一點名感謝。我希望在下一屆的議會——不論誰會進來，誰會離開——大家都可以在議事堂內外，共同推動香港沿着正確的方向乘風破浪，繼續為市民服務，令香港明天會更好。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各位同事，辛苦了數天，終於到了大家就告別議案發表意見的時候，完成這項議案，亦代表這屆會期的結束。老套的說一句，“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與各位同事共事了 4 年，有些甚至是相處了更長時間的同事，但即使是 4 年，其實也不算是一段短的日子。過去這 4 年來，不論是社會，以至在這個議事堂——我們這個議事堂其實便是香港社會政治風暴的中心點。在這個議事堂上，給我一個強烈的印象和感覺，便是在座各位也是為了自己所堅持的原則，表達自己的看法。很多時候，大家為了表達自己的看法，在感覺上大家或會各走自己的極端，彼此對立。其實，大家都是“對事不對人”。從以往立法局到現在，這點我感覺比較清晰。不過，近期，或是在這 4 年來，我有一種感覺，便是這種“對事不對人”的態度已逐步離開我們的議事堂。回想過去，當大家步出了議事堂，坐在前廳時，大家便會有很多話題可以討論，甚至可能討論歐洲國家盃的“希臘神話”。可是，近一兩年來，議事堂內針鋒相對的情況，其實已蔓延至前廳，甚至是宴會廳。這是我極不想看到的。我希望我們在議事堂內各自表達意見、論政，而在其他地方，正如剛才很多議員同事所說，大家可以就不同政見有更多的交流，大家仍然是朋友。

這 4 年來，香港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艱難時間，一場金融風暴，令不少香港市民經歷了人生、經濟的低谷；再遇上一場 SARS 的世紀疫症，繼而痛失至愛至親，對人對事因而萌生怨氣，這完全是可以理解 and 體諒的。議事堂內的同事，作為市民的代表，要感同身受，“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表達市民的訴求，這是必須，也是應分的。可是，作為市民在議事堂的代表，我們更有責任、有必要，以理性、客觀、合理、公正、公平的態度來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以至監督政府的運作，履行我們立法會 3 項主要職責。

回看 4 年的立法會工作，最令我刻骨銘深的，當然是石禮謙議員所提及我出任法案委員會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立法。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履行《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的公民責任。回看自 2003 年 3 月審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成立開始，法案委員會在多位議員努力下，每周舉行 8 小時的會議，直至 6 月底，前後經歷了近 4 個月的“艱苦歲月”，會議時間超過 110 小時，但條例草案最後以政府撤回而暫時告終。

時至今天，大家可能仍會繼續談論第二十三條，不過，在討論過程中，大家很大機會會聯想起一個名字，便是我本人的名字。截至今天這一刻，如果有人再問我：“葉國謙，如果讓你再選擇一次，你是否仍會繼續願意擔當審議這項如此棘手而具爭議性的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主席呢？”（在整個

過程中，大家在會議上有很多爭論。）我仍然可以很堅定的告知大家：如果大家要求我繼續擔任主席，我覺得這是我履行作為中國公民、香港市民的公民責任，我感到光榮和無悔。對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未能在本屆會期完成，我深感遺憾，期望在下一屆，在這個議事堂內，經消除公眾對條例草案的疑慮，廣泛聽取香港市民的意見後，並在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下，我很希望我們能在議事堂完成就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工作。

在此我衷心多謝秘書處每位同事，在過去 4 年對議員工作的協助。多謝各位。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劉健儀議員，請你發言答辯，你只有 43 秒。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只有 43 秒的發言時間，跟很多其他同事一樣，我很希望在未來再有 4 年的時間在這個議事堂裏發言的。

主席，今天共有超過 30 位同事發言，他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看法，有些是用一些輕鬆幽默的方式說出他們的觀點，以及他們對一些同事的看法，有些便視今天為一個作出工作報告的場合，也有些是用很嚴肅的態度說出他們耿耿於懷的一些事項，立此存照，記錄在案。無論大家是用甚麼態度來表達，我今天其實也察覺到發言的背後有一點傷感，今天所動議的是一項告別議案，傷感在所難免。但是，有離別的傷感才能欣賞重聚的歡樂，我在此祝願那些想回來的同事可以全部回來，至於無意回來的同事，我則祝願他們前程萬里，生活愉快。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各位同事，不用急急起立，還有我的發言。（眾笑）

我稱大家為各位同事，而不稱你們為議員或官員，是因為我覺得在過去 4 年裏，我們在這個會議廳中，一同為香港市民做事。當然，各人的做事方式會有一些特色，而各位議員和官員，無論是發言或答問，都反映出每一個人的個性，在此各抒己見，各自精采。

立法會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各位議員都是經過選舉來參與立法的。所以，議員（包括我在內）代表了這個社會裏各種各樣的看法，我們在此具體演繹。香港社會是多元化的，所以我們這個會議廳內議事時，所提出的言論、看法，亦是多元化的，有時候火花四濺，有時候大家同意的話，便大家舉手。這些情況其實很正常。有評論說，立法會很多時候有很多拗撬，我想說，如果立法會裏完全沒有拗撬，只有一種意見，那才是我們應該開始擔心的時候。有不同的意見，是健康、正常的。

我很榮幸與大家共事了 4 年。我也很喜歡坐這個位。（眾笑）今次可能是我今屆最後一次坐在這裏向大家說話，雖然我們還有一個會議——今年很特別，今天不是最後一次會議，不過，下一次開會時，我會坐在下面的座位，我不會坐在這裏，所以我要先說這段話。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剛剛有些同事形容這個會議廳是學校，也有同事形容這裏是鬥獸場。其實，我們立法會開會時，是有一本劇本的，所以說我們這裏是一個舞台，也無可厚非。不過，我想告訴大家，亦透過傳媒告訴市民，我們這裏是戲真情真的。

各位當然有時候是主角，有時候是綠葉，但我是甚麼呢？我有兩項功能：一項是當活動布景板，沒有我出席的話，便不能開會。這個布景板一定要坐在這裏，但有時候我又會動一下的說兩句話，所以是活動布景板。第二

項功能是“提場”，我有時候要提一提大家，到某個階段應該做些甚麼。有時候，主角未準備好粉墨登場，這個“提場”便會說落幕，一會兒後再開。
(眾笑)

我坐在這裏，有人說我是高高在上，其實我不是。實際上，我是你們——各位議員，各位官員——的公僕，因為我的工作就是要好好地主持會議。不過，坐在這裏亦有好處，因為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很多機會學習、偷師，可以學習怎樣進行辯論，怎樣將論點帶出來，怎樣將對方的論點逐一擊破，亦學會千萬不要說某些話。

我坐在這裏，很多時候聽到同事在辯論時的態度，使我深深感覺到大家真的很盡責，大家都是用盡心思，全力以赴，辛勤勞碌地在立法會工作。絕大部分的同事，每天都是在這個很華麗的古老大樓內，逗留 8 小時，10 小時，甚至是 12 小時。絕大部分的議員其實將所有時間都放在議會的工作上，雖然我知道有些人仍未覺得我們是全職議員；當然，我們之中確有小部分不是全職議員，但我相信趨勢就是立法會議員有需要是全職的，否則便沒法應付立法會沉重的工作量，亦沒法向選民做足交代。

在此，我亦想趁這個機會，對李家祥議員和羅致光議員表示我的謝意。我覺得第三屆立法會可能有些危機，因為可到哪裏找一位這麼“捱得”，這麼“抵得諗”，又這麼懂得計算的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呢？這是值得大家將來想一想的。另一方面，第三屆的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亦會有一些麻煩。我們這一屆的行政管理委員會要做很多比較困難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要進行檢討秘書處架構的工作。當時是很困難的，有很多掣肘，亦有很多不同的意見，然而，我很幸運，找到了一個“大腦”，因為我拉着羅致光議員，當我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他總想到一些方法替我解決，所以將來的行政管理委員會又要四出找尋這樣的一個人才了。在此，我要謝謝兩位所作出的貢獻。其實，作出貢獻的不單止是這兩位議員，所有在座的議員均有貢獻，而在座的秘書長和在會議廳後面的房間的秘書處人員，一直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很大的照顧。我更要多謝兩位先後的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沒有他們的幫忙，我今天不會這樣“中央聚脂”（眾笑）。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幾位幫我的忙，我便一定要坐在這裏直至所有會議完成，要待會議完成即是不能吃飯了，不過，由於他們非常能幹，又有效率地替我主持會議，所以我很安心地吃飯，吃飯後再進入會議廳繼續坐着主持會議，因而身體上便有些不很正常的發展。（眾笑）

其實，有一件事，我也覺得很奇怪，本來立法會議員中，男性議員居多，女性議員人數較少，但不知道為甚麼，立法會議員似乎很喜歡選一些女性出

任主席的。我有幸獲得各位的支持；周梁淑怡議員又做了內務委員會主席 3 年，雖然她自己說做不到各位的要求，每次內務委員會會議都為時甚長，不過，她英明神武的形象，在大家的腦海中都很深刻。劉健儀議員便可以打破周梁淑怡議員的紀錄，大家知道為甚麼呢？因為劉健儀議員每做一件事之前，均會進行深入研究，所以早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因而不會讓人發言過長。因此，我可說是很幸運，有兩位這麼好的內務委員會主席，間中還有李華明議員，幫我的忙，讓我可以再在會議進行期間稍作休息。

我為甚麼要說這段話呢？就是要告訴大家，這個議會內的同事，其實是比较喜歡支持女同事的，所以李卓人議員（可惜他現在不在席）不應該說我對女同事特別好。他曾經投訴，說我因為他的衣着——剛才蔡素玉議員也談衣着——批評他。我曾要求他不要穿某一件很綠色，綠得刺眼的風褸，他問為甚麼不能穿呢？我說男性穿衣是以沉色一點為佳。各位，做主席本來無權這樣要求的，不過，我也提出了，他亦很難得，他以後穿的衣服也沒有那麼刺眼，全部都是深色的了。可是，當時他還問我，余若薇議員穿的衣服的顏色又怎樣，你是主席，你又怎樣說她呢？我不能回答，惟有告訴李卓人議員我是有點性別歧視的。但是，我接着告訴他，女性穿的衣服是時裝，時裝是必須配襯顏色的，男性是較莊重些好。其實，我也是為着大家的公共形象設想而已。

其實，我一向做事是按規矩辦事，我不理會你們是甚麼人，亦不理會你們和我的交情有多深，我都要按規矩辦事。我亦很希望在立法會中，無論誰出任主席，無論誰主持會議，都會堅持按規矩辦事，因為我們的香港很須具備一種特色，就是對制度的尊重，不要因為個人喜惡而做一些事破壞制度，或令人覺得你沒有按照制度辦事。所以，很多時候，在議會中，有些同事會覺得我比較嚴厲了一些，但我希望各位諒解，我只是想按規矩辦事。因為如果在立法會這個立法的地方，我們也不尊重規矩，在香港其他的角落又會怎麼樣呢？所以，作為立法會，我們有一個責任，就是要支持法治，反對人治。

最後，我想說給大家知，十數年前，在這同一個會議廳中，我是坐在李華明議員旁邊的位置，在一次的辯論中，楊森議員（他似乎是坐另一邊）跟我爭論得很激烈，楊森議員說了一句：一笑泯恩仇。我當時說，“怎麼可以呢？（眾笑）你這樣說我，我怎可以放下呢？”但是，我覺得今天是時候向大家說，有些事我們是可以放下的，因為只有放下了我們的包袱，我們才能夠走得更快，走得更穩，希望我們再見面的時候，無論其間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再見亦是朋友，因為我們是有需要攜手一起向前走，為了我們都深愛的香港，我們要攜手一起向前走。

下次會議**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以立法會主席身份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7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正舉行行政長官答問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3 時 31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nine minutes to Four o'clock.